

■ 838065

1878

568829

T. 1

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

译 稿

民国名人传记辞典

第六、七、八分册(上)

(美)包华德 主编

沈自敏 译

赵 杰 校

中华书局

78
—
8829
|

1

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
译 稿

民国名人传记辞典

第六、七、八分册(上)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编

中华书局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中国铁道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787 × 1092 毫米 1/16 · 10³/4 印张 · 153 千字

1986 年 12 月第 1 版 1986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6.700 册

统一书号: 11018 · 1476 定价: 1.85 元

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编印凡例

一、编印《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的目的在于组织协作，征求意见，反映工作进展情况。

二、《丛稿》暂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负责编辑。

三、《丛稿》专登有关中华民国史资料一类的稿件，供历史教学、研究工作参考。每辑字数不定。

四、所有中华民国史初稿及其所附资料，一般都先在《丛稿》登载，广泛征求意见，然后改为定稿。但《丛稿》登载过的稿件，将来《中华民国史》一书及其所附资料不一定全都编进去。

五、欢迎投稿，但只限于中华民国史及有关资料。

六、欢迎对《丛稿》提出批评意见。

EA114/07

编者说明

该书系六、七、八分册，本应分成三册出版，但由于每册字数较少，特将三个分册合成两个分册，书面标明“第六、七、八分册上”和“第六、七、八分册下”以资说明。

如此则本套辞典册数仍可相连。谨此说明。

.1984年12月

许地山	(1)
徐永昌	(2)
薛敏老	(5)
薛岳	(7)
胡汉民	(10)
胡霖	(19)
胡适	(21)
胡蝶	(29)
胡宗南	(31)
胡文虎	(34)
胡也频	(37)
胡元俊	(39)
胡筠	(41)
华罗庚	(44)
黄节	(45)
黄郛	(46)
黄兴	(52)
黄侃	(58)
黄光瑞	(59)
黄庐隐	(61)
黄慕松	(64)
黄绍竑	(66)
黄少谷	(70)
黄炎培	(72)
洪深	(76)

任鸿隽	(77)
甘乃光	(81)
康成	(83)
康有为	(84)
高崧	(90)
高嶙	(92)
戈公振	(94)
柯劭忞	(96)
谷正伦	(97)
谷正鼎	(99)
顾颉刚	(101)
顾祝同	(103)
顾孟余	(106)
顾维钧	(109)
古应芬	(114)
邝富灼	(116)
孔祥熙	(118)
孔德成	(125)
郭沫若	(126)
郭秉文	(132)
郭泰祺	(134)
劳乃宣	(137)
雷海宗	(140)
雷鸣远	(143)
李济	(146)
李济深	(150)

李方桂	(154)
李蒂甘	(156)
李 璜	(159)

许地山

笔名：落华生

许地山（1893—1941.8.4），“文学研究会”创办人，短篇小说的名作家，香港大学的第一个中国籍教授。

许地山生在台湾台南，他父亲许南英在台南做过小官。1895年台湾割让给日本后，他们迁往福建，后来又去新加坡、暹罗，1902年回国。他父亲任广东徐闻县知县，不久调三水县，1906年退職后在广东落户。1911年又迁往福建，他父亲在一个中学当教师，1914年去仰光教书，1916年去苏门答腊教书，1919年死在苏门答腊。

许地山由于幼年走过许多地方，能说闽、粤方言和北方官话。他在中学时，与伦教布道会的活动有密切联系进入了基督教。1918年到北京入燕京大学。1920年获得学士学位后，他又入神学院，1922年获得神学学士学位。以后，许地山出国留学，先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1925年以《对有关摩尼教的中国典籍之研究》为题的论文获硕士学位，后又进牛津大学，获学士学位。1926年回国，在燕京任神学及历史学教授。翌年，兼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讲学，又任教育部“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委员。

1936年，许地山辞去燕京教职到香港。当时香港大学为改进中文课程的落后状态、增设汉学研究的讲座，原聘请胡适，胡适未就，推荐了许地山。许地山本来是不愿意到这个文化上死气沉沉的殖民地香港去工作的，经过反复磋商，他才应允前去，担任此职直到去世。他在任教期间深受尊崇。

许地山在学术研究领域内有广泛的兴趣。文学不过是其中之一而已，他作为一位人类学家的成就不下于一名作家。他对比较宗教进行了渊博的研究，是研究道教、佛教的专家。他还是一位认真的梵语学者。他经常在中文期刊上发表有关道教、佛教的论文，1934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他的《道教史》第一卷，但不幸未能写完。又编了《四种佛教文集的作者及篇目综合索引》，这是研究中国佛教的宝贵工具书。他在香港期间，还为《大公报》写了一些关于中国妇

女服装史的连载文章。

不过，许地山还是以一名作家在民国历史上占有地位。当他还是燕京学生的时候，就在当代中国文学发展上享有盛名了。他是1920年11月29日由郑振铎创办的“文学研究会”的十二名发起人之一。1921年1月，该会正式成立后，许地山是《小说月报》经常的撰稿人，他的作品用笔名落华生发表。他早期的小说具有浪漫主义色彩，表现出曾受佛教、基督教传说的影响。1925年，出版了他第一部小说集《缀网劳蛛》，1928年出版了第二部小说集《无法投递之邮件》。这两本小说集都看出许带有宗教仁爱及慈悲的基本思想和恢复当代的精神作用的企图。他的创作情节是复杂的。他的小说中的许多人物都是用比喻手法来表现的。这在《玉官》中最为明显，在这篇作品里，通过一个中国基督教徒玉官的经历探讨了以无私的美德作为检验行为的标准。与当时一般充满意识形态和宣传的作品相比，他的小说达到了纯道德探索的水平。他的作品在当时独树一帜，以《玉官》最为典型，许地山反对物质及革命的手段，而主张以精神的办法来解决中国的人生问题。

许地山结婚两次。前妻在生他的女儿林新时早死。1929年与北京师范大学毕业生周生姍（音）结婚，生有女燕吉和子苓仲。

徐 永 昌

字：次宸

徐永昌（1889.11.23—1959.7.12），军人，冯玉祥、阎锡山的部属，1928—1929年任绥远省主席，1931—1935年山西省主席。1945年8月，他代表中国政府在“米苏里”号军舰上接受日本正式投降。1946—1951年任陆军大学校长，主持将该校迁往台湾。

徐永昌生在山西崞县沿沟村，兄弟姊妹四人，居幼。幼年时，全家迁居大同，1897年他在一个私塾读书。不久家庭遭变故，首先他的两个姐姐和一个哥哥死去，1900年父母又相继死去，幸得当年马玉昆部队的营司书照顾。该军系护送慈禧、光绪出走时路过大同的。徐永昌随该军去陕西，后又跟随回直隶琉璃

河。1901年在他的那位保护人营司书徐椿龄的教管下，开始正式学习。

徐永昌于1906年在马玉昆的毅军当兵，两年后考入随营学堂，1911年毕业后，任副哨长。在这期间，他和北京的反清革命活动发生联系，参加了他们的会议。革命爆发后，他的部队去大同前线与叛军作战，他要求调职，因他不忍在家乡作战，后来在毅军一个新成立的营中任哨长。

民国成立后，徐永昌进了新成立的陆军部将校讲习所。1913年徐永昌任南京陆军预备军官学校连长，一年后，又进北京预备陆军大学。1916年春，居正开始反袁活动，徐永昌离校到山东为居正建立了一个参谋团。居正虽然失败，但袁世凯亦未能实现其称帝计划。6月，袁世凯死去，徐永昌回北京陆军大学，他是第四期名列第一的毕业生。

徐永昌任北京陆军训练监编辑官时，和孙岳相识。1917年冬，孙在廊坊办了一个直隶军官教育团，以徐永昌为教官。这个教育团是为了用来补充孙岳的国民军第三军军官骨干，后于1918年迁往保定。徐永昌后来在孙的部下任直隶保卫团的营长及十五混成旅参谋长。

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十五混成旅在良乡苦战，在把奉军逐回北京的战役中出了力。十五混成旅后调往河南作战，徐永昌任第二团团长的，战事结束，该旅留守河北大名。1924年5月，徐永昌任第一团团长的，驻防定县。

1924年10月，冯玉祥在北京发动兵变，孙岳所部改编为国民军第三军，徐永昌升任第一混成旅长，1925年任陕西副保安司令，7月上旬把部队调往陕南，8月，孙岳任陕西督军，徐任第一师师长、陕西警备司令，此时徐已升为上将。

1925年冬，国民军与奉、直、鲁联军开战，徐永昌师是12月初由潼关北上部队的一部分，与据守天津津浦路沿线的李景林部作战并占领了天津。1926年1月，奉、鲁联军在天津地区反攻，孙岳败退绥远及察哈尔。3月，徐永昌代患病的孙岳任第三军军长。国民军大规模撤出南口、张家口地区，徐率军到包头，又进入陕北。1927年初，徐永昌军入山西，驻防汾阳、榆次地区。这时，阎锡山的势力已进入他的部队。6月，阎与国民革命军正式联合，徐永昌部称为晋军第三军。1927年晋、奉冲突中，徐永昌军逼奉军于10月初撤离石家庄。

但未能击败奉军，他在井陘山区东麓设置防线。

1928年1月，蒋介石重新上台，军队改编，阎锡山任第三集团军司令，徐永昌为第十二路军总指挥。4月，徐率阎锡山的东路军，在铁路沿线支援国民革命军的北上。5月30日，徐部攻占保定，奉命驻守该城。六天后，国民革命军占领北京。

攻克北京后不久，徐永昌任河北省委员。1928年10月12日，绥远建省，徐永昌任省政府主席至1929年8月10日，不久他继商震而任河北省主席，于9月9日就职。1930年，阎、冯北方联盟成立，徐永昌到山西，在扩大会议的反国民政府运动中起重要作用，任前敌总司令鹿钟麟的副职。5月5日，鹿、徐在兰封就职后，率北方联军向东推进。北方联盟失败后，鹿钟麟宣布与冯玉祥脱离关系，阎锡山辞职，徐永昌则率军由河南退回山西，并未受到惩处。他的部队改称第五军，任晋绥警备总司令。1931年6月，徐任国民政府委员，所部改称第三十三军。同年8月，他继商震而任山西省主席。

1934年，徐永昌因肺病在北京治疗，仍处理政务。1935年，徐当选为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1936年1月，徐永昌去归绥协助建立蒙古政务委员会，抵制以德王为首在百灵庙的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2月，中国共产党从西面进入山西，徐永昌急忙赶回布置该省防务，5月，共产党撤出山西。徐永昌因病辞去山西省主席，但仍任晋、豫、陕三省绥靖委员。

1937年3月，徐永昌奉命任军委会办公厅主任。中日战争爆发后，徐任该会保定行营主任。他还协助指挥第一战区的战役。1938年1月，军事委员会改组，徐任军令部长，该部在国民党军事机构中起总参谋部的作用。他担任国民政府和阎锡山之间的联络人。1945年，他以中国代表身份，在东京湾参加“米苏里”号举行的日本正式投降在受降书上的签字仪式。1946年6月任陆军大学校长。他在1948年12月底的孙科内阁和1949年初的何应钦内阁中任国防部长，并在1949年6月的阎锡山内阁中任不管部部长。同年秋，他率陆军大学师生迁往台湾。

1950年，徐辞去部长职务，1951年春辞去陆军大学职务。1952年他成为陆军一级上将及战略顾问委员会委员。1952—1956年充当蒋介石的总统府资政，

1954年任光复大陆设计研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1959年7月12日死在台北,年六十九岁。

徐永昌有三个老婆,二个儿子,三个女儿。一子任台湾银行稽核,另一子幼年夭折。

1941年7月,徐永昌发表了一篇名为《四年来敌我战略、战术的总探讨》的报告,分析日本征服中国之失败。他还保存了自1916年1月1日起到1959年7月7日的全部日记。

薛 敏 老

西名:阿尔赛·若·西赛柏

薛敏老(1887—),菲律宾的银行家,公众领袖,协助成立中兴银行,1939年任该行总经理。他大力改进菲律宾的社会经济情况。

薛敏老祖籍福建厦门,他本人出生在马尼刺,他父亲是一名杂货商。薛敏老回国进福州英华学院,1905年进美国密执安州的安亚伯中学,1908年毕业后,进密执安大学法律学院,成绩列为“甲”等,在校最后一年时,曾任《法律评论》副主编。1912年毕业后回马尼拉,以优异成绩通过律师考试,开始挂牌当律师。

1921年薛敏老受菲律宾华侨商业界重托,为了菲律宾簿记法而去美国,因为第2972号名为“帐册使用的文字,以及违令应得的处罚”法令,旅菲华商认为此法令苛刻不公平,对其业务不利。薛敏老代表菲律宾马尼拉中华商会上书要求取消该法案。请愿书由美国总督伍德批注,将此法令的实施延至1923年1月1日(原定为1920年11月1日)。就在这延缓期间,薛敏老代表菲律宾华商去美国。他和华盛顿的高级官员并无直接关系,因此去探望密执安大学法律学院院长贝茨请他帮助。贝茨为他写信介绍海军部长登比、司法部长多尔蒂,并取得一份有关议员名单以便一一拜访。薛敏老在华盛顿,和陆军部长、海外事务局长、参众两院海外委员会主席研究菲律宾簿记法中的“苛刻和不合理”的条例。据薛敏老说,这些人都被他说服,认为华商的要求正当,并向他保证将尽

力争取废除这一法案。薛敏老撰写一份有关此案的备忘录，分送华盛顿的一些高级官员。他给贝茨写的一封信中说，此行颇为成功。1922年，薛敏老从菲律宾给贝茨送去一把雕花挑花心木座椅表示感谢。

1920年，著名木材商，马尼拉中华商会主席李清泉认为旅菲侨商需要有一家自办的银行，他决定开办中兴银行，法定资金为一千万比索，邀薛敏老协助筹办。李清泉任总经理，薛敏老任副总经理。中兴银行于1920年8月16日开业，1925年在厦门设分行，1929年于上海设分行，办理海外华侨汇款。1939年李清泉去世，自1940年起至1951年薛敏老任总经理及董事长。中兴银行的业务稳步发展，推动成立了另几家自办的私人商业银行。

日本占领马尼拉，薛敏老拒绝与日方合作，于是他的银行为日方攫取，全部资产没收。1942年他被日方逮捕并判处死刑，后又改为二十年徒刑。监禁不到两年，因日方大赦政治犯而获释。菲律宾解放后，薛敏老面临着恢复中兴银行的问题，不到几年，该行又居于当地金融界首屈一指的地位。

薛敏老经营中兴银行，给菲律宾人士同等待遇，为商、农、工各业贷款。该行复业后不久，薛敏老响应商界号召，把中兴银行的资财提供给大小商界人士和商行，从事战后的复兴。1947年、1952年、菲律宾商界出版协会选举薛敏老为“本年的杰出银行家”。1952年，菲律宾政府鼓励使用本地原料，中兴银行为这些新兴的工业提供信用贷款。1959年工业编辑理事会授与薛敏老以“银行业泰斗”的称号。

中兴银行的成就大部分归功于薛敏老和他前任的经营得法。薛敏老本人为他的同人树立了一个榜样。他是一个正直无私并富有献身精神的人，他的踏踏实实的经营方针成了菲律宾私人银行的传统。

薛敏老还致力于菲律宾社会福利和经济发展。稻米生产是全国的一个主要问题。1953年，薛敏老主持纪念贝纳兹稻米委员会，与农业资源部合作，举行了全国第一次稻米生产竞赛，促进了农民提高产量。这样的竞赛以后成为全国农业生活中的经常性的特点。他响应马格沙赛总统的号召，在全国各村修建自流井，薛敏老在1954年成立了一个自由自流井协会。谁捐款开一口自流井，就可以将他所爱慕的人之名字刻在井边作为纪念。薛敏老对公益事业亦很关心，他是

马尼拉警察信托基金、全国红十字会、大马尼拉团体公款、残废儿童救济医院、基督教青年会等组织的有力支持者，他还是沙里曼大学的董事。

为了向美国争取更多经济援助，以便早日解决菲律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所受损失。他于1950年、1959年先后发表了《美国对菲的经济援助》、《美国的援助和菲律宾的要求》两本小册子。

薛敏老改进菲律宾经济社会情况的努力，对菲律宾人和华侨都有好处，从而又增进了两者的和睦关系。1929年12月上海圣约翰大学授予他名誉法学博士学位，他是菲律宾华侨获得此荣誉学位的第一人。1955年密执安大学也授以同样学位。

薛 岳

字：伯陵

薛岳（1896.12.17—），国民党军事指挥官。1935年追袭共产党长征部队，1939年，1943年阻击日军，出色地保卫了长沙、常德，因此闻名。1939—1945年任湖南省主席，1949年任广东省主席。

薛岳出生于广东乐昌县。1907年十一岁时去广州进黄埔陆军小学，同学中有邓演达、叶挺等人，1910年毕业。那时，朱执信等同盟会革命党人，准备在该地区进行革命起义，薛岳在校时已积极参加同盟会的活动。

1914年薛到武昌进陆军第二预备学校，在校学习两年，又在部队见习半年后，1916年进保定军官学校第六期。1918年离保定军校，投入陈炯明的“援闽粤军”，薛岳在邓铿手下当参谋。1920年8月，“援闽粤军”回师广东驱逐桂系军阀，薛岳任少校连长。

1921年，邓铿奉命成立孙中山总统府的警卫团，由薛岳、叶挺、张发奎分任该团的三个营长，陈可钰任团长。1922年6月，陈炯明部围攻总统府，薛岳叶挺坚强抵抗，得使孙中山及其夫人平安转移到珠江口的军舰上。孙中山到上海后，任许崇智为讨贼军东路总司令，蒋介石为参谋长，薛岳为参谋。1923年，陈炯明被逐出广州后，薛岳任团长。

1925年，孙中山去世，国民政府在广州成立，改编粤军为国民革命军，蒋介石为第一军军长，薛岳在第一军中任团长，1925年第二次东征时，任第十四师副师长。薛岳的勇敢和才能得到了报赏，1926年春，任第一师副师长兼第三团团长，军衔为少将。1926年夏，北伐开始，薛岳部担任预备队。9月，奉命率部由湖南入江西，击败孙传芳部，进军浙江。1927年3月20日，与其他部队占领上海。

这时，薛岳与上海战线的前敌总指挥白崇禧意见不合，辞职回广州。他应李济之邀任新编第二师师长。1927年10月，张发奎率第四军回广州，发表声明反对南京当局。李济离广州，张发奎任军事委员会主任，改编粤军，薛部改编为第四军教导第一师。

1927年12月，中国共产党成立广州公社，薛岳协助镇压。在此事变后，张发奎被解除职务，缪培南任第四军军长，薛岳为副军长。1928年1月，该军与从前的友军陈铭枢的第十一军开战，1月9日，蒋介石下令停战。第四军奉命北上，在占领北京、天津的战役中立了功。7月讨论缩编国民革命军，要求第四军首先缩编以资示范，薛岳拒绝了新编的第四军参谋长的任命回到九龙。

1930年2月，第四军恢复原有编制和番号，薛岳又任该军第三十五师师长，出征陈济棠、蒋光鼐未成退回广西。5月，张发奎、李宗仁支援北方阎、冯联盟，向湖南进军。薛岳部的后卫部队在衡阳、祁阳一带被截断，他主张向江西推进然后进入浙江，但为其他将领所否决。他率兵南下，结果在衡阳附近与蒋光鼐、蔡廷锴部队激战失败，第四军残部撤往桂林。7月14日，李宗仁任薛岳为第四军第十师师长。

1930年10月，滇军进入广西，薛岳师迎击，10月25日，薛岳受伤放弃了师长职务，12月15日任中央军校柳州分校校长。1931年5月，广州分裂运动，薛岳辞职，去九龙居住。

薛岳在此期间无所活动。1933年5月，应蒋介石之召任第五军军长，1933年秋，在第五次反共战斗中，任北路军第六路总指挥，率吴奇伟的第四军向江西的共产党军进袭。1934年3月，国民党军发动进攻，薛岳在战役中遇到林彪，彭德怀等强大对手。

1934年10月，中国共产党不能对付国民党军的猛攻，突围长征。薛岳奉命追击，随共军之后进入湖南、经广西，到贵州。自1927年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后，这是国民党部队第一次进入贵州。

1935年1月7日，中国共产党占领遵义，威胁贵州省会贵阳。薛岳率第四军赶到贵阳郊区，贵阳未被占领。蒋介石深恐共产党将以遵义为基地，即调川军、黔军，3月12日，第四军和川军收复遵义，共产党军队进入云南。

云南省主席龙云支持追击共产党的部队，因此，蒋介石任龙云为第二路军总司令，薛岳为第二路军前敌总指挥，统率黔、滇各军。薛岳率部进入云南，1935年5月4日在昆明成立前敌司令部。共产党得悉乃北向四川，薛岳继续追击。

1935年7月11日，蒋介石在成都召开的一次会议上指出薛岳所部徒步二万里、在艰险地区追击敌军，功绩空前。薛岳率部到成都后，8月，又继续北进。9月，蒋介石又命令他率师回南充，另一部则向甘肃武都挺进，以完成川北，陕南的包围。

共产党军队于1935年11月23日攻占荣经，建立川、滇、黔边区以便东向成都、南向与贺龙部队会合。川军无力阻截，薛岳前去援助，他以一部份兵力守卫成都，另一部分兵力于12月15日去荣经取得胜利。1936年2月14日，重占天全，得以确保成都、重庆的安全。

1936年的一部分时间，薛岳计划修建四川西康公路以利作战。不久，又奉令率军回贵州。1937年5月就任贵州省主席。7月，中日战争爆发，任薛为第三预备军副司令长官。他一再要求上前线，乃于9月任第十九集团军总司令。沪、宁、杭地区失陷后，任第三战区前敌总司令。保卫皖南和收编溃散队伍，是他的两大任务。1938年5月，薛岳去河南指挥兰封之战，给日军以沉重回击。以后，他曾短期任第一战区前敌总司令。6月4日，他派军队掘开黄河黄道口（花园口）堤岸，洪水泛滥，以此阻日军西进。6月10日，薛岳离第一战区去江西协助保卫武汉，他的部队虽尚能战，但日军终于在10月25日占领武汉。

1938年11月12日，湖南省主席张治中误信传说敌军逼进，长沙付之一炬。蒋介石令薛岳任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设指挥部于长沙，1939年4月，并任湖南省

主席。1939年9月、1941年9月、1941年11月，他多次成功地击退了日军对长沙的大规模进攻，因此增加了他的军事声望。1943年11月，日军进攻常德，该城属于第六战区，原不在薛岳的军事管辖范围之内，但地处湖南，他是湖南省主席而责无旁贷，因此他派出军队迫使日军撤走。陈纳德将军在《一个战士的道路》一书中说薛岳在战略和指挥战斗上都胜过史迪威将军。薛岳虽作了努力，但是长沙和衡阳终于在1944年6月18日和8月8日先后为日军占领。

1946年5月，战争结束不到一年，薛岳继顾祝同任徐州绥靖公署主任。徐州面对着陈毅、刘伯承共产党军队不断增大的威胁，九个月中，薛岳击破了陈毅山东临沂的基地，迫使其撤往山地，刘伯承亦被迫渡过黄河撤退。在薛岳即将完全收复山东之前，由于政治上的原因，他离去该职而由顾祝同继任。薛岳被任命为蒋介石国民政府参军长。

1949年初，薛岳任广东省主席，希望他能为国民党保持该省作为国民党基地。但局势发展非他之力所能及，1949年10月，广东落入共产党之手，薛岳乃去台湾，任蒋介石的战略顾问委员会顾问，1958年任不管部部长。他在台湾被公认为一名广东将军中的前辈人物。

胡 汉 民

原名：胡衍鹤

别名：胡衍鸿

字：展堂

号：不匱室主

胡汉民（1879.12.9—1936.5.12），革命领袖，孙中山的亲密伙伴，民国广东省第一任都督。1924年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中央政治委员会七名委员之一，1928年9月至1931年2月任立法院院长。他在1931年的被捕，加速了广州的分裂活动。

胡汉民祖籍江西庐陵（今吉安），他的祖父是广东一个清朝官吏的幕僚，后来就在那里落了户。他父亲胡文照在不少府县衙门当过刑名师爷，他的家就

转徙广东各地。他母亲文氏出身江西萍乡诗书门第。胡汉民生在广东番禺县，该县是首府广州所在之地。胡汉民有两个哥哥、两个弟弟、一个姐姐、一个妹妹，但七人中除他长兄，幼妹和他本人外余均早死。

胡汉民十一岁时读完了基本的典籍，表现出写文章才能。1891年秋父亲死去，胡汉民当时只有十三岁。两年后，他母亲亦死去。1894年，胡汉民和他长兄充当塾师维持家庭生计，那时他只有十六岁，许多学生都比他年长。

1894—1895年中日战争中国战败，唤醒了中国年轻一辈起而接受革命思想。那时胡正在阅读中国历史著作。胡汉民对十七世纪忠于明朝的爱国者顾炎武、王夫之的著作印象尤为深刻，因而痛恨清王朝。他由广州的基督教徒中知道了孙中山。

胡汉民对反清革命运动有了更多了解后，决定去日本参加这个革命运动。为了筹集旅费，他在1898年到广州的一家报社工作，即以能文见称。同时，他又决定为替没有学力而想取得功名的富人作为枪手应科举考试。因此，他首先取得功名，1900年应科举中举人，然后代人应试取得报酬，筹集所需费用。

1902年初，胡汉民到日本，进东京弘文学院师范部。不到几个月，发生了一件有关吴稚晖和驻日公使蔡钧的事件打断了他的学业。该年7月，中国使馆拒不推荐蔡锷和其他两名学生进日本军校。吴稚晖发起一个运动来抗议，胡汉民是这次运动的领导人之一，结果被迫退学。

1902年底，他回广州在《岭海报》任编辑，他与广州康有为等保皇派的《羊城报》进行笔战，胡汉民的活动引起当局注意，列入活跃的革命份子名单之中，因此离广州去广西，在梧州中学当教员。他深受学生拥护，在学生中间传播革命思想。梧州中学学生后来有不少人参加1911年革命，支持孙中山建立民国的主张。

1904年胡汉民和陈淑子结婚后不久，第二次去日本，他还带了一批学生同行，其中有汪精卫，他们成了至交，1904年秋一同进了东京法政大学。翌年夏，胡汉民回广州度暑假，又和妻子、妹妹及廖仲恺回日本。1905年8月20日同盟会在东京成立，胡汉民、廖仲恺在十天后到日本，立刻加入了这个革命团

体。汪精卫是负责同盟会的三个主要委员之一，胡汉民是委员。此后不久，孙中山派胡汉民为总会秘书。

胡汉民对早期革命运动的贡献，是1905年11月、在东京创办的同盟会机关报《民报》上写文章，开始用汉民署名。胡汉民仍在法政大学读书，1906年毕业。同盟会之成立，会员纷纷期望采取革命行动。1906年，不少会员回国举行多次未获成功的起义。孙中山到法属印度支那、马来亚等地访问，在那些地方建立了同盟会分会。

清政府要求日本当局驱逐孙中山，孙去印度支那、马来亚。同行者有胡汉民、汪精卫等人。他以河内为据点，在那里指挥粤、桂、滇南方三省的革命活动。他们训练了一支小小的革命部队，并安排由日本同盟会总部送来军火供应。1907年4月，胡汉民去香港鼓动，作粤东地区起义准备、5月在汕头、6月在惠州起义，但都被政府军粉碎。9月钦州的起义也失败了。

1907年9月底，胡汉民回河内。12月，广西边境发生暴动，黄兴、胡汉民陪同孙中山立即由河内赶去参加，起义部队已经占领了镇南关。清军陆荣廷立即前去，一天后就赶把他们赶走，撤入法境。孙、胡、黄回河内。法国当局在清政府的要求下把孙中山逐出印度支那。1908年3月，孙中山被迫离河内去新加坡，准备在那里募款购置军火，送往再次去广西组织武装起义的黄兴和留在河内的胡汉民。钦州起义失败后胡汉民为躲避法国当局的侦查，藏身在河内一家成衣铺顶楼上的革命党人的指挥所内，有两个多月不敢上街。

1908年7月，胡汉民离河内去新加坡与孙中山会合。华南军事上的一再失败，使马来亚的残余革命力量灰心丧气，并使同盟会在东南亚华侨中的威望严重受损。那里的华侨团体不愿再给孙中山的事业以捐款。孙中山等人仍试图在东南亚发展同盟会组织，谋取可能的援助。孙中山在新加坡成立了一个新的同盟会总分会控制东南亚的活动，胡汉民为会长。又创办了《中兴日报》，胡汉民和汪精卫是两名最有影响的撰稿人。在募捐工作方面，革命党得到了一名很有才能的人物邓泽如的支持，他成为胡汉民的好友。同盟会还在暹罗开展活动，肖佛成是该地的热心支持人。

孙中山决定去欧洲，想在法国取得一笔借款。1909年5月，他在香港成立

同盟会华南分会，筹划南方各省的革命活动。那时，陈炯明和邹鲁、由孙中山的亲信朱执信介绍、参加了革命活动。胡汉民任华南分会会长，汪精卫任秘书。但汪精卫对革命活动屡遭失败感到沮丧，决心谋刺摄政王。他因有这项秘密活动计划，因此对分会的工作很少贡献。胡汉民曾试加劝阻。华南分会当时计划在广州新军中策动兵变，在香港和胡汉民一起活动的是前新军统带赵声，因同情革命受嫌被解职。但兵变计划泄露，乃提前两周于1910年2月12日发动，结果又遭失败。

胡汉民、黄兴、赵声于三月离香港去新加坡募捐以谋再次活动。胡汉民于1910年3月28日到新加坡，数日后传来汪精卫谋刺摄政王未成，在北京被捕的消息。胡汉民估计汪精卫将会被处死，对此极为担忧，后又获知汪精卫被判处无期徒刑，胡汉民和陈璧君（她后来成为汪精卫的妻子）合力营救。胡汉民甚至曾准备亲自去北京，陈璧君劝阻了这一显然徒劳无益的冒险。

1910年7月，孙中山由欧洲到新加坡，后又去檳城于11月13日开会研究策略。此会出席者有胡汉民、黄兴、赵声、邓泽如以及马来亚华侨头面人物。计划在广州进行全面出击。孙中山因受东南亚等地殖民当局及政府的限制，不能活动，乃又去欧洲进行募捐。黄兴、赵声到香港准备起义，1911年3月，胡汉民也前往参加。

1911年4月27日下午，由黄兴亲自领导的黄花岗起义在广州举行。胡汉民、赵声、陈璧君等二百多革命党人，未能提前赶到，当夜趁轮由香港到广州。翌晨到达时，起义已失败，胡汉民当夜又回香港。

黄花岗起义虽遭失败，但引起全国注意而导致了1911年10月10日的武昌起义。武昌起义后，全国各地纷纷起来反对清政府。广东的陈炯明、朱执信、胡毅生及支持革命活动的人物、集中力量向广州进袭。当时，胡汉民尚在河内，他得此消息后，即率领一批志愿参军的华侨青年回到香港。广州的清政府当局投降，1911年11月9日在一次会议上，胡汉民缺席被推举为广东都督。11月12日，胡汉民到广州就职，陈炯明被选为副都督。

孙逸仙由国外归来，1911年12月21日到达香港准备去上海。广东首领人物请孙中山来广州成立政府，派胡汉民、廖仲恺去香港迎接，并提出上项意见。

孙逸仙不同意，反而邀胡汉民一同北上，胡汉民和孙一同到上海，廖仲恺回广州，将广州政府职权委托给陈炯明。

1911年12月25日，孙中山和胡汉民到上海，他们会见了上海都督陈其美，受到黄兴和从北京出狱的汪精卫的迎接。1911年12月29日，孙中山被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于1912年1月1日在南京就职，胡汉民任秘书长。胡汉民在去南京前，从旅沪粤籍同乡中募集了七十万元，资助新政府的财政开支。

1912年2月，孙中山将临时大总统一职让给袁世凯，胡汉民回广州，重任广东都督。1913年，袁世凯对国民党（其前身即为同盟会）施加压力，6月，陈炯明继胡汉民为广东都督。在此不久之前，李烈钧也被免去江西都督之职。国民党首领于是展开了反袁的运动，即称之为第二次革命。北洋军队训练有素，远较革命军为强大，所以这次运动很快就被镇压下去。孙中山及其他革命首领，其中包括胡汉民，被迫逃到日本。

1915年，袁世凯称帝野心已很明显，孙中山等人又起而反袁。当年的大部分时间，胡汉民在菲律宾为反袁活动筹募费用。1916年初，陈其美回上海指挥该地区的活动，胡汉民访问菲律宾后，在东京作短期逗留后即回上海，与陈其美会合。当1916年5月陈其美被暗杀时，胡汉民就住在凶案发生地点的楼上。

1916年6月，袁世凯死去，黎元洪在北京继任总统。9月，胡汉民代表孙中山去北京和黎元洪及内阁总理段祺瑞商讨国事。此行的重要目的是促进华北革命党人的团结，特别是在国会中的议员。

1917年5月，北方集团各督军反黎，6月的强迫解散国会导致孙中山发动了一次“护法”运动。1917年7月，孙中山在海军的支持下在广州召集非常国会，成立以孙中山为首的军政府。胡汉民任该政府的交通部长。但是当时广东省为陆荣廷、岑春煊的桂系军阀所控制，孙中山发现无法实际行使职权，1918年5月离广州去上海。

胡汉民随同孙中山去上海。此后两年中，胡汉民致力于宣传孙中山的建国主张和他的政治社会思想。1919年8月，他和朱执信、廖仲恺、戴季陶办了一份《建设杂志》，发表了他在政治理论（包括社会主义）方面较有系统的文章。孙中山及大多数信徒从不接受马克思主义，但他的有些亲密追随者，尤以

胡汉民和戴季陶为最著，却从保守的、民族主义的立场为社会主义的某些内容作辩护。胡和戴都认为中国最主要的政治问题是如何成为一个强大的民族主义国家。他们论证说，将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论中阶级斗争的成分予以冲淡，并加强民族主义的应用，马列主义是民族主义政治纲领的一种可接受的理论。他们承认唯物史观，平均财富的理想，并指出在中国古代哲人的著作中也有类似的理论。

这一期间，胡汉民试以唯物史观评价中国的历史、哲学和制度。他在1919年10月第三期《建设杂志》上发表了《从唯物主义对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一文。胡汉民在1919年12月第五期上发表了《对唯物史观批评之批评》。这篇文章逐条批驳李大钊在《新青年》5月19日马克思主义专号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

1921年5月5日，孙中山回广州复职，胡汉民任总参议兼文官长和政治部长。桂系军阀的势力逐走后，1922年孙中山又计划开始北伐。这个计划受到陈炯明的强烈反对，1922年6月，他进而采取反孙的行动，逼孙中山逃到珠江上的军舰中避难。

陈炯明搞政变时，胡汉民正在孙中山大本营的韶关前线司令部。北伐军已经有一支先头部队进入了江西，攻克了赣州。胡汉民在前线司令部负责指挥作战，他听到这一消息后，立刻从赣州回师向广州进军、回击陈炯明。陈炯明收买了一部份粤军，许崇智指挥的粤军仍效忠孙中山，湘、赣、滇各军都支持孙中山。经决定，胡汉民、许崇智率粤军入福建，李烈钧率其它部队进湖南指向广西。胡汉民和福建地方军阀达成一项和平协定，许崇智得以率部进福建进行休整。胡汉民在福建时，知道孙中山已安全到达上海，立刻赶到那里。

1922年9月，孙中山召集国民党员开会，宣布改组国民党，并指定委员会研究改组的问题。11月，该委员会推举胡汉民、汪精卫起草改组宣言，于1923年1月1日公布。孙中山得到滇军、桂军的协助，于1923年2月将陈炯明逐出广州，重建军政府。胡汉民解除广东省长之职，专任大本营的总参议。

1924年1月，国民党在孙中山亲自主持下、在广州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一项重要目的是要按照列宁主义的路线改组国民党。大会选出胡汉民为第

一届中央执行委员。1924年5月黄埔军校成立，胡汉民任政治教官。1924年7月，胡汉民任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七人委员之一。

1924年9月，孙中山又转而策划北伐，并将大本营迁往韶关。胡汉民留守广州、代行孙的职权，并再次任广东省长。胡汉民刚一就职就遇到广州商团的挑衅，这是香港的英国保守势力，是陈炯明支持的。胡汉民调动了广州一切可以调动的武装力量，并任蒋介石为警备司令。10月中旬，暴乱平息。

1925年3月孙中山去世，这对国民党和全国都有深远影响。胡汉民在广州面临的迫切问题是杨希闵、刘震寰滇军、桂军叛变的威胁。他像处理商团事件一样，采取坚定措施。经与许崇智、蒋介石商量后，胡决定用武力解决不受约束的部队。中央政治会议俄国顾问鲍罗廷坚决反对这种做法。胡汉民驳斥了鲍罗廷的抗议，1925年5月用了两周时间就平定了桂、滇军的叛乱，证明了他的判断正确。

国民党的领导人面临着一个继承人的棘手问题。一般认为主要的候补人按顺序排列应系胡汉民、汪精卫、廖仲恺。他们都是同盟会元老，又与孙中山共事多年而深受信用。事实却又很明显，那就是没有一个人能代替孙中山的地位，得到共事者同样听命的希望。以胡汉民为事实上的主席的中央政治委员会于1925年7月开了一系列的会，决定成立新的国民政府。1925年7月1日新政府正式成立，有政府委员十六人，其中五人组成常务委员会：胡汉民、汪精卫、廖仲恺、许崇智、谭延闿。汪精卫当选为国民政府主席，胡汉民为外交部长。这一发展，后来引起了胡、汪的分裂。

1925年8月30日，国民党领导权的基础本来不稳定，又因财政部长廖仲恺遇刺而更为动摇了。廖仲恺被刺身死这个谜从未揭破，但是胡汉民的堂弟胡毅生，他是一名老革命党人、被疑为幕后指使者，因他曾公开斥责廖仲恺的亲共观点。胡毅生逃出广州。胡汉民虽未被指为此案的共谋者，但也不得不退出政界的活动。国民党派他去苏联考察党组织和政治经济情况。1925年8月22日，他离开广州，10月18日到莫斯科。他只受到礼貌的接待，让他作过几次讲演。1926年2月，他出席共产国际第三次大会，并提出国民党参加这个组织的申请。他因此会见了斯大林，但接纳国民党一事却被搁置。

胡汉民在苏联时，国民党于1926年1月在广州召开了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大会全由汪精卫操纵，一大批汪派的人选进了党的中央机构。胡汉民再次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政府委员。他又是执行委员会的常务委员，党中央劳工部长。

1926年4月，胡汉民回国，直到1927年春，他在上海无所活动。国民党内的反共首领和武汉政府破裂。4月18日在南京成立政府，胡汉民被选为该政府主席。他的第一件官方行动就是下令逮捕鲍罗廷及将近二百名共产党员，其中包括总书记陈独秀。他只担任了四个月的主席，8月间离南京去上海。那时武汉政府的首领也开始反共。9月，国民党两派重新联合。

1928年1月，胡汉民由他女儿胡木兰、孙科、伍朝枢陪同去欧洲旅行。他们途经新加坡时，曾出席当地华侨界的一些招待会。2月8日的招待会上，伍朝枢遇刺受伤。后来发现凶手系共产党人，原准备刺杀胡汉民，胡因另有约会而未出席那个招待会。胡汉民到了土耳其，他对凯末尔领导下的土耳其国家近代化的成就大为赞赏，他在安卡拉和土耳其总理伊诺鲁作过长谈。他对土耳其共和国的成就印象极为深刻。他又到法国、德国、意大利、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访问，1928年8月回国。

1928年9月，胡汉民到南京，次月，新的国民政府成立，胡汉民任政府五院之一的立法院长。1930年，扩大会议的冯玉祥、汪精卫、阎锡山反南京活动失败后，南京政府决定召开国民会议实施临时宪法。这原是扩大会议派要求中的一项，这些要求是有一定政治吸引力。胡汉民对中国政治的进展有顽固的看法，坚决反对制订宪法。胡汉民认为，根据孙中山的观点，在国民党一党专政下，实行训政是必要的，训政取得效果后才能开始宪政。他的这种毫不让步的立场，引起他和蒋介石的公开冲突。

1931年2月28日，胡汉民辞去立法院长，不久被蒋介石软禁起来送往南京附近的汤山。胡汉民的被监禁，使国民党出现了另一场重大危机。4月30日，国民党监察院的四名元老，因胡汉民被非法拘捕对蒋介石提出弹劾。这四名元老是：林森，他已继任为立法院长；古应芬，他是1905年首创时就加入了同盟会的会员；肖佛成和邓泽如，他们是海外华侨的首领，早就是胡汉民亲密的老朋友。

广东的军界首领陈济棠立刻表示支持。反蒋的国民党首领于1931年5月27日在广州成立“中央执监委员非常会议”，其中有国民党首领人物汪精卫、孙科、唐绍仪、陈友仁、陈济棠、李宗仁等。

这次非常会议后第二天，在广州成立了一个反对派政府，内战危机在即。1931年9月18日日军侵占东北，突然出现的民族危机使宁粤对立得以缓和。在严重的威胁面前，南京、广州双方首领进行和平谈判。胡汉民获得释放，长期敌对的党政派系重新联合。胡汉民释放后，于1931年11月底去广州，参加10月间逝世的老友古应芬的葬礼。胡后来住在香港。广州的分裂政府虽已取消，但成立的一些机构使两广仍保持实际自治的状态。例如国民党西南执行总部，西南政务会议。胡汉民身居香港，但对南方各省首领，如陈济棠、李宗仁等人，予以精神上的支持，这些人的行动方针有时和南京政府的政策和命令并不一致。

1933年2月，胡汉民创办《三民主义月刊》，发表了不少他的有关孙中山政治思想的文章，他自认为是孙中山政治遗志的继承人和正统解释者，他曾编有《总理全集》五卷，于1930年出版。1933年3月，汪精卫由法国回国，途经香港，访问了胡汉民，试图说服。这是这两位老友最后一次的会晤，但无成果。

1933年11月，陈铭枢、李济聚、在第十九路军的支持下发动福建事变，在福州建立了一个短命的人民政府，胡汉民也被列名于内。胡汉民却参加广州首领的活动，致电福建叛乱者，谴责他们的行动，籍此表白。此外，他对时局还发表了个人声明，一方面谴责福建事变，同时也对蒋介石等人的政策，表示明显的不满。

1935年6月，胡汉民离香港去意大利、瑞士、德国、法国旅行，1935年底离法国，1936年1月19日到香港。当时，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1月在南京召开，他再次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国民党派了两名元老居正、叶楚傖于1936年初去香港，请胡汉民回南京到中央党部工作。他答应于春末回国。他回到广州，1936年5月12日中风死去，年五十六岁。1936年7月13日，举行胡汉民的国葬仪式，葬于广州东北郊。胡汉民遗有妻陈淑子、女胡木兰，自1925年以来，胡木兰经常陪伴他父亲出国。

蒋永敬的《胡汉民先生年谱稿》是有关胡汉民经历的最完备的记录，该书于1961年在台北出版。

胡 霖

胡 政 之

胡霖（1893—1949），1916—1925年任《大公报》总编辑，1926年任该报及其海记公司的一些有关企业的总经理。1942—1945年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1945年作为中国代表团的无党派人士出席旧金山召开的联合国国际组织大会。

胡霖的身世和幼年情况不详，只知道他在四川出生上学，在日本进大学，主修法律和科学。他于1911年回国后，在上海通过律师甄别考试，曾一度做过家庭教师，以后就进了《大共和报》工作，翻译日文新闻。他善于写作，不久《大共和报》及上海其它报社都请他撰稿。

1914年，胡霖曾任江苏镇江地方审判厅推事，1915年到北京法政专门学校教书，并任《大共和报》及其它上海报社的北京通讯员。1915年日本提出二十一条，当时国内封锁新闻，记者又无法从参预谈判的高级官员中获得消息。胡霖由于通日文和英语，他从驻北京的外国记者，例如：合众通讯社的穆尔、伦敦《每日新闻》及《芝加哥论坛报》的翟理斯，得到一些有关谈判的消息和日本要求的内容。因此，他能为他的上海各报写出独一无二的报道。

1915年中期《大共和报》被封闭，胡霖去吉林任交涉署和财务厅秘书。1916年回北京，任内务部参事。就在这时期，他担任了《大公报》总编辑。《大公报》原由英敛之于1902年创办，在京津地区销行很广，以富于建设性和公正不偏而闻名。1913年英敛之离总编职后，该报经营乏人，方针不定。胡霖接任总编，决定恢复该报过去声誉。1918年，他用两年的时间遍访了二十多个国家，增进他对世界时局的知识，并扩大《大公报》新闻内容。他从国外寄来的通讯，尤其是关于巴黎和会的消息，国内人士以先睹为快。

1920年回国后，他在北京创办了《新社会报》。第二年他去上海创办《国闻通讯社》，成为国内第一流的新闻通讯社，又创办了《国闻周报》，他兼任

这两个企业的社长和总经理。

1926年，英敛之去世，《大公报》短期停刊。9月，在吴鼎昌主持的一个股份公司——海记公司下进行改组，胡霖任《大公报》社长，张季鸾任总编，这家新公司还管理《国闻通讯社》和《国闻周报》两个企业。

《大公报》改组时，恰好是北伐战争时期。该报赞助国民党的宗旨，强烈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胡霖并未参加国民党，但他赞成北伐和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国民党巩固了政权，《大公报》的影响和发行数也随之增加。当时《大公报》还在天津，比之在南京、上海地区的报纸来说，有较多的编辑自由，因此该报以自由派报纸见称于时。

1936年4月，《大公报》出上海版，部份原因是由于日本对华北的威胁增加。1936年9月，《大公报》改组十周年时，有职员七百人，总发行量十万份，《国闻周报》发行量约为二万份。这些成就，说明了胡霖的经营和办报的才能。

1937年中日战争开始后，津、沪两地的《大公报》都停刊了。胡霖去香港，利用从天津运去的器材另出新版，上海的该报工厂则于9月迁往汉口，10月又迁往重庆，在那里又出新版。重庆版《大公报》虽然赞同国民政府的战时政策，但对政府的许多政策进行了尖锐的批评。香港版《大公报》于1938年8月13日发行。

香港沦陷后，胡霖到了重庆，1942—1946年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1943年11月参加由王世杰率领的代表团去英国，12月3日到伦敦，1944年3月27日经美国回到重庆。1945年，胡霖以中国代表团无党派人士代表参加了在旧金山召开的联合国国际组织大会。他利用第二次出国的机会，和厂商面谈或通信购置印刷器械，准备在战后扩充《大公报》。

1945年，战争结束，《大公报》津、沪、港各版迅速复刊。它成为当时国内最强大的报界综合企业。在国、共争夺大陆的斗争中，《大公报》坚定地倾向共产党。

1949年胡霖因病去世，《大公报》继续在北京、香港出版，但是该报的传统方针和传统观点，也随着胡霖而消失了。该报成了中央人民政府的一条新闻

渠道。

胡 适

字：适之

胡适（1891—1962.2.24），人才荟萃的北京大学的首席人物。他在推广用白话文写文章的努力点燃了二十年代的文学与文化运动。他是杜威的门徒，用西方的哲学术语和方法来重新阐明中国的古典思想。他的白话文学的历史研究是很重要的著作。从1937年到他死时，他在国内的时间只有六年。1938—1942年任驻美大使，1958年任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

胡适安徽绩溪县人，生在上海。出生时，他父亲胡铁花在上海麓卡任巡查，他母亲冯顺弟，是他父亲的第三房妻室，胡适是冯氏的独子。1892年胡铁花调往台湾，次年全家随去。胡适和他母亲于1895年回安徽绩溪县，他父亲留在台湾任台东直隶州知州，直至该年夏。他父亲在八月中由台湾渡海到厦门，登岸不久即去世，可能是死于脚气病。年方四岁的胡适，由他母亲和叔父抚养。冯顺弟不仅要抚养胡适，而且要抚养胡铁花前妻所遗的儿女，这是家道日衰的一部分原因。那几年家庭的窘况和经济的困难，是胡适最为深刻的幼年回忆。

1895—1904年，胡适在绩溪家塾中受业于他的叔父和族兄。他自称是一个早年颖悟的学生，四岁入学之前，他已认识一千多字。以后又受了初步传统教育，读了不少史书。他还耽心于通俗小说，这是常见的儿童课外读物。1904年，他和异母兄结伴去上海，想去受“现代”教育。他在上海住了六年，上过几个“新式”学校，在那里除传统课程外，还学了英语，西法算术和点滴科学知识。他曾进“中国公学”，这是1905年由留日学生办的一所思想激进的学校，他们大都支持革命运动。1906—1908年，胡适在“中国公学”上学两年，他对革命运动虽不热心，但参加学生的政治活动，编辑学生刊物《竞业旬报》。1908年，经济情况困窘，使他不能继续上学。他留在上海以教英语、当编辑来维持生活。

经济上的困难，使他有点放荡不羁，1910年春有一次醉后和警察口角而被拘留。经过此事后，他决心改正。经两个月努力准备，他去北京应庚款留美官费生考试，录取七十名，他是其中一名，8月去美国留学。

胡适到美国进了康纳尔大学农学院，因为那时普遍的想法认为中国迫切需要有技术专长的人材。但他对所学课程越学越不感兴趣，1912年初，转到了文理学院，主修哲学。他是一名高材生，1913年选入美国大学生联谊会。1914年4月，获得学士学位，又在康纳尔大学研究哲学一年。在此期间，他和同班同学赵元任成了至交。1915年夏，他读到了杜威关于实用主义的著作，9月，他进了哥伦比亚大学，由杜威指导写博士论文，1917年写成了博士论文《中国古代哲学方法之进化史》，论文试图从早期的中国哲学中探求“实用主义”的倾向。这预示了胡适将他对实验主义方法的认识用于学术研究。1917年6月，他离开美国，7月，回到离别七年的祖国在上海上岸。

胡适在上海和美国所受的教育，使他的观点在很多方面已不是传统式的，同代不少人，把他看作是一个欧化了的华人。但是中国的传统和态度，对胡适的知识和气质影响仍然是很明显的。他父亲是一个朱熹理学派的儒家。他写过一些表明这种信念的诗，他又受到他母亲及家中其他妇女虔信佛教的影响。胡适在理智上的大胆探索开始于他十或十一岁时。那时，他偶然看到《资治通鉴》里一些反对佛教的片段和朱熹的一些作品。此后，又受赫胥黎等人思想的影响，激发并加深了他的怀疑精神。这种思想成为他试图从习惯和传统中解放出来而进行斗争的主要武器。他在上海读了严复翻译的赫胥黎《天演论》。穆勒的《论自由》和孟德斯鸠的《法意》。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的文章使他对西方历史和知识有一般的理解，梁还使胡适注意到中国思想的其它方面。胡适在上海的几年，为他接受西方的思想打下了基础。同时，也正是在上海，他和他同时代的知识分子有共同肩负救国家于衰弱的重担和“扩大眼界”的使命。

胡适在美国时的知识发展中，课外活动的影响不下于他在大学正式课程的收获。他在一些中国留学生团体中很活跃。他的交游并不局限于中国留学生范围内。他通过康纳尔世界俱乐部的会员的关系，和国际学生联合会，以及第一

次世界大战期间兴起的一些和平主义组织发生了关系。威尔逊理想的国际主义对他印象很深。1915年，当日本向袁世凯提出二十一条时，他坚守和平主义的信条，呼吁“爱国的明智”，反对中国武力战斗。

胡适从1915年后信服实验主义哲学，这并不需要对他原有的知识立场作根本的改变。按照胡适的说法，杜威的实验主义的巨大感染力是对社会和文化建设的一种方法论的体制，这与胡适本人的中庸思想是协调的。胡适的性格与经验，他回国后宣扬的实验主义，在应用和理解方面更为具备条件。

1917年秋，胡适任北京大学哲学教授，他开始和中国最有名的高等学府建立了为时三十年之久的关系，其间有长短不同的间断。在1926年以前他除偶尔离开外，一直住在北京。他接受中英庚款基金会的任命后，取道东北、苏联去欧洲到伦敦，后又去美国。1927年春回国后，他在上海光华大学教了三年哲学。1928年4月到1930年5月，任母校“中国公学”校长，该校已成为设于吴淞的一所私立大学。他设法使之成为政府承认的正式大学，但因他批评国民政府的政策，触犯了一些南京官员，所以计划未能成功。1930年，他和老朋友当时的教育部长蒋梦麟商定，胡适辞去校长之职，“中国公学”则得到官方的批准备案。

他回北京，任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编译馆主任。自1926年以来，他一直是该委员会的理事，1931年初，校长蒋梦麟任命他为北京大学文学学院院长。胡适在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时一直在北京。其间，只有在1933年曾短期出国，去芝加哥大学哈斯克爾讲座讲学（讲稿在1934年编印成《中国的文艺复兴》一书出版）。1937年7月，胡适出席江西庐山会议，不久，由政府委派去欧美作友好访问。

胡适自1917年回国、到1937年出国之间的二十年间，他的知识活动和影响达到了顶峰。他作为传统知识的叛逆者、和用白话文代替文言文运动的首创人的声名，是他在美国留学的期间就已树立了。1917年1月，他的《文学改良刍议》一文，在陈独秀的很有影响的《新青年》上发表。以后还有不少论辩的文章，最著名的有《历史的文学观念论》、《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先后在1917年5月，1918年4月发表。他对文学革命的贡献，是从历史的联系，探讨文学的

形式和内容。他并非一个创造性的作家，在这方面的成绩，只不过一些短篇小说的译作和1919年出版的白话诗《尝试集》而已。不过，他却是一个条理清楚，明白易懂的散文名手。

胡适在北京，属于当时知识界先驱的《新青年》派这个小集团，其中有陈独秀、李大钊、钱玄同、周作人、周树人、高一涵、陶孟和、刘半农等人。文学革命不过是他们反对传统这个范围更广泛的运动的一个方面而已。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了不少文章，讨论文化更新和思想改革的问题：1918年6月发表了《易卜生主义》一文，讨论了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和个人的责任的问题。1918年7月，发表了《贞操问题》，9月发表了《美国的妇女》，讨论妇女解放的问题。1919年2月，发表的《不朽》一文，概述了他的人生哲学。杜威抵华前夕发表了《实验主义》一文，阐述了实用主义的基本观点。

作为杜威杰出的中国弟子，1919—1921年杜威在中国作巡回讲演的两年内，胡适十分活跃，他为杜威在北京及各处的讲演作翻译，并竭尽全力借杜威现身说法之机来开拓实验主义哲学的兴趣。胡适一再重申：实验主义的科学方法对解决社会、政治问题普遍适用，它的过程是，从怀疑开始，明确特定及具体问题，由逻辑推论而得出假定结论或答案和最后结果的妥善考虑。总之，他尽力使听众对这种方法和用途加以重视。

胡适大部份精力和时间用于以实验主义的方法来重新评价中国传统的各个方面。他在不少论文、评论和序言中讨论了这种学问的目的，如1923年的《国学季刊发刊宣言》，1928年的《治学的方法与材料》。他还写过论述中国哲学某些特点的著作。1919年，他以博士论文为基础，写出《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此书考证古代哲学家的著作的来源。他的这本《中国哲学史大纲》始终未能写完。1921年的《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和1928年的《几个反理学的思想家》中，讨论清代学者的作品，胡适认为他们具有“科学的”观点。这些对中国思想史的研究，其目的是要证实他的信念，即现代科学思想方法论有其中国渊源，因此可以视为并不与传统倾向完全抵触。

在其他学术研究的领域中，胡适力求表明实验主义方法对澄清中国文化史

上迄今未解决的问题是有用的。这种研究成果是他对几部白话小说巨作的来龙去脉的研究，从《水浒》和《红楼梦》开始，对其原作者和文字连贯性的问题提供了新的线索。他对白话文学的兴趣，使他着手研究其发展的历史，1928年出版《白话文学史》上卷，包括整个唐代。恰如他的哲学史著作一样，这本书亦未能写完，但有关这方面的一些讲演，分别收入1927年出版的《国语文学史》中。

胡适自称，他在政治上，一如在学术上一样，是一个实验主义者。他认为实验主义的态度和方法对考察当代的社会政治问题是很重要的，能够单独处理一些特殊问题，虽然很缓慢，但一定可以取得某些进步。这种单打一处理的逻辑，使他与不少有改良思想的知识界人士发生了争论。虽然他对中国传统文化及其在世界上的地位问题，仍然强烈主张要打破传统观念，但他坚决反对用革命手段来解决中国问题的一切努力。而且他对知识分子的政治活动深为怀疑。他一再重申他的信念，一个新的社会及理智的态度在几年或数十年时间内生根发芽以前，要想真正解决当前的中国政治问题是不可能的。

尽管胡适具有这样的信念，但也不得不表明他对政治问题的看法，尤其是在面对马克思主义和强烈的民族主义思想广泛传播的时候。1919年夏，他在《问题与主义》一文中，反对当时知识分子的那种对中国局势模糊笼统的分析，包罗万象的倾向。胡适不满的直接对象是陈独秀、李大钊和不少学生和青年知识分子所响往的马克思主义。胡适之所以反对马克思主义，是由于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在理性上是教条的，建立在经不起严峻考验的假设之上。起初他对马克思主义在政治和社会上的运用并未感到惊恐，并且当他在1926年目睹了共产主义在苏联的实施时，他对其纲领的目的性和苏联领导人进行试验的热情印象极深。一直到三十年代中期，他仍认为苏联的共产主义是西方政治发展合乎逻辑的继续，但他不相信其基本前提能适用于中国。他毫不含糊地认为中国最好的前景是进化的发展而不是革命的变革。他提到国民党时和对共产党一样，他之所以反对革命是因为革命虽然可以迅速而有效地达到其目标，但在其过程中，往往会盲目而非理性地背离原意；而进化(他有时称之为“自觉的进化”)虽属缓慢，有时甚至浪费时日，但是易于控制，不大会造成不必要的损失。他在

1929年的《我们走哪条道路》和1930年的《介绍我自己的思想》这些文章中说明了这种观点。

胡适对革命的憎恶和对社会持续性的关注是和梁启超等人在二十年代形成的新保守主义观点相同的。1922年5月，胡适和丁文江、蒋维乔等人创办了《努力周报》，在第二期上，发表了由胡适执笔的一篇宣言《我们的政治主张》，签名者有意见如此不同的知识分子梁漱溟、李大钊、蔡元培和胡适等十六人。这个文件的目的是要按照引起深入讨论的普遍性从而得到“有战斗性并有决定性的舆论”，以促成政治改革。但是，在许多重要方面，胡适和新保守主义者的意见是矛盾的。梁启超和张君勱、梁漱溟在一起宣称中国的传统价值观比西方的更合人性，并且更有利于人类的精神生活，强调直觉比西方的理性更为优越，他们以此来反对西方文明的唯物的法纪的观点，并籍此而向胡适的社会道德体系挑战。胡适为西方文明和科学辩护，他认为把“物质的”和“精神的”的发展过程判然划开是很荒谬的，他要求知识界同仁不要自欺欺人地认为中国在上占有唯我独尊的地位，而应该彻底“现代化”并且面对现实从世界历史的范围内衡量中国的成就，恰如其分地认识所处的地位。

对科学的社会准则在文明中的地位的讨论，以梁漱溟、张君勱、梁启超为一派，丁文江、胡适为另一派，在1923年中处于高潮。《努力周报》及其每月增刊《读书杂志》为西方文明和科学辩护，直到这两种刊物在10月反对曹锟贿选总统停刊。

胡适为1923年出版的论文集《科学与人生观》一书，写了一篇长序，他在其它一些所谓科学哲学论战中所写的文章，有1923年发表的《读梁漱溟先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1926年发表的《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1935年发表的《试评所谓“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

胡适与国民党的关系不太清楚。二十年代中，他和国民党的接触很少，有理由相信他对孙中山和他作为革命领袖的前途并无太高评价。北伐时期胡适不在国内。他在1927年5月回到上海时，蒋介石已牢牢控制了这座城市。此后几年中，他与徐志摩、梁实秋、罗隆基于1928年创办的以文学和文学评论为主的《新月》上，发表了几篇很有识见的政治评论。胡适对国民党的批评主要有两

点：关于国民在训政时期和宪政时期的地位，以及国民党对文化革新与改革的态度。他早期的政论文章中，胡适重视“健全政府机构”的重要性，及政府所负的教育重任。他抨击孙中山的“知难”学说，这种学说是国民党训政的基础。他谴责国民党由于狭隘的民族主义目的，对新文化运动的意义和成就持有“反动”的态度。国民政府对这些批评的答复是指责胡适的言论不负责任，并警告他要考虑把国民“引入歧途”的后果。

胡适毕生以“无党无派”的知识分子而自豪。1932—1937年他在北京办《独立评论》。他在这个刊物中继续反对中国文化本位主义，国民政府为了抵制共产主义思想而开展以旧传统为方向的新生活运动，使中国文化本位主义有所抬头。尽管如此，三十年代中发生的一些变化，使胡适在不少问题上和国民党的立场较为接近，他的不少老朋友都在国民党阵营中有了地位，和解就更为容易了。胡适是放弃与日本取得“妥协”这种想法的最后一批人，他认为战争将毁灭几十年来在政治改革和文化改革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他对这几年来学生参予政治的活动不表同情。

胡适1937年出国时，他最具影响的年月已成过去。他的余年都是在美国度过的，在国内只有六年，他与国内大事的接触减少，他作出重要评论的能力也缩小了。

1938年9月，他延长在美国的居留期，不久抵达法国，得知任命他为驻美大使。在日、美危机加深的当时，从各方面说，胡适是中国在美国的理想代表，一个既为美方所熟知尊重，而他本人又是喜爱并尊重美国生活方式的人。他在驻美大使任内，致力于向公众宣扬中国的事业，这是胡适最擅长的工作。1941年12月前，为取得美国对中国抗战具体援助的外交谈判的任务，大部分是由别人、主要是宋子文来担任。美国参战后，国民政府在华盛顿的目标有了根本的改变。1942年胡适解除驻美大使之职，由魏道明继任，去职原因并未详。胡适后来担任行政院特别顾问，但仍留在美国从事著述讲学工作。1943年，他为恒慕义所编的《清季名人传略》第一卷写了一篇赞扬的序言。恒慕义著作的第二卷中，载有胡适对《水经注》校勘的精心研究成果的详细说明。1945年4月到6月，他参加中国代表团出席旧金山召开的联合国制宪会议，又在朱家驊缺

席期间，任代理团长出席在伦敦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一届会议。

1945年6月，蒋梦麟辞去北京大学校长任行政院秘书长，胡适继他的老友任北京大学校长，但他并未立即回国任职，暂由傅斯年代理。1946年，胡适回国，担任北京大学校长之职两年半。1946年11月，他以无党派代表身份，去南京参加为起草宪法以结束一党专政的训政时期而召开的秩序混乱的国民大会制宪会议。第二年，选入第一届国民大会。胡适对国民政府给的支持以此为限，不再和该政府有密切的联系。1948年3月，蒋介石亲自邀他参加总统竞选，他拒绝了；几个月后，又邀他出任行政院长，他也拒绝了。据他说，一个学者连自己的书桌也整理不好，那是难以担当政府行政重任的。

1948年中，中国共产党包围了北平，他丢下了他个人的大批图书、文稿和信札飞往南京，又去上海，然后到了美国。他在美国，短期内任普林斯顿大学杰斯特东方图书馆馆长，大部时间住在纽约，处于半退休状态。他为《外交季刊》及其它杂志写的文章中，悲叹斯大林主义权势在中国的扩展。1954年，他在给司徒雷登《在华五十年》一书写的前言中，回顾了他对国务卿艾奇逊在《1944—1949年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的信件的反应，评论四十年代美国在国共冲突中所起的作用。胡适在艾奇逊信中所说的“在我国能力所及的合理范围之内，我们所做的以及可能做的事情，都无法改变这种结局”引用《马太福音27：24》加了一段旁注：圣经上说道：“彼拉多看见说也无济于事，反要生乱，就拿水在众人面前洗手，说：流这些人的血，罪不在我，你们承当吧”。

1956年由中央研究院主持，在台湾出版了《庆祝胡适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1958年秋，胡适在台湾就任中央研究院院长。胡适早年的工作仍然保持一定的影响，但他对中国青年知识分子的作用已不大了。他是支持《自由中国》半月刊的学术界前辈，这个刊物由雷震创办，雷震因颠覆之嫌被捕入狱后，该刊停版。该刊对国民政府的政策大事批评，发表了不少大胆的文章，批评政府和军队的无能和腐败。领导这个刊物的不少老知识人士常常提到杜威和罗素，使用他们在二十年代常用的术语，认为是西方科学启蒙的顶峰。但是近代西方著作中对杜威或罗素哲学的反应他们似乎毫无所知。

1962年2月24日，在南港中央研究院欢迎新院士的招待会上，胡适因心脏

病发作而死去。遗有1917年结婚的妻子江冬秀和两个儿子长子胡祖望，次子胡思杜。

此后，胡适被西方人士认为是名人，被中国共产党斥为“美国文化侵略”的代理人、“蒋政权的走狗”，被许多中国青年知识分子视为历史上的老古董。但是由于他早年的一些工作，他在近代中国文化史中的地位是确定的。夏志清、评论胡适是“文学革命之父”，因为他在二十年代提倡白话文，这对中国文学的方向和内容起了根本性变化。他在文化界的另一些重要贡献、是他的白话文学史，和用西方的哲学概念和方法来重新阐明古代中国的思想。

胡 蝶

胡蝶（1907——），女演员。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初国际知名的电影明星。1936年和潘友声结婚后离开了电影界，1958年潘死后，重返银幕。

胡蝶童年时的情况不详。她父亲原籍广东，青年时到北方在铁路上工作，后来去上海。他女儿在上海的一家小茶楼剧院里开始了舞台生活，她的美貌和演技受到物色电影演员的人的注意。她用胡蝶这个与蝴蝶同音的双关键词为名。1924年，她进中华电影公司训练班学习了九个月后，在友联影片公司的电影《秋扇怨》中首次演出，后来又在天一公司摄演了几部电影，如《夫妻之秘密》、《电影女明星》、《白蛇传》。这些影片都是1926年的出品。以后，胡蝶入1922年创办的“明星电影公司”，它在张石川的经营下，1928年取得了迅速发展，合并了其他五家公司。胡蝶是这家公司兴旺发达的一个重要因素。胡蝶在享有盛名时，每月收入五百元，当时，特别对妇女来说，是很了不起的工资。1931年该公司首次摄制有声电影，胡蝶在该公司主要编剧人洪深所编的《歌女红牡丹》中担任主角，该剧描写一名歌女的家庭不幸，1931年3月15日在上海沪光大戏院首次上映。该片与天一公司的《雨过天晴》都以最早的中国有声电影而著称。北方的一位评剧家对该片除技术上的缺点外，还对胡蝶的北京官话发音大加批评。当时，电影演员中北方人很少，不少电影公司聘请教师教她们北京官话，一段段对白要在摄制录音时反复排练。胡蝶的发音无例外的带有上海

方音,但她终于克服了困难,掌握了北方官话而在她的大部分电影中赢得好评。在此期间,她获得了“蝴蝶小姐”的英文艺名。

胡蝶为明星电影公司拍演了二十多部电影,以《姊妹花》中扮演的角色最为有名,以此获得了“中国电影皇后”的称号。它在上海连续上映了两个月之久,这是国产影片首次超过外国电影的放映纪录。《姊妹花》主要内容是揭露中国的家庭制度,虽然主题并不新颖,内容并无建设性。故事叙述了姊妹两人从幼分离,后又相见,彼此互不相识,一个成了有钱军阀的姨太太,一个成为他们的女仆。女仆偷窃她女主人的财富被投入监牢。胡蝶在这部影片中扮演贫富姊妹这两重角色。虽然这样的影片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一些左倾观点,但它们并不是描绘劳动的可贵,而是曲折的悲剧气氛掩盖了主题。

1935年2月,胡蝶作为驻苏大使颜惠庆率领的文化团的成员去苏联。梅兰芳和他的剧团也是其中的成员。这次出国访问,系由苏联对外文化协会主办。中国访问团由海路前去,以免经过日本已占领了的东北。胡蝶访问莫斯科恰好安排在国际影片会议在莫斯科召开,该团于3月12日到达。苏联外交委员会在政府大厦正式设宴后,胡蝶举行一次演奏会,用广东、上海、四川方言演唱中国民歌招待与会者。

1935年4月20,胡蝶、梅兰芳等一行到了华沙,以后又去德、法、意、英各国。胡蝶在伦敦参观了英国电影制片厂,参观了英国电影明星杰西·马修斯;索尼·黑尔等人拍片。回国后,1936年她与在上海自己开厂的商人潘友声结婚。该厂后来专门制造搪磁产品用“胡蝶”作为商标。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后,胡蝶和潘友声去香港,1942年日军进占香港时,梅兰芳也在香港。日方当局多次要求胡蝶为他们拍片,要求梅兰芳登台演出,他们都未接受。梅兰芳蓄起浓须,使他无法演出他所常扮的角色。1943年8月,胡蝶和潘友声乘帆船逃离香港到了重庆,他们在重庆一直到战争结束。这期间,胡蝶是在1944年秋摄演了一部影片《建国之路》。胡蝶在重庆曾为援助抗战举行一次歌唱义演。

战后,胡蝶和潘友声回上海,1948年又到香港。1958年,潘友声死后,一时传说,胡蝶与邵氏兄弟公司订合同摄演电影。影片名为《后门》,描写一对中年夫妇对一名养子的感情。该片以流居在香港的上海人士心中所生的怀乡之

情的孤岛为背景。1960年获得亚洲电影节最佳女演员奖。

胡蝶成为一个时代象征。通过电影这种新媒介，她面对着根深蒂固的反对妇女参加娱乐事业的偏见，而取得了社会地位和职业上的独立。她的成就标志出中国妇女解放的新阶段。即使她所拍演的大多数影片已为人们所遗忘，但她的成就却鼓舞了妇女从事艺术事业。胡蝶有儿子一人潘家模、女儿一人潘家莉，她在爱丁堡读书。

胡 宗 南

字：寿山

胡宗南（1895—1962.2.14），国民党军队的司令，以“西北王”闻名。抗日战争期间任第一军军长，第十七军团、第三十四集团军司令。1943年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他在台湾的国民党政府中任大陈岛游击司令、浙江省主席、澎湖列岛司令。

胡宗南籍贯浙江孝丰。他受了一些初步旧式教育后，1911年进湖州吴兴中学，毕业后在本地当小学教师。

1924年，胡宗南去南方进新成立的黄埔军校。该校校长蒋介石及其共事者，准备从二千名报考人中选拔324名编成一班，结果选了499名。胡宗南因身材瘦小，几乎落选，后经主任教官王柏龄力争才被录取，1924年10月30日毕业。他在1925年1月第一次东征陈炯明时任学生团的一名班长。以后，该团奉命到广州平定滇桂军队的叛变。胡宗南以其出色表现升为排长。10月第二次东征时，胡宗南作战英勇，引起蒋介石的注意而被提升为副营长。

1926年7月北伐开始，胡宗南任第一军第一师第二团团长。他的部队经湖南、江西、浙江于1927年春参加了攻占上海南京之役。同年底，胡宗南任第二十二师师长。1928年北伐部队整编，他任第一师第二旅旅长。

从1928年到1931年间，胡宗南多次为支持蒋介石的权力而作战。1928年春，他在击败桂军后率部进入汉口，5月又北上进击河南的冯玉祥军。1929年1月，又在郑州粉碎了唐生智的叛乱。1930年成功地参加反冯阎联盟之战，以后

任第一师师长。

1930年底到1932年中期，胡宗南率部在赣、皖、豫地区与共产党军队作战。1932年9月，因受卫立煌部队的威胁，张国焘、徐向前领导下的共产党军队撤离鄂、豫、皖边区，准备经陕西到川北。第一师由郑州调到甘肃天水阻截共产党军队，并保证地方军阀的效忠。

这是国民党在西北的唯一的一支军队，胡宗南处境相当困难，该部主要供应线和可靠的盟军均被切断。因此，他举办西北军官训练团用以扩大第一师，该师以国内的模范部队而闻名。胡宗南的部队纪律良好，与地方居民建立了良好关系。

1934年10月，江西共产党主力部队开始长征，突破国民党军队在湖南、贵州、云南、四川、西康的封锁向陕北进军。胡宗南奉命率师去四川西北不毛之地松潘、理番、茂县阻截共产党军的前进。1935年冬，共产党军在毛儿盖穿越草地绕过松潘、胡宗南率师赶到毛儿盖与共产党军作战，双方在激战中都遭受重大损失。共产党军终于穿过几乎不能通行的草地经甘肃而到了陕北。

1936年，胡宗南任第一军军长。6月，他的大部分军队调去征讨广东陈济棠的叛乱。11月，胡宗南北面的部队攻打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境的山城堡遭到惨败。战斗历时两天，胡宗南的第一军丧失了两个旅，第一师的损失尤为惨重，残余部队由于穿过内地追击共产党军而筋疲力竭。

在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及1937年7月中日战争爆发后，国共联合抗日，胡宗南部队调往上海增援该地中国军队。第一军虽遭重大伤亡，但成功地把日军的前进阻延了六周。

1938年，胡宗南任第十七军团军团长，回陕西改编军队，在西安近郊王曲设立中央军校分校，该校于3月29日开学，胡宗南任分校主任负责西北的军训，并主持战时政治干部训练团，西北青年劳动营，和一个对来自日占区青年进行教育指导的中心。他又主办了一所军官子弟小学和两所中学。胡宗南在这一地区握有极大权势，因此被称为“西北王”。

1939年，胡宗南任第三十四集团军总司令，负有在华北抗击日军和在陕北遏制共产党军的双重任务。国民党中不少高级官员把儿子送到胡宗南那里工

作。蒋介石的第二个儿子蒋纬国这期间就在胡宗南的部下。1943年，胡宗南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管辖地区包括甘肃、青海、宁夏、新疆、河南、河北以及苏、皖、晋的一部分。胡宗南的各训练组织以西安为中心在六个省份活动。受训的军政学员一度达三万多人。

1944年春，日军从河南南面和西面进攻，经一月苦战，胡宗南被逼撤退，但仍固守陕豫边境的潼关和西坪，使日军不能进入陕西。1945年战争结束后，他去郑州接受河南日军的投降。

战后国民党军队全面改编，胡宗南所属部队缩编百分之四十。他的一部分军队调往北平和石家庄，余下的部队分布在陕、甘、晋、豫各省。国共双方争夺大陆之战中止了国民党的复员计划。胡宗南的军队和共产党的军队冲突增剧。朱德、贺龙电胡宗南要求他将部队撤出陕西中部。1948年，共产党军李先念部突破了国民党的防线而向陕北进军。美国调处失败后，国民政府下令剿共，胡宗南部向陕北进军，1947年3月攻下延安。

但是，由于胡宗南部队进入到陕西共产党地区，他们日益被切断与友军的联系和供应。共产党军队化整为零，对胡宗南的各师一个一个地加以袭扰，胡宗南终于不得不撤出陕中。1949年共产党军队从山西调来重炮发动进攻，胡宗南部被打垮，由陕南溃退到四川。12月胡宗南的大部分部队被共产党军消灭，只带了少数随从逃到海南岛。他向蒋介石申请并得到批准飞往西昌，企图重集突围到川康边界的国民党部队。经过一个短期而拼死的抵抗后，他于1950年3月带了不到三万失去装备的部队逃到海南岛，后又去台湾。

1951年，胡宗南被任为大陈岛游击司令和浙江省主席。1954年撤出大陈，任澎湖列岛警备司令直至1959年底。1962年2月14日死在台湾。

胡宗南结婚两次。他的前妻和他母亲一家住在孝丰。抗日战争时，除他母亲外全家都在一次空袭中丧生。1947年，他和南京中央大学受过美国教育的社会学讲师叶霞娣结婚，他们生有两个儿子和两个女儿。

胡文虎

胡文虎（1893.1.16——1954.9），海外华侨实业家、报纸发行人和慈善家，制药致富。

胡文虎原籍闽西客家地区的永定县，他出生在仰光。他父亲胡子钦于1862年移居缅甸，在那里行医并开了一家备有中草药及其它药品名为“永安堂”的药店。胡子钦在缅甸与一名华侨妇女李氏结婚。他们有三个儿子，胡文虎为次子，在十岁时送回福建受传统中国教育。他弟弟胡文豹，后来担任胡文虎的助手，曾在缅甸受过英国式教育。

胡文虎在本乡读了四年书，又被唤回去仰光。他马上开始学习他父亲的行业，并经营他父亲的中药店。1908年，他父亲死去，中药店由他接管。在他弟弟的协助下，家道大为兴隆。他遍游中国、日本、暹罗各地，考察药业市场并发展贸易联系。

胡文虎与民国前的很多积极慷慨支持反满革命的海外华侨不一样，当时他的年龄和环境都不容许他在这个运动中起重要作用。据记载，他第一次对孙中山的重要支持是在1924年大宗捐款用以对陈炯明的最后一次东征，陈在1922年从事反孙。这一支持之所以值得称道是因为陈炯明也是客家族，在东南亚颇有声望。

1927年，胡文虎又给北伐以大量捐款，并救济广东省受灾的难民。那时，他已是新加坡的华侨“百万富翁俱乐部”中的一员了，他成为国内教育机关派往东南亚无数募捐团的对象之一。1929年，他给上海大夏大学捐款新加坡币一万元，广州国立中山大学五万元。1932年，他访问香港、广州，又给广州岭南大学一笔捐款。

胡文虎的药品业务日益兴旺，虎标万金油及其它药品在东南亚已声誉卓著，他在国内推销药品也取得卓越成绩。他计划进一步扩大业务，决定把总行迁到香港。他逐渐进行迁移，并由于新加坡作为集散中心的重要性，仍与那里的关系户保持联系。

胡文虎率领马来亚华侨体育队参加1935年在上海举行的中国全国运动会。他回到他本省，给福州的福建学院和厦门大学各捐款新加坡币一万元。除了这些为数可观的捐款外，他还给中国其它城市和新加坡，马来亚，荷属东印度等地的学校捐款。当时，他有一个宏大并广事宣传的计划要消灭中国的文盲，准备在全国各地办一千所小学校。只要各省当局同意他的计划，即可得到他个人的捐助。他因此出了名，但他的建议并未实现。

早在1928年，当胡文虎在新加坡创办《星洲日报》时，他在他的事业中又开始了第二项重要的商业投机。这家报纸是他以后要办的许多报纸中的第一份。第二份是在汕头1931年创办的《星华日报》，第三份是1935年在厦门创办的《星光日报》，该年后期又出版了一份新加坡的午报《星中日报》。胡文虎还计划在广州出版一份大型的现代化的日报，定名为《星粤日报》。他已觅妥社址并开始安装印刷机器，但此项规划因华南局势恶化而延搁。1938年，该报尚未发刊，广州为日军占领。但是就在这一年，他在香港出版了一份在他的报业中可能是最为重要，肯定是最为成功的《星岛日报》。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他在他的东南亚各报中又增加了一份槟榔屿的《星槟日报》。

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迁往重庆。胡文虎被委任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1941年底，他从新加坡取道缅甸到重庆出席参政会的一次会议，他在战时首都受到蒋介石的接见。然后从重庆回香港，他在那里建造的一所大厦刚刚落成，他恰好在太平洋战争爆发的时候抵达香港。当日军在1941年12月末占领香港时，胡文虎被拘留在告罗士打酒店三日。获释后，他仍留在香港。

1943年，胡文虎曾几次由香港到上海，会见日本扶持的南京政府的头目汪精卫。他至少到过东京一次，会见了日本首相东条，据说是有关日本占领军的所作所为而为香港商界说项。1944年，胡文虎被选为“香港华人协会”主席。有人说他曾声言作为一个亚洲人，他愿为日本“大东亚共荣圈”的计划而竭尽全力。1940年——1945年，任新加坡宗亲（译音）协会理事，这是一个海外华侨各主要中心有其分会的一个客家组织。胡文虎在该会的新加坡及香港分会中都很活跃。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胡文虎恢复了他的商业活动。1946年他到新加

坡主持恢复他在该地及东南亚各地的事业。当时，他还计划从马来亚的华侨名流中筹集资金兴办大型企业以促进福建省的经济开发，但这一计划迄未实现。

胡文虎很快将他的注意力放在进一步扩展他正在建立中的新闻企业上。他在战前出版的大部分报纸都已复刊。1946年他创办了一份英文《香港虎报》，直接与该殖民地的英国报纸竞争。他还声称要在福州和上海办《星闽日报》和《星沪日报》（计划始终未实现）。他还设想在北平、汉口、沈阳、台湾创办报纸。他原想恢复在广州的印刷工厂而未能成功。那里原有的设备，已在战争时期被日本人搬到台湾。但他在东南亚却干的比较成功，不久在曼谷创办了《星暹日报》。1950年胡文虎又创办了第二份英文日报《星州虎报》，该报于1959年停刊。

1949年，胡文虎在2月16日的《新侨日报》上发表文章，批评新加坡政府对待华人的政策。那一年他去新加坡时，在机场上被扣留，因有令禁止他入境，经交保获释。马来亚联邦也执行同样的禁令。

中国共产党1949年占广州后，胡文虎在广州的大部分资财被没收并责令缴付大笔欠税。胡文虎向广州中国共产党行政首长叶剑英写了一封私函，要求发还资财，他的信未予置理。胡文虎所经营的报纸，尤其是香港的《星岛日报》在共产党全国掌权初期，他对新政权采取一种容忍的态度，但自从他在广州的财产被没收后，他的报纸就变得强烈反共。1953年，胡文虎访问台湾明确了他对国民党的支持。

战后的年代里，胡文虎在香港又搞了一些新的慈善事业活动，他给医院、孤儿院、养老院捐款，还给一个英国志愿组织圣约翰救护队大量捐款。几年来，每逢胡文虎的生日，常以食物包和现金赠送贫苦老人。1954年，他离香港去美国波士顿医院动手术，在返回途中，因心脏病于1954年9月5日死在檀香山。

胡文虎是最先利用西方广告术于东方贸易的商界人物，他对报纸促进商业力量的敏锐眼光可以从他创办一系列报纸加以说明。他的财富日增，他的慈善事业亦随之而扩大，因此有“中国的洛克菲勒”之称。他在新加坡和香港都拥有大批地产，那里的精致花园极为吸引游人。

胡文虎有四个妻子。第一位夫人郑民（译音）是1917年娶于仰光，后住在

新加坡。他的第二位夫人陈金枝（译音）在香港起重要作用。胡文虎有两个女儿。长女胡仙，西名萨利，经营胡文虎在香港的报业。次女胡星（译音），在美国读书。胡文虎有五个儿子。长子胡考（译音）在马来亚经营家业，次子胡生（译音）自1944年胡文虎的兄弟胡文豹死后经管在仰光的产业，三子胡好是一个运动员花花公子，1951年在马来亚飞机失事丧命，四子胡逸虎（译音）在美国读书，五子胡思虎（译音）胡文虎死时尚年幼。

胡 也 频

原名：胡崇轩

笔名：也频

频

沈默

何一平

红笑

胡也频（1907.7—1931.2.7.），作家，丁玲的伴侣。他成为一名热心的共产党员和左翼文联的骨干。当他被国民党逮捕并处决后，被称为左翼文联五烈士之一。

胡也频出生于福州。其父是一个京剧班子的班主，这个剧班是他的祖父所创办的。胡有四弟一妹。他在四岁时上私塾，但四年后因其父的剧团垮掉而辍学。两年后，其父租下了一个戏园约其它剧班演出，家计有所好转。于是他入教会办的崇德小学读书。他在学校里参加过演说比赛和演剧活动。由于他那个笃信佛教的母亲反对他参加学校的基督教宗教活动，他在崇德小学只上了一年。他后来又上私塾，念了三年古书。

1918年他家的经济情况再度窘迫，胡被迫辍学。他十四岁时在一家首饰店学徒。1920年他离家去上海，以胡崇轩之名入浦东中学。约一年后，经一位在海军部工作的亲戚介绍，他入官费的大沽口海军学校学机械工程。不久胡又因无钱而不得不退学。他去了北京，在那里干过各种各样的工作，并用很多时间

旁听青年知识分子对文学的讨论。这些讨论导致他开始阅读小说和诗，他不久就决心要当一名作家。

1924年胡也频和两个友人创办了《京报》的文学副刊，名为《民众文艺周刊》，于12月发刊。在此项工作中，他和鲁迅及沈从文发生了密切关系，沈是这个副刊的经常投稿人。虽然这个副刊在1925年5月即已停刊，但它使胡有机会用胡崇轩之名发表了十五篇短篇小说和散文。

1925年春，胡也频与丁玲相识。不久，两人就在北京西山的一所村舍里过着隐居的生活。他写诗，并以“也频”和“频”的笔名经常向《晨报》的文学副刊投稿。他的作品也曾在《现代评论》、《小说月报》和《东方杂志》上出现。1926年他写的诗编成一集出版，名为《愿望》。不过，他的作品只有少数得到发表，他曾努力想办一个新杂志而未能成功。据丁玲说，他“得了忧郁和虚无主义的病。那时他所写的诗都充满了这种伤感的情调。”

当丁玲的作品开始出名时，胡也频的意气更加消沉了。他们去了上海，经沈从文的介绍，胡担任了《中央日报》的文学副刊编辑。此副刊于1928年6月19日发刊，10月31日停刊。沈从文、丁玲和胡也频创办了《红黑月刊》和《人间月刊》，均于1929年1月20日发刊。这些事业不久均以破产而告终：《人间月刊》在4月出最后一期，《红黑月刊》在8月出最后一期。

在此时期，胡也频对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和政治理论发生了兴趣。他的激进思想首次反映在一篇他在1929年5月写出的关于阶级斗争的小说《到莫斯科去》中。小说的故事是一个女共产党员的情人被她的政府官员丈夫杀害，以女主人公到莫斯科去开始她的新生活为结局。1930年初，胡也频写了《光明在我们的前面》，为了说明1925年“五卅”运动给与“为艺术而艺术”的作家，无政府主义者和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的影响。这篇小说的一部分刊登于1930年5月份的《日出》第一期，结果这个刊物被罚款并勒令停刊。

随着胡也频越来越无所顾忌地表明他的政治信念，他的作品也越来越小。由于需要钱，他在1930年春接受了济南省立高中的教职。他深受学生的欢迎。他讲授无产阶级（普罗）文学，并成立一个文艺俱乐部，很快就有四百多名学生参加了这个团体，连该校的校长和训育主任也参加了。5月9日，在

日本提出二十一条的国耻纪念会上学生非常激动，几乎发生骚乱。胡也频不知如何去领导群众举行示威。他试图找济南的共产党组织让一名党员来将这一骚动引导为群众运动，但未能找到。该校校长通知他政府当局对学校的骚动感到不安，他应该离开济南，他那时正在要和上海的共产党人取得联系。胡去了青岛，然后又去上海，在那里致力于政治活动。

胡也频参加了新成立的左翼文联，不久成为该组织的执行委员会的一名委员和工农兵通信委员会主席。他还在冯雪峰及其他共产党人所办的暑期学校中兼课。1930年11月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1年1月31日在全国苏维埃大会的一次筹备会议开会时，他和其他与会者为国民党当局所逮捕。丁玲和沈从文曾努力营救，但他和其他二十三人于1931年2月7日被处决。胡也频、柔石、冯铿、殷夫和李伟森被称为左翼文联五烈士。这一次大规模处决被尼姆·韦尔斯（当时是斯诺夫人）、史沫特莱和斯诺报道出去，成为一件丑闻。

1951年，共产党的新文学选集编辑委员会出版了《胡也频选集》，其中选有两部长篇小说和几篇短篇小说及散文。该委员会特别介绍这两部长篇小说，认为在内容、思想和技巧上是无产阶级文学中的最好典范。

胡元俊

字：子靖

号：耐庵

胡元俊（1872—1940.11）教育家。他在长沙创办了明德学堂，毕生致力于该校的发展。

胡元俊，湖南湘潭人，出生在士绅家庭。他的祖父胡湘曾任广东南海知县。他父亲胡同寿和伯父胡锡燕曾随往南海，就学于广东名学者陈泮门下。他们专攻《诗经》和《资治通鉴》，两兄弟都在这方面有著述。胡元俊的长兄胡元仪，研读《诗经》和《荀子》，其有关这方面的文章，已由王先谦编录于《皇清经解续编》中。胡元俊的另一位兄长胡元玉也是知名学者。胡元俊在弟兄中行九。与其他家世相同的人一样，他早年受的完全是古籍教育。胡元俊以勤奋好学闻

名，当近代西方思想传到湖南省的学生和学者时，他对知识的新天地发生了浓厚兴趣。他被举优贡。1903年胡元俊获得官费去日本留学，进入弘文学院速成师范科。他在日本受学时间虽短，但给这青年学者开拓了新的视野。

当时在日本最有名的教育家之一是庆应大学的创办人福泽谕吉。他的教育方针着重在道德和启发，以此锻炼性格的力量。深受儒家思想和伦理熏陶的胡元俊，很快就对这种重要的教育方法发生兴趣。1903年底，胡元俊回到长沙后，得到湖南名流龙湛霖和谭延闿的积极支持，马上着手建立明德学堂。该校设有培养师资的师范部和一所中学，以后又扩展成立一个特别师范班和预科。附属于明德学堂的还有一所经正学堂和设在南京的高级商业学堂。明德各校，当时与严修、张伯苓在天津创办的南开学校齐名。

胡元俊本人并非革命党人，但明德学堂早期的历史却与辛亥革命时的一些领袖有密切关系。主要人物有黄兴和张继。黄兴由胡元俊聘为明德学堂师范部主任，张继被聘去教历史课。其它教员，还有如诗人作家后来出家为僧的苏曼殊，和后来的外交家、国民党政界人物王正廷等人。这些才学之士出现在一所中学里，给湖南和邻省人士以很深印象。

自从黄兴来明德学堂工作之后，显然他的真正目的是为了从事秘密的革命活动。黄兴计划在慈禧七十大寿祝寿时，密谋刺杀湖南省满汉大员。密谋泄露，省当局遍索黄兴。当此紧急期间，黄兴设法逃脱在龙湛霖家避难，这可能是出于胡元俊的安排。胡元俊又试图劝说当时湖南提学使张鹤龄对此案策划者予以宽纵。胡元俊这样做是冒着自己生命危险的。主要通过他的求情，对罪犯的搜捕放松了。黄兴、张继因此得以逃脱，先到汉口，然后去了日本。此后多年，胡元俊的英勇行为，提高了明德学堂作为湖南革命传统发源地的声望。

胡元俊一直谋求扩大明德学堂增设大学部。1912年民国成立后，在北京设立了明德大学。这一扩大需要增加经费，胡元俊为此到北京、天津、上海、南京甚至北到奉天，吉林等地募款。国内捐款仍不敷用，他又去东南亚。那里有很多华侨巨商。但是，捐款从来抵不上支出，1915年明德大学停办。中断多年，1919年大学部又在汉口恢复。七年后又停办。明德大学以商科为重点。学校当局曾与一些商业银行订有协定，雇用明德毕业学生。对此事业的最重要的合作

者是天津和汉口的大陆银行。

黄兴和谭延闿是始终不渝支持明德的人物。他们也是胡元俊最亲密的共事者和良师益友。胡元俊一度在上海募捐无成而灰心丧气，曾给谭延闿写信说他还不如自杀以表示对明德的忠诚。谭延闿劝他立刻回长沙，并承允明德的经费由他个人负责。这位湖南政界人士曾劝胡元俊说：“死不难，不死难。”

1925年后，胡元俊集中精力办明德中学，他聘用从前在明德大学中的教授来增强中学的师资，因此明德中学较长沙的其它学校有更为完备的课程。据左舜生说：“私立学校在湖南教育方式和风气中起关键影响，培养了比官办学校更多人才。在列强侵略之下，湖南省不受政府支持而首创学校。胡元俊可以称得上这一业绩中的代表人物。”

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后，胡元俊随国民政府到汉口又到重庆。1938年，由于他献身教育的声誉，被邀参加国民参议会。他应邀后住在战时首都的近郊直至1940年11月24日年六十九岁去世。

胡元俊经常出入于高官巨富之门，与他的学生同事辈亲密相处，平易近人。他穿着俭朴，喜欢一些小享受：一杯茶，一部电影，一曲旧剧。他善于摄身之道，每当出访友辈，就有随从仆人为他携带一件丝棉袄，一觉寒冷，立即加衣。这算是他唯一的奢举了。他对自己的学生感到非常得意，尤其是对那些有所建树的毕业学生，其中有陈果夫，黄少谷，任弼时等人。

胡元俊是一名优秀的书法家和旧体诗人。他收在《耐庵言志》中的大部分诗篇，是有关他对教育事业的雄心壮志和艰苦奋斗。

胡 筠

字：笔江

胡筠（1881—1938.8.24），银行家，1915—1920年任交通银行总经理，以后创办并主持了中南银行。三十年代中，国民政府集中管理并控制中国的银行业务，胡筠任交通银行董事长。

胡筠出生在江苏镇江，幼年多病，八岁时犹未上学。1892年，他家中为他

延师教读以应科举考试。1896年，他弃此仕进之途到本地一家钱庄当学徒。他在银号中逐渐承担重要事务，又很快掌握了旧式银行系统中的奥妙窍门。

1908年，当他二十七岁时，任公益银号襄理，就此学得了西方的银行经营方法，两年后，他以有才干的银行家的声名获得交通银行总稽核一职，1911年升为总行襄理，1915任该行经理。

1916年袁世凯死后，华北政局动荡，银行业风险日大。因此，胡筠于1920年辞去交通银行的职务到了上海。当时，在爪哇经营蔗糖业致富、并在厦门拥有很多公用企业的黄奕柱邀他在北京、上海创办新式银行。胡筠应邀，和黄一起去北京与内阁总理段祺瑞商谈。段祺瑞批准了中南银行的成立，北京政府破格授该行以发行纸币之权。胡、黄回上海设立总行，于1920年7月开业。

中南银行立即获得成功，并帮助国内银行界树立了高效率和完善的新标准。据法律规定，银行发行纸币应有相应数额的储备，而事实上，有时发行纸币并无足够的储备，因此纸币的价值和公众信用下降。但是胡筠对中南银行的纸币发行严格按法律办事，该行不久就在北京、天津、无锡设立分行。他们发行的纸币均印有各行的地址，使用者很放心，知道可以在任何一家分行兑换现银。

二十年代初期，中国银行界极少经营外汇业务。在胡筠的指导下，中南银行开始与欧、美、东南亚有汇款业务。

不久胡筠和周作民及其它银行家仿效美国的联邦储备制度建立了储备制度。纸币应有百分之六十的现金和百分之四十的公债及可转让证券作储备。1923年，中南银行、金城银行、大陆银行、盐业银行将财力合在一起成立四行联合准备库和四行储蓄会。联合准备库发行纸币并负责维持所需的储备，四行储蓄会鼓励储蓄，成为极获利的业务。通过此储蓄会，各行大量投资于上海地产业和国内外证券。上述四行，合称为北四行。

1932年，胡筠转而注意到振兴奄奄一息的丝业和桐油业。由于他的努力，在他的家乡镇江设立了两所备有实验设置的学校。一所蚕丝学校采用育种、缫丝、种桑的新技术，推广到全国。另一所学校发展桐油生产。

1934年，中南银行在香港、广州新设支行。对菲律宾、新加坡、马来亚、

荷属东印度等处的国外汇款业务大为增加。该行为华侨顾客进行常规服务外，还提供市场及商品情报。南京支行创办公务人员自建住宅的分期付款办法，国内业务也扩大了。这一个办法，使南京地区的地产业大为兴旺。

在此同时，国民政府采取加强金融机构和改革币制的措施。其中一项办法是取消非政府银行的纸币发行权。中央银行将成为新采用的法币的唯一发行银行。对过去所发行的纸币进行最后查核时，发现中南银行完全遵照政府储备规章办事。

也正是1934年，中南银行在胡筠领导之下进入棉纺业，与日本的利益进行直接竞争。日本实业家很早就上海、天津、青岛开办棉纺厂。1929年及1930年，这些工厂的业务经营扩大并现代化了。到1931年，大多数中国棉纺厂为陈旧的机器和训练不足的人工所累，已濒于破产的边缘。上海、无锡、南京各银行大笔无抵押品的贷款似无收回之望。中南银行实际上在支持着上海的溥益和民生两大纱厂。到1934年胡筠认识到不能再予坐视了。他联合其它各银行接管这些受难深重的纱厂。然后，他对日商纱厂进行细致调查找出它们在竞争上有利的因素。不久他便发现，由于技术上和经营上落后，华商纱厂产品的单位成本要高得多。胡筠聘用训练有素的纺织专家来解决技术上的问题，并对纱厂的财务管理重加整理。到1935年，华商纱厂多年来第一次开始有赢利；到1938年，靠着战争生产的需求，各厂偿清了银行贷款。

同时，国民政府为了准备对日作战，继续集中对银行的管理和控制。私人银行纳入集中管理体制。胡筠任新集中化了的交通银行董事长，成了掌握国防财政和战时经济的主要人物。他在其它城市设立了交通银行分行，使流动资产不致集中于上海一地。1937年日军入侵上海，他负责将交通银行及其它银行的资金和业务转移到香港，然后又转到重庆和昆明。

1938年夏，胡筠在香港，国民政府召他到重庆参加一次紧急财政会议。8月24日晨，他乘中国航空公司“桂林”号飞机去重庆。该机受到截击，在唐家湾附近被迫坠海。胡筠和二十一名乘客中的十八人全部丧命，其中包括银行家徐新六。国民政府为他开追悼会，通令表彰，授以文职的最高荣誉。

华 罗 庚

华罗庚(1909.10.11—), 数学家。他的有关数论和矩阵几何的论文, 获得了国际公认。他作为西南联合大学数学教授, 去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和伊利诺斯大学高等研究所工作。1950年继续从事教学, 并任北京科学院数学研究所所长。

华罗庚出生在江苏金坛。上学时期在课余帮他父亲经营一家小商店。1923年他在金坛县立中学初中毕业后到上海进中华职业学校准备以后经商。正在毕业前几个月, 他因经济困难退学。他回家后, 在他父亲的店铺干活, 并学习数学。二十岁时他因风湿病成为跛脚。他的身体上的残疾使他不能从事许多活动, 他的全部精力就放在数学上。

1929年, 华罗庚给上海的数学杂志投了一些有独特见解的稿件, 引起当时清华大学教授数学系主任熊庆来的重视。1931年, 他去看望华罗庚并劝他到清华数学系当助理。他在系里管理资料并给熊庆来当研究助手。他利用这机会在清华听课并开始学习外语。作为熊庆来的得意弟子, 他得以参加数学系的各项活动。五年后, 他升任数学系助教。1934年他在数学杂志如《中国科学社学报》、日本《东北数学杂志》、《加尔各答数学学会公报》、德国《数学杂志》、《伦敦数学学会杂志》、苏联《科学院学报》发表了有关代数、数论、复合变数的论文。

1936年他获得中华文化教育基金会研究员奖金去英国在剑桥随从 G. H. 哈代学习, 1938年回国, 任昆明西南联合大学数学系教授。在战争年代中, 华罗庚致力研究数论。1941年写了一篇有关素数之和的重要论文稿, 由于战争关系, 当时未能发表。

1945年, 他应邀去苏联访问两个月, 在此期间他进行讲学并与苏联的著名数学家科学家进行了讨论。1946年春, 美国国务院邀请他去美国访问, 他接受普林斯顿大学的聘请担任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他又去厄巴纳, 1948年任伊利诺斯大学数学客座研究教授。

共产党在中国大陆取得军事胜利后不久, 华罗庚回北京, 任清华大学数学系教授。1950年任科学院数学研究所所长, 中国数学学会主席。一年后, 又任

北京大学数学系教授。1953年他作为中国科学院代表团成员访问苏联。在五十年代中，他曾访问过斯德哥尔摩，东柏林、新德里等城市。1956年他的专题论文《多复变函数论典型域上的调和分析》获得科学院奖金。这一重要著作于1959年译成俄文，1963年译成英文。1957年华罗庚在《光明日报》上发表的《中国的科学体制问题》一文，受到批判，据说其中有反社会主义的观点。不久他就恢复了名誉，任第一、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1960年，华罗庚任北京中国科技大学应用数学系主任，一年后，任该校副校长。1964年任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华罗庚的论文获得国际上的承认。1934年—1944年间，他几乎是完全研究数论。他在这方面的论文于1941年完成，但一直到1947年才译成俄文在列宁格勒发表。1965年又从俄文译成英文，由美国数学学会出版，题名为《堆垒素数论》。这是用多个素数的 K 次幂之和表示整数的韦林—哥德巴赫问题的详细描述。他改进了维塔格拉多夫的中值定理，并把韦林问题推广到用整系数多项式和来表示整数。1944年后，华罗庚又对让·狄奥多纳的《关于经典群的自同构》作了补充，由美国数学学会发表于1951年。

1960年以后，华罗庚的许多著作将数学理论与中国生产的实际问题相联系。他的《关于总体计划的实验工作的注记》即是一例，这是一篇将抽象概念应用于工业计划和工程的分析性文章。另一个有兴趣的例子是华罗庚后来的作品《孙子的神机妙算》一本小册子，这篇论文体现了华罗庚成功地解决了中国现存最古的数学著作《孙子算经》所提出的一个数论的问题。华罗庚在1964年一本小册子的问世反映出共产党当局强调对在中国青年中推广数学推理方法的重要性，和《算经》一书作为中国人在数学史上的最早贡献的重大意义。孙子定理，又称为中国余数定理，在数学史上长期占有重要地位。它对电子计算机的发展也有影响。

黄 节

原名：黄佩文

字：晦闻

黄节(1874—1935.1)诗人，以研究六朝诗闻名的学者，教师。“南社”创始人之一。

黄节，广东顺德人。幼年时就学于广东名学者朱子奇的门人简朝亮，是广州广雅书院一名优等生。义和团运动之后，中国有被瓜分的危险，黄节离广州去上海，1905年和邓实、刘师培等人组织了一个“国学保存会”，黄节对该会捐款并赠书四千册，并为该会搜寻清廷禁书做出特别努力。他在《国粹学报》上写了不少文章。此外，他又是1908年在苏州成立的“南社”的创始人之一，该社得到一些具有强烈民族主义思想的著名诗人的支持。

民国初年，黄节回广东任省立高等师范监督，但不久即到北方在北京大学教书。袁世凯准备称帝的时候，他离北京回广东，在南方暂任教育厅长。他提倡男女同校制度，但这一改革在当时尚不能为人接受。他辞职后又回北京教书，1920年2月，出于巧合，北京大学招收了两名女学生。这一革新在1921年就在广东各校推行开了。

黄节是作为一名诗人而被人怀念。他喜爱宋诗胜于唐诗。他对陈师道(1053—1101)的优美风格和顾炎武的作品很赞赏。在这方面，他与“南社”的其它创始人有所不同，他们大多是龚自珍的忠实追随者。黄节的诗已编成《兼葭楼诗》。他的诗大多按时间先后在《学衡》上发表。黄节对六朝诗的研究很闻名，他编注了曹植、曹丕、曹叅的诗集《魏文、武、明帝诗注》，他又致力于阮籍、谢灵运的著作，编有《阮步兵咏怀诗注》和《谢康乐诗注》，此外又编了汉魏民歌《汉魏乐府风笺》。

黄节于1935年1月死在北京。

黄 鄂

原名：黄绍麟

字：膺白

号：昭甫

黄鄂(1880.3.8—1936.12.3)政府官员。蒋介石、冯玉祥的朋友和顾问。

二十年代初期，在北京曾任代理外交总长和教育总长。1924年11月3日到24日摄行内阁总理、总统和内务总长职务。1928年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1933—1935年任行政院驻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

黄郛出生在浙江绍兴百官镇。他父亲黄文治本为浙江嘉兴的一家富户，太平天国时迁离嘉兴到百官镇与叔父住在一起。黄文治学有所成授候补州县，1886年死在杭县，寡妻陆氏带了四个孩子（黄郛是继子，当时年仅七岁）到杭州，送黄郛到本地的正蒙义塾受旧式教育。1896年黄郛十七岁时，应府试补杭县学生。

1898年百日维新后，黄郛读到梁启超的《尚武论》，印象极深，他准备从军。1903年，当他在安吉县学堂教国文及数学课程时，考进了新成立的浙江武备学堂。他对自己的才能殊少信心，改名为黄郛。结果他名列第一，1904年被派到杭州学习。此后，他就用黄郛这个名字了。

1905年黄郛由浙江省派往日本深造。他进了振武学校（陆军预备学校），又加入了同盟会。他热心革命事业，组织丈夫团，先后有二十五名留日军校学生参加，其中有李烈钧、阎锡山，张群等人。黄郛在东京期间，与蒋介石等人办了一份期刊《武学杂志》。黄郛用明耻、哭遼等笔名在中日文刊物上发表文章。

1908年，黄郛从振武学校毕业后，进了东京（日本参谋部所设）陆军测量部地形科肄业，1910年黄郛以优异成绩毕业回国，在北京军諮府测量部当测绘员，同时把日文的有关旅顺战役的一本著作译成中文，书名《肉弹》。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时，黄郛参加了山海关的军事演习，负责招待外宾。北京政府派他以“军事观察员”身份去上海。他不久辞去该职，投向陈其美。陈其美任上海都督，黄郛任参谋长。他编组了第二师（后改编为第二十三师），任师长。该师于12月参加了革命军攻占南京之役，团长中有黄郛在东京时的朋友蒋介石。黄、陈、蒋结拜为兄弟。

1912年1月，南京临时政府成立，黄郛任北伐军兵站总监。2月，黄郛调回为新任都督程德全的参谋长，他的第一件任务是编遣北伐军。

1912年底，黄郛被派出国考察军事，他和张群准备到日本与陈其美会合一起

去欧洲。3月中旬，陈其美改变主意，他在3月20日宋教仁被袁世凯的特工人员刺杀时已与黄郛取得联系，于是他们放弃了欧洲之行。孙中山从日本回上海，他和陈其美、黄兴联合反袁。尽管黄兴因袁世凯兵力很强，主张推迟，所谓的二次革命在5月份发动起来了。陈其美军攻打上海兵工厂失败，8月中旬，被迫撤出吴淞炮台。袁世凯下令逮捕黄兴及其它革命党人，8日黄郛逃到日本。陈其美也到了那里与他会合。

陈其美和黄郛对斗争策略方针出现了分歧。陈其美在1914年1月间提出在满洲进行革命活动的建议，黄极力和他争论，认为这样做除了消耗有限的力量之外，别无其它好处。陈其美对他的劝告并未重视，黄郛把他的意见写成书信交给他这位老同事之后，乘船到新加坡去了，此去有三月之久与陈其美不通消息。6月，孙中山在日本计划组织中国革命党以加强其地位，陈其美任总务部长。孙中山要求党员宣誓向他效忠而造成的分裂，黄郛即其中一人，他与孙中山脱离关系，以后未再联合。

1914年黄郛用以太的笔名在8月9日到12日的新加坡《国民日报》上发表文章，分析欧洲的战争，预见德奥必败并认为中国应利用这个机会收复青岛。11月日本派兵去占领山东的德国租借地。1915年春，黄郛经日本去美国，居住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奥克兰市。他访问了西海岸的各大城市，参加了国民党美洲总支部的会议。

自从西南的反袁运动开始，黄郛于1915年12月乘日本货轮到香港。他应革命党人之邀，于1916年1月到上海，协助计划浙江的军事，任该省军事委员。黄郛的努力获得成功，4月中旬，浙江省宣布独立。袁世凯死后，黄郛作为浙江军政府代表去北京。

1917年8月14日，由段祺瑞控制的北京政府正式宣布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黄郛再次认为中国必须趁此机会收复青岛，催请外交总长汪大燮采取相应步骤。汪大燮拒而未加采用，认为国家尚未统一，不应采取此种行动，此后，黄郛寓居天津，忙于研究和著述。他在天津，认识了张耀曾、徐世昌等重要的政界人物。他和张耀曾一起，组成了一个“全国和平联合会”把和平运动推广到上海，以挫败段祺瑞武力统一中国的计划。1918年、1919年，他发表了两篇重要文章，

《欧战之教训与中国之将来》及《战后之世界》。

1919年，黄郛在天津作了九次讲演，编印出版为《欧战后之新世界》。1918—1922年徐世昌任总统时，任黄郛为总统府参事，委托黄为他写一本书，徐还任命他为中国经济调查局局长。《欧战后之中国》一书出版于1920年，直到黄死后人们方知此书是他所写。

1921年，黄郛以半官方身份派去美国、欧洲考察经济，当年夏初到达美国，正筹备召开华盛顿会议，黄郛和袁同礼在9月初上海的新闻报上发表《华盛顿会议发起之内容及将来之趋势》一文。北京当局即派他为已在华盛顿的中国代表团顾问。11月华盛顿会议开幕，黄郛以徐世昌的个人代表身份出席会议。2月7日，黄郛辞去代表团职务，不久去欧洲。他在伦敦略作停留，即去法、比、荷、捷、意、匈、瑞士、德等国游历，收集制图材料并考察军事。1922年秋他回到天津。

1922年9月，黄郛经总统黎元洪特派筹办财政会议事宜，11月任全国财政会议高级专员。12月，他的朋友张绍曾组阁，两月后，黄郛代理外交总长。北京政府驻国外使馆因长期欠薪，提出总辞职，黄郛亦于1923年3月22日请辞。当看到他无改变此决心之意时，十日后辞职被批准。他后来同意任外交委员会委员。

1922年到1924年间，他在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讲授军事制度、世界政治地理、世界政治等课程，他显示了才气纵横而又学识渊博的演说才能。1923年9月任教育总长。1924年1月，内阁总辞职，他也离职，9月颜惠庆组阁，他又出任原职。

黄郛和冯玉祥关系密切，他给冯玉祥驻在北京附近的司令部的军官讲课。1924年10月，冯玉祥从廊坊秘密派人到北京与黄郛联系。10月18日，黄郛给冯玉祥信说：“这是救国的关键时刻。”10月21日，黄郛去高丽营会见冯玉祥，冯和孙岳乃倒戈反吴佩孚和曹錕，10月23日进占北京，于是黄郛回到北京。他是颜惠庆内阁中唯一参加冯玉祥兵变合作的阁员。月底，颜惠庆内阁辞职，黄郛代理内阁总理。当曹錕被监禁，并于11月3日辞职时，黄郛宣称在过渡时期代行总统职务，同时又兼任内务总长。冯玉祥把溥仪赶出宫外，取消了他的岁

费，黄郛在1912年拟定的优惠条例上增加了单方面的“修改”，使这一行动合法化。1924年11月中旬，段祺瑞任临时执政，11月24日，黄郛内阁解职，任财政善后委员会副委员长。

1925年10月，黄郛出席在北京召开的关税会议。当时他已被任命为驻德公使，因关税会议的工作未完，又因他是段祺瑞和冯玉祥之间的政治中间人，所以未能就任。1926年1月，关税会议继续开会，黄郛试图说服日本方面，认为中日两国应该互助，日方应当带头放弃关税特权，但未能成功。4月，国民军撤出北京，黄郛退居天津。

1926年10月，北伐军到达长江流域，11月冯玉祥给黄郛写信，向他请教此后的行止。同月底，蒋介石给他写信，又派张群去见黄郛，邀他支持国民党。黄郛终于同意了，于次年1月初离天津到南昌，见到了十多年未见面的蒋介石。1927年1月12日，蒋介石去武汉参加重要的国民党会议，黄随同前往。在武汉会议中，右翼势力受到挫败，黄郛于两周后离去，暂住在庐山。黄郛被邀请参加国民党，蒋介石为介绍人之一，但黄未允。黄郛和蒋介石及其他国民党官员作了多次策略问题的讨论，他提出的建议有一项是主张与冯玉祥、阎锡山联盟。当时对蒋介石最感紧迫的是上海的形势，派黄郛到上海尽力为国民党夺取胜利。1927年3月22日攻占上海。

1927年4月中旬，国民党内左右派分裂，蒋介石在南京成立了反对派政府。当时，冯玉祥在南京的蒋介石和武汉的汪精卫之间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黄郛和谷鍾秀为南京方面的代表分别去见冯玉祥和阎锡山。黄郛出席了6月19日到21日蒋介石和冯玉祥在徐州的会议，冯玉祥决定站在蒋介石一边反对武汉政府。6月21日冯玉祥致电武汉政府声明他的态度，此电系由黄郛拟稿。

1927年7月7日，黄郛任上海市长。根据孙中山的计划，上海市区已扩大，成为特别市，直接属国民政府。黄郛着手从法律和行政上筹组新市政府，但在8月12日蒋介石辞职后没有几天，他也辞职了。

1928年2月，蒋介石重掌国民政府大权，黄郛任政府委员，外交部长，他处理以前遗留下的1927年3月南京事件中国民党军队使一些外侨的生命财产受到损失的索赔交涉。4月，他圆满地解决了这一事项，同时黄郛又派一名代表

去东京，劝日方不要干扰北伐军的进军。但是，日军于4月出兵山东，造成了5月3日在济南的冲突。那时，蒋介石和黄郛都在济南，立即回到南京。黄郛为此提出抗议并要求国联干预而未成功。5月21日，他到上海，向南京电请辞职。

黄郛到浙江的山区休养胜地莫千山隐居有三年之久，他既不就出使伦敦和柏林之职，也未应1929年6月导淮委员会副委员长之职，但出席了该委员会的成立典礼。他研究佛学，并对莫千山村民的文化经济情况发生兴趣，当时国民党代理组织部长陈果夫常常打扰黄郛的田园生活，向他请教党务组织的问题。1930年10月，国民政府和阎冯北方联盟的激战结束，黄郛撰《祈祷和平》一文，作为社论在上海各报发表。1931年4月，他被聘为指导整理北平市文化委员会委员，但他仍拒不肯离开莫千山。

1931年发生了九一八沈阳事变，日本关东军开始向北推进后，黄郛觉得不能再置身于中国政治生活之外了。他到上海帮助成立了一个新中国建设学会，作为讨论国事的场所。该会出版了《复兴月刊》。但黄郛并未忘怀莫千山的百姓，创办了莫千山小学，1933年3月，组织了莫千山乡屯改进协会。黄郛重新出现在公众事务的活动，导致他1933年6月被任命为管辖华北五省的行政院驻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日本方面已开始策划在这些省份中成立自治政权。黄郛被派进行谈判，结果出现了5月31日的塘沽协定。人们都认为这等于是屈服，黄郛在此事中的作用，被斥为“亲日汉奸”。

当时，冯玉祥从山林隐居出来以对付日本的威胁，自任民众抗日同盟军总司令，招募军队。黄郛和宋哲元代表国民政府前去劝他放弃这一计划。8月，冯玉祥解散了军队又回到泰山隐居。当时，华北地区铁路已恢复通车。10月，黄郛回南京汇报时，到泰山访见了冯玉祥。黄郛回到北平，积极从事加强政务委员会。他拒绝陈铭枢邀他参加反蒋介石的福建政变，也未应蒋介石之请出任国民政府中的更高级官职。1934年4月，蒋介石对中国共产党进行第五次围剿时，黄郛到南昌会见蒋介石。他9月回北方后，12月谈妥与东北—那时为满洲国—恢复通邮。群众对黄郛日益不满，激动的民族主义人士认为他与东北日伪当局所订协定事实上承认了满洲国。黄郛被任命为内政部长，但他仍留在北平。

1935年1月，日军占领察东的沽源，华北出现了新危机。虽然签订了一个妥协性的协定，但日本的军政和经济压力继续增加。黄郛借口疾病请假回到莫干山。8月28日，北平政务委员会撤消。9月10日，黄郛辞去内政部长之职。实际上他从未就任此职。12月初，他在南京参加政治会谈，不久回上海。1936年2月，又回到莫干山。

黄郛曾患肝病，1936年春病势加剧。8月，他到上海进医院治疗，诊断为肝癌。9月，被选为国民政府委员，1936年12月6日死在上海。

黄郛曾结过两次婚。第一次在1898年，1910年离婚。1912年与沈亦云结婚。黄郛遗有寡妻沈亦云，和两个已婚的女儿熙文和熙治。

1937年出版一本名为黄郛的回忆论文和书信集《黄膺白先生古今感忆录》的纪念性文章和文集。沈亦云后来迁居美国，写了一篇《黄膺白先生家传》，又由沈云龙编成一本编年传记《黄膺白先生年谱初稿》。

黄 兴

原名：黄軫

字：克强

号：廛午

黄兴(1874.10.25—1916.10.31)，革命党人，创立华兴会，1905年与其它社团一起并合为同盟会，曾领导1911年4月27日的广州起义，1914年前，他是孙中山的重要代表之一。此后因政党改组问题与孙中山破裂。

黄兴原籍湖南长沙，父亲是一名塾师，曾任比县低一级的名誉职都总(译音)。黄兴进岳麓书院受传统教育，1893年应试中秀才。1898年进两湖书院读书五年，该书院系张之洞创办，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宗旨。1902年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后，经张之洞选送去日本学习师范教育。

1902年5月，黄兴到东京，进弘文学院。该校为留日中国学生短期讲授法律、物理、政治科学，及师范教育各课程。黄兴对军事教育很感兴趣，课余时间多用于打靶和军操。他和杨度等湖南籍同学创办《游学译编》月刊，翻译

日文、西文有关政治制度和政治学的文章。他和不少留日的中国学生怀有反满思想，1903年5月，组织了“军国民教育会”。该会表面上反对俄国侵吞满洲，实际上则以推翻满清为目的。回国的会员，在本省通过宣传、武装起义和暗杀活动以推动革命事业。

黄兴于1903年6月4日从东京回国，他到上海时，应胡元倓主办的长沙明德学堂之聘。同年秋，他充分利用他的地位，在学生中进行革命宣传。这些活动导致他不久辞离该校。

1903年底或1904年初，他在湖南创办了华兴会，会员有宋教仁、张继、章士钊、刘揆一和本地哥老会首领马福益等人。黄兴又组织了“同盟会”，为了保持华兴会和本地会党的联系。黄兴等人计划于1904年11月，趁长沙庆贺慈禧太后七十生日时，炸死在湖南的满清大员，长沙、岳州、衡州、宝庆、常德各地同时起义。密谋泄露，黄兴被迫逃亡，11月20日到上海，因谋刺前广西巡抚王之春案之嫌被捕，四日后获释，逃往日本。1905年初，他又携带供马福益及湘西会党起义用的军火回到湖南。军火被发觉，马福益被政府军捕获，黄兴再次逃往日本。

黄兴不久便成为中国革命运动在日本公认的领袖。1905年春夏季他在日本常有中国的年青革命党人和日本的同情人士孙中山的至友宫崎寅藏等人前来访问。1905年7月，他在日本经宫崎介绍会见了孙中山。两人初步商谈，认为有联合国内和日本各革命团体的必要。7月30日，在东京的革命党人开会，决定新组织革命团体中国同盟会。同盟会于1905年8月20日正式成立，以孙中山为会长，黄兴居第二位，他的华兴会中的同人如宋教仁、张继、刘揆一亦各担任重要职位。原由宋教仁主办的杂志改名为《民报》，成为同盟会的机关刊物。

1905年秋，继孙中山去西贡之后，黄兴等同盟会员离日回国，筹建分会并争取群众对革命运动的支持。黄兴根据过去经验，认为同盟会即使有会党的援助，倘无军队的支持，仍很少成功之望。黄兴为了争取军官支持革命，秘密到广西及其他各地，但成就很少。他在新加坡和孙中山做短暂商谈，又在香港住了几个月，于1906年9月回到日本。三个月后，湖南广西起义的消息传到东京同盟会总部。1907年1月，黄兴去广东和起义部队取得联系，因政府当局的警

觉，迫使黄兴再到日本。

满清当局加强警惕，长江一带许多同盟会员被捕并处死。华中一带的连续失利和宋教仁在满洲活动的失败（宋、黄等人在1907年3月所策划），黄兴很觉沮丧，将注意力转到广东和广西。1907年夏，他离日本去河内协助孙中山和胡汉民准备在广东西部起义。9月初，黄兴进迫钦州未能成功。三个月后，他与孙中山、胡汉民及少数部队，从安南进入广西数英里支援该地的黄明堂部乡勇，这一支乡勇攻占了镇南关附近的一座山地要塞，在此次轻举妄动的冒险后，孙中山决定回河内。法国当局发现了他的身份，1908年3月孙被驱逐离开印度支那，由黄兴、胡汉民主持河内的工作。黄兴率领二百余人攻入广东钦州、廉州，因缺少弹药又加以不适应热带气候而士气不振，乃由广东边境退到印度支那。5月初到河内不久，又趁火车赶到云南边境，那时河口爆发一次起义。几天后，他回河内和胡汉民会商，在他回河口途中，他为法国边防警察发觉，被押解出境。

黄兴去新加坡逗留数月，1908年秋去日本，和《民报》主笔章炳麟在一起。他在东京发现1907—1908年国内起义屡次失败，不仅耗尽了同盟会的资金，而且严重挫丧了该会的士气。不少会员主张采取暴力行动，用暗杀手段代替毫无成效的武装起义战略。黄兴个人虽不赞成这种路线，但同意在东京设立密室作制造炸药的试验。在这屡遭挫败的不幸年代中，会内的个人矛盾也增加了。同盟会东京总部的章炳麟、张继，宋教仁等人攻击孙中山的领导。1908年孙中山在两广的失败后，东京同盟会人士要撤除孙的领导地位，代之以黄兴。黄兴力求避免会内的分裂，要求支持他的人停止对孙中山的攻击。

黄兴和其他革命党人想方设法渗入正规军队中游说军官投身反满活动，但并无成效。不过，到1909年底，军队策反的条件比较有利，当时广东新军二千多官兵秘密参加了同盟会。1909年秋，胡汉民领导的同盟会南方支部在香港成立，该支部立即组织了一次广州部队的起义。原新军统带因同情革命嫌疑而被撤职的赵声和胡汉民共事。1910年1月27日，黄兴从东京到香港负责指挥起义的准备工作顺利进行。但在原定起义日期的前几天，在新军中发生了一次兵变，起义部队为效忠清廷的军队所镇压，起义计划受阻。此次起义结果虽使革

命党人失望，但黄兴等人在清廷军队中策动反对政府的行动却获得了初次的成功。

同盟会在广州清军中仍有不少秘密同情者。因此，黄兴认为广州是举行革命起义的最好场所。这一年，黄兴从事为再次起义募集资金和人力。1910年3月底，他与赵声、胡汉民等人离香港去新加坡为新的起义募款，但又匆匆的回香港和一个秘密的日本军事代表团举行会谈。6月10日，黄兴到横滨和孙中山作短暂会商。在得到孙中山从美国筹来的捐款后，他到缅甸准备在云南组织起义。不过不久就放弃了这一计划。黄兴从仰光到马来亚，参加了11月13日槟榔屿同盟会领导人的会议。出席的同盟会首领有黄兴、孙中山、赵声、胡汉民、邓泽如和马来亚华侨界头面人物，准备对广州全线进攻。此项军事行动由同盟会的五百名志愿队发起，又由新军中的同情者协助。此后两个月中，黄兴等人又从东南亚、荷印、加拿大、美国华侨中筹集了十八万港币作起义费用。1911年1月18日，黄兴由槟榔屿到香港，成立一个布置周密的统筹部，自任部长，赵声为副，胡汉民缺席时由陈炯明代秘书课长。

起义日期原定1911年4月11日，因等待香港运来更多的军械和人员而延期。此时政府当局已获悉此密谋，在广州严加防范。4月23日，黄兴从香港到广州，由于他怕继续改期将会使起义无限期地拖延下去，那样将失去在财政上支持同盟会的华侨的信任，乃决定于4月27日发动进攻。由于各队之间缺乏协调和一些入临事仓惶，只有黄兴率领的一队按照计划进攻。他率部猛攻并放火烧督署，但在随后的巷战中起义部队却失败了，约八十五人被杀。黄兴受伤，右手丧失一指，逃往城南郊区，受到一名积极从事地下革命工作的寡妇徐宗汉掩护。4月30日，黄、徐逃到香港，徐后来成为黄兴的第二位夫人。

黄兴领导1911年4月27日广州起义，比他对其它任何一次中国革命运动的贡献更为出名。这是到那时为止同盟会所组织的最大胆、代价也是最大的一次军事行动，国民党史册中誉为“三·二九”之役（按农历为3月29日）。其与前此的革命尝试不同。因为这是在中国的一个重要城市中进行的。1918年，民国建立后六年，广州北面的黄花岗树立了一座宏伟的纪念碑，七十二名“革命烈士”埋葬于此。

广州起义的同时，黄兴派谭人凤在两湖组织起义，他终于同意同盟会中两湖籍会员，其中包括谭人凤、宋教仁的要求在华中采取较多的行动。他们对同盟会集中力量于南方边地各省的军事战略有所不满，黄兴答应倘有足够经费将照办。引起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的那个秘密团体就是黄兴拨给经费所建立的。

正当黄兴在香港怀念他那些4月间在广州起义中牺牲的同伴时，谭人凤、宋教仁等人已于1911年7月31日在上海成立了同盟会中部总会，策划长江地区的革命。同时，本地革命党人在湖北新军中很活跃。革命迫在目前，中部总会首领一再请黄兴前去领导。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黄兴赶快离香港于10月24日到上海。黄兴、宋教仁等化装成红十字会人员，溯江而上到了汉口。

黄兴到武汉地区时，革命党在全无统一指挥的情况下已战斗了两个多星期。他和原清军指挥官被迫参加起义的黎元洪洽谈后，就任民军总司令，守卫汉口阻击清军冯国璋部。黄兴到达时，市内已发生巷战。1911年11月2日，黄兴所部战败，渡江去武昌，汉口落入清军之手。同日，武昌军政府紧急会议，任黄兴守卫汉阳。黄兴及其部下在众寡悬殊的情况下坚守三星期之久，使其它地区的革命党势力有足够时间举行起义。11月27日，汉阳落入清军之手，但全国已有十多个省宣布脱离清政府而独立。

黄兴把溃败的军队从汉阳撤到武昌，决定去11月初已落入革命之手的上海。他到上海的次日，12月2日，民军攻占南京，十四省代表汇集在南京，推举黄兴为临时大元帅负责筹建临时政府，选举之前，由黄兴暂行临时总统职权。当时，武昌的局势已趋稳定，黎元洪也希望能获得权位。黄兴了解到从清军起义过来并在攻占南京立功的军人希望黎元洪在南京主持大计。因此黄兴机巧地要将此位让给黎元洪，而黎元洪又坚持由黄兴担任。结果形成僵局，直到孙中山回国，临时政府方得成立。

1912年1月，孙中山到上海一周后，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黄兴任陆军总长，后又任参谋总长。除财政、外交事务由孙中山亲自处理外，黄兴似乎在临时政府中有极大权力。3月，孙中山辞职，让位于袁世凯，临时政府由南京迁往北京，黄兴任南京留守（这是一个古代皇帝离首都时，另派官员处理军政

民政大权的官名)，处理南方民军的军事民政。由于缺乏军饷并为表示支持北京中央政府的诚意，黄兴要求解除此职。6月14日，留守府撤消，他的军队遣散。

1912年初，同盟会成为公开的政党，孙中山为总理，黄兴为协理。民国政府在北京成立后，袁世凯和同盟会人所控制的临时国会间的摩擦日见发展。1912年8月25日，同盟会和另四个党派合并组成为议会政党—国民党，孙中山任理事长，黄兴及其它六人为理事，宋教仁代理理事长主持国民党总部。孙、黄应袁世凯之请前去北京商谈解决南北的政治分歧。9月11日到10月5日黄兴在北京期间，力图使内阁阁员加入国民党，并要求袁世凯注意到按照议会制政府原则办事的重要性，以求稳定政局。他本人拒绝内阁总理职务及陆军上将等荣誉，而把精力放在中国的经济建设上，计划在湖南开发矿业，11月28日，袁世凯任命他为汉粤川铁路督办，1913年1月底，黄兴辞去此职。

1913年初举行全国选举，国民党作为多数党回到新国会，但国民党并不想对袁世凯的总统地位挑战，而是想取得对内阁的控制。但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被刺和国民党反对袁世凯的“善后借款”，袁世凯和国民党间的对立增剧。黄兴不愿诉之武力与袁世凯决裂。他坚信民主政治的意见分歧应当用法律和政治手段解决。不过，一旦法律及政治办法失败，他也愿意赢得时间作军事上的准备，因为他深知国民党方面军事力量薄弱。

1913年6月，江西、广东、安徽诸省的国民党派的都督被袁世凯撤职，袁世凯想摧毁国民党的用心已很明显。江西督军李烈钧和黄兴及其它各省国民党领导人起而反袁，7月爆发了所谓的二次革命。黄赶赴南京就任江苏讨袁军总司令，迫使江苏都督程德全宣布讨袁。但袁世凯的军力远胜于其敌手，迅速南下。黄兴认为继续抵抗是无意义的。7月28日黄离南京，8月中旬，由上海去日本避难。

二次革命失败，孙中山及其他国民党人士在东京批评黄兴讨袁行动不果断，孙黄两派的经常争吵使孙中山和黄兴之间的关系日益紧张。孙中山为加强党的纪律，准备改组国民党为中华革命党，要求党员宣誓效忠于孙中山，并在誓约上按指印。黄兴和其它一些国民党中重要领导人严加拒绝，认为此种行为违反共和革命的精神。1914年6月，经过改组的政党正式成立，只有八省代表

出席，那时黄兴已在去美国的途中，黄兴缺席期间，该党的副职虚悬。

黄兴在美国有两年之久，主要从事反对袁世凯称帝的宣传并筹募捐款。1916年4月，他从美国到日本，以便于与国内的政治形势发展取得密切联系。6月16日，袁世凯死去。7月初，黄兴回到上海，孙中山已悄悄放弃了个人效忠的誓约要求，黄兴和孙中山之间的矛盾得到和解。三个月后，黄兴胃病复发，1916年10月31日去世，年四十二岁。

黄兴遗有妻廖澹如(1873—1939)，也是长沙人。他第二个妻子徐宗汉(1876—1944)，在1911年4月黄花岗起义后帮助他逃出广州去香港。还有五个儿子和两个女儿。廖氏所生的长子黄一欧(1893—)后任立法委员，长女黄振华(1896—)，1948年任立法委员，幼女黄德华与薛君度结婚，薛后在马利兰大学教书，1961年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他所著的《黄兴与中国革命》一书。徐氏所生之子黄一美(1911—1949)，与张继的女儿结婚，黄一球(译音)与程潜的女儿结婚。

黄 侃

字：季刚

黄侃(1886—1935.10.8) 音韵学家，诗人。以研究刘勰的《文心雕龙》和顾炎武的《日知录》而知名。

黄侃出生在湖北蕲春，他是曾任四川盐茶道并署理按察使黄云鹄的幼子。父亲去世时，黄侃才十三岁，其幼年情况不详。二十岁时曾为两湖总督张之洞所接见并派去日本留学。不久即与在日本担任《民报》主编的章太炎会见，成为章太炎的弟子，常在《民报》上用“运甕”的笔名发表反满文章。

1912年民国成立后，黄侃回国，曾短期任直督赵秉钧的秘书长，赵死后，应聘去北京大学任教，在那里成为刘师培的信徒。1919年五四运动时，他因反对运动领导人陈独秀和胡适的主张而辞职，去武汉师范学堂教书。1927年，章炳麟的另一名弟子汪东任东南大学(中央大学前身)中文系主任，请他来校教

书，黄侃在该校教书，一直到1935年10月去世。

黄侃在学术上的主要贡献是音韵学。他认为古代汉语中无第三声或第四声，近代汉语的基本语音不下72个。有关这方面的著述，有1936年出版的他的《集韵声类表》，这是十三世纪时的韵书《集韵》的注释。另一重要著作是《文心雕龙札记》。研究刘勰的文学评论集《文心雕龙》。黄侃的著述包括有二十篇文章，校正了黄叔琳《文心雕龙》刊本的不少错误。在《文心雕龙黄注补正》中引用了孙诒让和李湘（译音）的注释。黄侃的著作又经他的弟子范文澜补充为《文心雕龙注》于1925年出版。

黄侃对顾炎武的《日知录》刊本下了很大功夫。虽然《日知录》的标准版本是潘来刊印的，但章炳麟长期怀疑该著述有几种不同稿本。1931年张继发现了清初刊刻的《日知录》珍本，其中有些条为潘来本所缺，所缺各条是遵奉当时的禁例而删去的，说明了著作者是明代的忠贞遗民。黄侃校刊两种版本，于1933年出版《日知录校记》，标出了潘来本中的改动。黄侃的其他著作，由他在南京的学生编成《黄季刚先生遗著专号》于1937年出版。

和章炳麟一样，黄侃禀性坦率。据说他在北京大学教书时，曾为音韵学的一项解释与同事陈汉章发生争执，几欲动武。两人后成为知友，同在一个诗社相互咏酬。

黄侃的诗，有说他效法王闿运的风格。那是受第三世纪魏晋诗人的强烈影响，有三本黄侃的诗集出版，《续秋华室》收有1906年到1915年的诗，《石桥集》（译音）和《玉龙山诗》（译音），该集收有三十七首诗，并有章炳麟所写的序，于1927年出版。

黄 光 瑞

黄光瑞（1898.6.5—），飞行员，参加1928年国内首次长途飞行。曾任广东空军司令，1936年率领人员和飞机投向国民政府，对结束陈济棠叛变起了作用。后来任航空研究所主任，航空委员会副主任，1946年退休。

黄虽出生在广东台山，童年时即被带往美国，在旧金山的唐人街就学。他

是被杨宪宜选中培养当飞行员的中国青年之一。杨是孙中山派往美国考察航空并招募新空军人员的代表团团长。他买了两架教练机并雇用美国教官。这一批受训者中有林伟成（译音），后任广西省空军司令；陈作霖（译音），后为欧亚航空公司负责人；杨观禹（译音），他和黄光瑞参加了中国的首次长途飞行，并任中国空军空运队队长。由于政府经费不足，飞行燃料及教官工资均须由受训者自己支付。

经过一年的初步飞行及维修训练后，黄光瑞参加同盟会加州分会工作，担任一个采购军火委员会的主要技师。通过飞行表演他和他的同事募集资金买到六架旧的珍妮式飞机，拆散运回广州。1922年孙中山在广州成立大本营，黄被召回国任航空队的飞行员。该队有从美国运回来的旧飞机六架，这些飞机曾在对两广地方军阀的多次战役中使用。飞行员有时对敌人扔下几枚手制的炸弹，但通常是飞机引擎的轰鸣声瓦解了敌人的士气。黄光瑞于1923年任航空队长，1924年任航空局长。他和孙中山经常有个人接触，孙多次给他奖状和奖金以酬其成功。

1926年孙中山逝世后，蒋介石任黄为在大沙头（译音）新建的航空学校校长。1927年初，黄被派去苏联购买飞机。飞机未买成，但黄借此机会在第二航空学校学习了六个月。黄回国后任广东空军第一大队队长。该大队虽属新成立的国民政府管辖，但实际是受广东地方的控制。

1928年，广东第八路军航空处处长张惠长决定举行一次长途飞行作为航空活动宣传。黄光瑞与杨观禹随张惠长参加。这三名飞行员驾驶一架报道称之为“广州”号的单翼飞机于11月11日上午八时由广州起飞，他们在下午四时到汉口，受到热烈欢迎。恶劣的气候使他们延至11月15日上午九时十五分飞往南京。他们在下午一时三十分到达南京，那里为他们举行了一个有冯玉祥、何应钦、孙科及其他要人参加的官方欢迎会。他们于11月20日离南京飞往北京，26日飞往沈阳然后去天津，12月4日上午九时离天津，不到六小时后抵上海。在那个飞机场设备简陋，又没有无线电和天气预报的时代，这样的飞行是需要极大勇气的。这三名飞行员为此受到明令表彰并授与勋章。

1943年黄被派往法国、意大利、英国和美国考察军用航空。他在国外的阅历使他深信，中国只有统一起来才能强盛并独立。1936年广东军事头目陈济棠

联合广西头目李宗仁和白崇禧反对国民政府。7月初，黄召集广东空军的一百六十名飞行员，命令他们驾驶六十二架飞机飞往韶关机场。到达后，他又命令部下驾驶五十八架飞机飞往南昌参加国民政府部队。他本人和其余四架飞机及机上人员飞往香港，在那里发表声明宣布效忠南京。他的这一行动对平息两广的叛乱起了作用，因为两广的头目知道没有空军是成不了事的。

1936年9月，黄光瑞任杭州中央航校校长。三个月后，他又被任为航空委员会委员。1938年3月，他任空军委员会副委员长及成都空军司令。1941年4月该会改组，黄光瑞负责军用航空，并被任为航空研究所所长。1943年2月航空委员会再度改组，黄又被任为副委员长及航空研究所副所长。1946年1月黄升为空军中将，并根据自己申请，列入后备役。该年末，黄光瑞当选为国民参政会代表。他移居广州，后又迁往香港。

黄和他的妻子蔡氏有二子，维球、维志；四女，碧霞、碧云、碧翠、碧婵（均译音）。他的子女都是在美国受的教育。

黄 庐 隐

原名：黄英

笔名：庐隐

黄庐隐（1898—1934.5.13），作家，她的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在1925年负有盛名。她的许多作品刻画了五四运动时期中国青年人的追求。

黄庐隐生在福建的一个绅士家庭。她出生那天，恰好她外祖母去世，因此她那未受过教育的母亲认为她不祥而不愿给她哺乳。她随着一名乳母被送到乡下去抚养。三岁时回家，与全家一起迁往湖南，那时她父亲任长沙知县。三年后，父亲去世，遗下寡妻和四个孩子。黄庐隐的舅父在北京当御医，于1907年邀她们全家从长沙迁往北京。母亲待她极苛，家中其他成年人都认为她智力低下。她因不肯读书常受鞭笞，又被迫和无知的女佣同睡，家中来客时被锁在园子里。

九岁时，黄庐隐到北京的一所教会寄宿学校，因年龄最幼常受同学欺凌，

迫令操作力所不及的可憎的杂务。早年的经历使她满怀怨恨，她企图从基督教寻求安慰。

1911年革命后，她长兄从福建回家，帮她学写作文，1912年到1917年间她先在一所小学，后在一所女子师范学校学习，进步很快，引起她母亲和亲戚的惊讶。她在师范学校最后一年，对文学特感兴趣。她广泛浏览，热爱中国通俗小说和林纾所译的西方小说，因此获得了“小说迷”的绰号。十七岁时，她抗拒母亲所定的婚约。

黄庐隐十八岁由师范学校毕业后，又在母亲的压力下，去教书以补家用。她先后在安徽、河南等地的一些学校教书，但每处为期都很短。她的堂兄弟姊妹称她为“一学期教师”。

1919年，黄庐隐积蓄了一些够上学的钱，进了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和她1919年秋同班入学的有后来成了很有名的作家苏雪林，她们在安徽安庆一同教书时就认识。新文学和新的政治理论在国内迅速占有地位，黄庐隐热情的投身于五四运动时期激情的思想潮流中。她虽是一名新生，但也被选为学生会的主席。她精力充沛，北京方言流利，领导有力，因被同学尊称为“大姐”。她废除了三年前的婚约，因为她认为未婚夫的智力“太平庸”。她加入了一个“社会改良会”的小团体，认识了郭梦良，后来和他结了婚。1922年她和几名同班同学去日本游历，日本人的“良好秩序和良好政府”给她印象很深。

1922年毕业后，黄庐隐又去中学教书，为北京晏阳初创办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编了一年的千字文读本，有一段时期开了“华彦书店”（译音），主编杂志《华彦半月刊》，她在北京的一所女子学校当校长并教中国文学的课程一直到1928年国民革命军进入华北。

黄庐隐的写作生活在大学时就已开始。当她在大学一年级时，受新任职于北京大学的胡适的影响。1919年—1920年，她听胡适讲授中国哲学史，赞成他的主张，用白话文写作。她把第一篇白话文作品《一个著作家》寄给了《小说月报》的编辑茅盾，1921年该文发表更增加了她的信心。1920—1922年中，她写了十多万字，其中有小说、散文和游记。她第一篇成功的短篇小说《海滨故人》发表于1925年。如同她的其他小说一样，这也是一篇自传性的小说，把她

本人写成五名同班大学生之一，在传统的婚姻道路上生活下去，发现了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差距。小说的调子是抑郁的，风格是辛辣嘲讽的。同性和异性之间的爱是她的小说主题，但其更深刻的主题是在探索人生的意义。《灵海潮汐》《曼丽》，《女人的心》，《象牙戒指》，都是描述五四时期的中国青年的追求。据茅盾说，黄庐隐的作品的价值在于反映了她那时代中国青年的心理。她小说中的女主角大都是她个人经历的缩影，都是和命运作斗争的斗士。她们为克服不幸而斗争，并且站在坚强的立场反对腐朽的社会风尚。黄庐隐的主要题材领域是属于个人的和本人的经历，她的创造不外乎热情，苦难和感情与理智之间的矛盾这三个要素。她自称：“我就是在矛盾中出生和消亡的，我的苦难是无法解脱的。”她主张不加限制地发展个性。她的小说虽然结构松散文辞造作，但其诚挚热情并流畅的风格补偿了缺点。她的作品在中国女学生中很风行，自1925年发表《海滨故人》后，享有了九年盛名。她和谢婉莹（冰心）是在新文学运动早期共享盛名的两个第一流的女作家，她们都是文学研究会会员，她们是个人主义的理想主义者，强调精神生活和热爱自然。

黄庐隐的早期作品，以爱情和与命运作斗争为题材的感伤故事，反映出中国旧诗和通俗小说的影响，她在后期作品中转而注意到社会问题。她利用教书的馀暇在沉重负担下写出了大量作品，她精神贯注，写作敏捷。

黄庐隐结过两次婚，她和一个研究中国文学又倾心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郭梦良的第一次恋爱曾引起广泛的非议，因为郭是有妇之夫，与原妻离婚后与黄庐隐结婚。她们的结合据说并不美满，两年后，郭去世了。后来，黄庐隐又与清华大学的年轻学生诗人李唯建发生爱情。这次恋爱和第一次一样，又受到公众苛责，因为黄庐隐比李大好几岁。她们于1930年结婚去东京渡蜜月，在日本住了一年，回国后，住在杭州。1934年，黄庐隐在上海大华医院因难产去世，年三十七岁。黄庐隐死前，着手写了一本有关1932年1月十九路军淞沪抗日的小说《火焰》。

她在1934年上海出版的《庐隐自传》中追溯了她在过去十年的思想发展，分为三个阶段：伤感、转变和开朗。第一个阶段历时最长，她是受叔本华的影响认为人生不过是苦海，她的至亲知友的死使她深感忧伤和空虚，她借助烟

酒以解愁（“慢性自杀”）。《海滨故人》（1925）、《灵海潮汐》、《曼丽》（1927）都属于这一阶段的产品，后来她在一次患病中对忧伤有了更进一步的理解，而开始发展对别人的同情。她与李唯建的恋爱，使她已死的热情复燃，使她对自己有了进一步了解，这是她的转变的主要原因，1930年的《归雁》、1931年的《云鸥情书集》是她第二阶段的产品。黄庐隐战胜了忧伤，写作时不再仅仅想到自己。在《女人的心》中，她斥责封建传统，反对只对妇女而不对男子要求贞操的那种思想。这篇小说和《情妇日记》代表了她第三阶段的思想。

黄 慕 松

黄慕松（1885—1937.3.20），军人，曾任保定军官学校校长，黄埔军校军官教导团副团长。1933年、1934年代表国民政府去新疆、西藏。1935年任蒙藏委员会委员长，1936年任广东省主席。

黄慕松生在广东梅县。他父母是客家族的富裕地主，他在本地私塾受传统教育后，1903年进北京陆军学校，四年后，由官费派往日本士官学校工兵科。1908年毕业回国后，任北京陆军学校教官，不久又调往新成立的保定军官学校，最后任该校校长，1919年升为少将。1920年去莫斯科参加中俄谈判后，任北京军事部门的参谋，负责处理中俄事务。1924年，黄慕松宣布效忠国民党而去广州，在蒋介石主持的黄埔军校工作。1926年北伐开始，黄慕松留在黄埔任军官教导团副团长、政治委员。国民革命军在长江的势力稳定后，黄慕松到南京，任第三军军长。

1928年12月29日，张学良效忠国民政府后，黄任北京陆军大学代理校长数月。1930年1月，任国民革命军参谋部测量总局局长，由于担任此职，他参加了有关土地测量和航空测绘问题的国际会议。他作为中国代表出席了国联在日内瓦召开的国际军缩会议筹委会。1931年12月，被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1932年2月日内瓦召开国际军缩会议，黄慕松为中国代表。该会延期到1933年3月，黄慕松回南京，任陆军副总参谋长及边疆事务局长。

1933年春，盛世才在新疆取得权势后和马仲英的回民部队发生冲突。黄慕松受命为宣慰使去新疆，1933年6月10日到达乌鲁木齐。那时盛世才和马仲英双方正准备开战，黄慕松立即发布命令要求停止军事行动，但双方均未理睬。盛世才在战争中获胜。不久他说黄密谋推翻他，因此把黄慕松软禁起来。7月4日，盛世才把三名国民党官员（也是所谓的密谋策划者）在软禁黄慕松房屋附近可望见之处枪毙。盛世才和新疆省代主席刘文龙将此想象的密谋向国民政府报告并要求全面调查。蒋介石和汪精卫复电警告盛世才谨慎行事，行政院并命黄慕松立刻回南京报告。盛世才在黄致电南京建议承认盛、刘在新疆掌握权力后，才允许黄慕松离新疆，7月21日，黄慕松到南京，8月1日，国民政府对盛世才在新疆的地位加以承认。

十三世达赖喇嘛死去后，1934年1月国民政府派黄慕松为赴西藏特使。当时，国民政府力图恢复在西藏的势力，黄慕松到拉萨后，代表国民政府向达赖喇嘛致祭，并发布宣言劝告藏民信任国民政府是西藏繁荣幸福的唯一途径。黄慕松与西藏摄政热振呼图克图谈判。黄提议汉藏恢复全部关系，并允许亲汉人的班禅喇嘛回西藏。热振呼图克图原则同意设立驻藏办事处，并同意班禅在不多带大批汉人随从和不打算在拉萨行使政治权力的条件下，可以准许回藏。

1934年10月，黄慕松回南京后，向国民政府报告英国的影响仍是西藏外来影响的主要势力，并建议将1932年12月任命为西陲宣化使的班禅，派兵护送回西藏。1935年2月，拨给班禅的五百名汉族军队作为护卫，在宁夏阿拉善旗成立总部。3月，黄慕松任蒙藏委员会委员长，不久他向行政院建议承认内蒙古以改善内蒙与国民政府的关系。4月2日，授黄慕松以中将军衔，11日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

1936年7月28日，黄慕松继陈济棠任广东省主席，很多人认为这是蒋介石对这个能巩固国民政府在华南势力的人物的信任。据说，黄慕松曾是1908年推荐蒋介石到日本留学的一人，蒋介石敬之如师。1936年8月，黄慕松就任广东省主席，余汉谋任绥靖主任。黄慕松死在1937年3月20日，年五十二岁，遗有寡妻和子一人，女三人及八十二岁老母，

黄绍竑

别名：绍雄

字：季宽

黄绍竑（1895—），军界首领，与李宗仁、白崇禧组成所谓桂系。1930年与李、白分裂后，历任国民政府交通部长、浙江省主席、湖北省主席，第一、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五十年代中曾在北京中央人民政府中任职。

广西容县是黄绍竑的出生地，自明末黄家即定居于此。1900年义和团后，他父亲黄少颠从广州请来两位思想进步的教师到本乡教书，黄绍竑即在他父亲办的小学读书。

1911年春，黄绍竑进广西陆军小学，同学中有李宗仁、白崇禧。在武昌起义及广西宣布独立后，有黄绍竑在内的一群学生组成（北伐）敢死队，黄绍竑任班长。该队去武昌地区，但革命时期的军事阶段已告结束，该队未见到任何战斗。该队转往南京拟入军官学校。黄绍竑入南京入伍生队骑兵科，但不久即离去。该团后调往武昌改为第二陆军预备学校，黄绍竑进该校，1914年冬毕业后分配去北京任职。黄到北京分到庐永祥驻北苑的第十师。1915年6月，进保定军官学校第三期，同期同学有白崇禧、夏威。1916年底毕业后，去广西进桂军第一师。1917年夏，广西省当局成立广西模范营，由从日本回国的士官学校毕业生马晓军指挥。黄绍竑在黄旭初手下任连副，另两名连副是白崇禧和夏威。

1917年秋，模范营调往湖南参加护法之役，担任广西督军、湘粤桂护法军司令谭浩明司令部的警卫部队。模范营增设机枪连，黄绍竑、白崇禧、夏威自愿任连副，因机枪连缺少连长，由三人共同指挥。自吴佩孚打败谭浩明之后，谭改编模范营，黄和白崇禧均任连长。

1919年初，桂军回本省，模范营调到南宁参加所谓剿匪战斗。冬，马晓军任模范营营长，1920年初调往广东肇庆驻防。

1920年冬，孙中山在广州成立政府，调动粤、黔、滇军进攻桂军。10月，

桂军失败，沿西江撤往广西，模范营及李宗仁所部殿后。

马晓军力求保存实力采取半独立的或中立的立场，黄绍竑和白崇禧随他在1921年2月到桂西百色。6月粤、桂军再起冲突，粤军由陈炯明率领攻占了广西全省。模范营仍在百色驻防，趁机收编其他部队改编成拥有五营之多的一个军，以黄绍竑任第一营营长。该军被刘日福广西自治军包围，黄绍竑带领其大部逃走重募新军，马晓军任命他为第一团团长。年底，第二团团长白崇禧因堕崖受伤，黄绍竑又任第二团团长。

1922年春，马晓军退休后，将该军交黄绍竑指挥。黄和李宗仁驻守玉林的部队会合，任第三支队司令。李宗仁将所部改编为第五独立旅，黄任第三团团长。黄绍竑在玉林数月，受命去容县驻防。约在此时，沈鸿英任广东军务督办。1923年初，黄绍竑曾率领一小支部队投奔梧州沈鸿英的司令部。当时，白崇禧秘密从广州劝说黄绍竑接受孙中山任命他为广西讨逆军司令，当年秋，沈鸿英的征讨军为孙中山的军队击败，黄绍竑取得梧州。不久，广东革命军部也到梧州，黄绍竑乃开始组织广西讨逆军，白崇禧任参谋长。

黄绍竑着手扩大他在广西的势力，和加强与广东的联系这两方面的工作。他和李宗仁的广西自治军联合，开始统一了广西。1924年6月，他们的联合军队占领南宁。7月，这两支军队以成立定桂讨贼联军总指挥部，李宗仁为总指挥，黄绍竑为副指挥，白崇禧为参谋长兼前敌总指挥而得到加强。8月，该军开往前线协助沈鸿英打败陆荣廷。

1924年11月，黄绍竑作为李宗仁的代表去广州商谈两广的统一事宜，那时他已加入了国民党。12月1日，广西讨贼军撤消，黄绍竑改任广西第二军军长，在李宗仁手下任广西全省绥靖处会办。他们在1925年2月击败沈鸿英后，又与云南督军唐继尧的滇军相遇。唐自3月12日孙中山逝世后，企图派军队经广西到广州充当孙中山的继承者。唐继尧军攻占南宁，黄绍竑初战失利未能夺回南宁。但不久滇军终于失败，残部撤出广西。

1925年底，两广商谈进一步合作。1926年3月24日，桂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七军，黄绍竑为国民党代表，李宗仁为军长、白崇禧为参谋长。6月，黄绍竑任广西省主席。

1927年黄绍竑又重返前线，他应李济深之请，编组第十五军，在汕头、潮州击败了贺龙、叶挺所率领的中国共产党部队，4月任政治会议广州分会委员，和他的一部分军队驻在广州。11月17日，张发奎在广州发动兵变，俘获黄绍竑的一些部队，黄绍竑逃走另组军队以谋反击。当时，在上海的李济深命令其部队（其中包括陈铭枢的部队），协助黄绍竑前去驱逐张发奎。黄绍竑所部虽然伤亡很大，但终于击败了张发奎的第四军。1928年4月，黄绍竑回广西。

1929年，黄绍竑、李宗仁和白崇禧的所谓桂系与国民政府的关系破裂，黄、白进袭广东未成功，而刘建绪却从湖南进攻，占领了桂林。国民政府任命柏文蔚为广西省主席，俞率领部队又于6月27日占领南宁。黄绍竑和白崇禧把部队交给自己的部下，然后去印度支那，又去香港与李宗仁会合。三人于11月回广西，在南宁成立护党民众救国军，李宗仁为军长，黄绍竑为副军长兼广西省主席，白崇禧为前敌总指挥。

1930年1月，桂军与张发奎第四军联合进袭广州，但被击败退回广西。1930年4月阎、冯联合反对国民政府，李、白和张发奎会商决定支持阎、冯进袭湖南攻占武汉。黄绍竑未参加此次会议，但同意此项决定。当其部队到长沙时，粤军蒋光鼐、蔡廷锴部已占衡阳，切断了黄绍竑的后卫部队与其它桂军的联系。李、张向黄绍竑求援，但他的部队也在洪桥失败，桂军残部退回广西重整。

当此时刻，黄绍竑脱离了桂系，因为他反对再进行内战。黄绍竑并未辞职。1930年冬，离开了广西。他到南京见了蒋介石，蒋请他负责广西的编遣委员会，黄绍竑拒未接受而去香港；以后又去菲律宾旅行。

1932年5月，黄绍竑在南京任内政部长，几个月后，又继陈铭枢任交通部长。1933年2月，日军侵占热河，蒋介石任黄绍竑为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委员长何应钦的参谋长。他陪同何应钦、宋子文北上与日方谈判。1933年5月塘沽协定签订后，德王与云王率领下的内蒙古蒙族提出更多的自治要求。10月底派黄绍竑去绥远，他在归绥和付作义商谈，然后又到百灵庙。经过二十余日的谈判，他与蒙族达成协议后回到南京。

1934年1月，他向南京建议出兵平定新疆。他得到拨款并奉密令计划出征。

4月中，他飞到兰州和甘肃宣慰使朱绍良会商，不久他得到南京电令取消此次远征，并召他回南京。

他在兰州得了脚气病，遂去庐山休养。1934年10月蒋介石请他任浙江省主席，12月受命就职。1935年选为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7月，蒋召他上庐山，他在途中得悉国民政府将李宗仁和白崇禧调离广西省任职，并任他为军事整编专员。黄绍竑在庐山拒任此职，并将此事电告李、白。以后，他去了上海。自从广东事变失败后，蒋介石准备以武力征服桂系军阀。他召黄绍竑到广州劝说他指挥讨伐军。黄绍竑认为问题可以协商解决，并请求给他以这样的机会。在程潜的帮助下，他和他的旧友谈判取得了协议基础。黄与程潜陪同李宗仁到广州与蒋介石会见。李和蒋之间的分歧消除，广西承认国民政府的权力。于是黄回浙江。

1936年11月湖北省主席杨永泰被刺，黄于1937年1月继任。中日战争爆发后，1937年8月黄绍竑去南京，在军事委员会第一部主持作战计划。不久又在阎锡山之下任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负责娘子关地区军事指挥阻击日军由东面进入山西。日军迫使黄绍竑部及驻守忻口部队撤走而后攻占太原。黄绍竑回南京。

1937年12月，黄绍竑再度任浙江省主席，12月中南京失守，黄绍竑将省会撤离杭州，日军虽占领一些城市和大城镇，浙江省政府曾多次迁移，但在整个战争期间始终还能保持完整。1943年黄绍竑任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

黄绍竑任浙江省主席一直到1947年，以后任监察院副院长及战略顾问委员。1948年选入立法院。1949年3月李宗仁任代总统后，黄绍竑任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委员。同年春，李宗仁派出和谈代表去北京。黄绍竑得悉和谈失败乃去香港，他公开呼吁国民党人士支持中国共产党并斥责蒋介石，1949年8月被国民党正式宣布开除。

1949年9月黄绍竑在北京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以后又在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任职。1954年以广西省代表出席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被选为常委。1956年任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委员。11月，以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去苏联及东欧各国，1957年1月回国。在百花齐放运动时，黄绍竑批评人民代表大会只不过是中国共产党的橡皮图章。1958年1月，黄绍竑被划为右派。撤消其

职务。1959年4月黄又被选入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1960年11月摘去右派帽子。

黄少谷

黄少谷(1901.7.24—)，新闻工作者，政客。1928年任冯玉祥军部秘书长，1930年代表冯玉祥出席所谓扩大会议。他在张治中手下任湖南专区行政专员，军委政治部第三厅长。1943年——1948年主持出版《扫荡报》。他在台湾曾任行政院副院长、外交部长、驻西班牙大使。

黄少谷出生在湖南省北部洞庭湖畔的南县。他父虽然家境不裕，但竭尽全力使黄少谷受到良好教育。1919年，黄少谷进长沙明德学校，那年正值“五四”运动，不久湖南开始发生学潮。湖南学生搞驱逐军阀张敬尧运动，黄少谷是领导人物。

1922年底，黄少谷受完了中等教育后，拟投考北京师范大学，因该校有公费。他在1923年被录取。但政府拨给的教育经费时断时续，不得不在课外另找工作。1925年夏，他在有名的《世界日报》晚刊《世界晚报》谋得一职，不久就担任了该报主编。

1925年初，孙中山的逝世，大大推动了国民党在华北的发展，黄少谷即是参加此革命政党的热心青年之一。当时在北京掌权的张作霖，因为国民党和共产党合作北伐，所以下令对两党党员一律逮捕，黄少谷被迫逃出北京。他由共产党领导人李大钊的介绍去西安参加冯玉祥的军队。

冯玉祥宣布支持北伐，1927年5月，任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总司令。黄少谷在冯玉祥军部秘书长何其巩手下当秘书。这名二十六岁的青年给冯玉祥印象极深。即任他为陕、甘、豫三省宣传处长和三省农民训练所所长。何其巩辞秘书长职，冯玉祥选中黄少谷继任。

1928年北伐胜利结束，冯玉祥任国民政府军政部长。当时，黄少谷在上海闲居。冯玉祥和桂系联合反对蒋介石，1929年冯玉祥离南京北上，黄少谷成为冯玉祥在沪宁地区的代表，1930年阎锡山和冯玉祥组成阎冯联盟或称为扩大会

议运动，其中包括桂系，汪精卫改组派及西山会议派。1930年5月双方开战，但国民党第二届中央委员会的扩大会议直到7月初方召开。在全部重要讨论中，均由黄少谷代表冯玉祥参加。此次运动不久即失败，主要因为张学良支持了国民政府。

阎冯联盟失败后，黄少谷再次从政治舞台上退出。1932年初，他决定出国深造。实业部长陈公博给他以考查实业专使的名义让他出国，黄少谷未接受，反而接受了铁道部长顾孟馥的奖学金出国。1934年夏，黄少谷去英国，在伦敦大学经济政治学院听课。

1937年夏，中日战争爆发，黄少谷由英回国，湖南省主席张治中委任他为湖南第八专区行政督察专员兼郴县县长。那年粮食欠收，一些迷信的士绅责怪黄少谷，说他名“少谷”意思是“缺少粮食”，因此带来恶运，黄少谷立即辞职。

1938年夏，黄少谷去重庆，会见监察院长于右任，在黄第一次于1927年去西安在冯玉祥手下工作时，于右任对他就很器重，于是请黄少谷在监察院任职。1939年，黄同时任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厅参事。

1940年10月，张治中继陈诚为军委政治部部长。黄少谷应张治中之邀，辞去监察院及最高国防委员会之职而任政治部设计委员会主任委员。1941年任政治部第三厅厅长，负责军队中的文化宣传活动，这个职务的前任是郭沫若，可以看出这个职位的重要。1943年，黄少谷主持出版《扫荡报》，这是一份国民党军队的报纸。黄少谷负责此报一直到1948年，不断与中国共产党的《新华日报》进行意识形态上和政治上的斗争。1945年战争结束后，此报总部由重庆迁到南京，不久又建立了一个巨大的发行网，分别在南京、上海、汉口、重庆、兰州、广州发行。

1949年施行新宪法，普选政府人员，黄少谷以湖南代表被选为立法委员。1948年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他在1945年当选为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正式委员了。

1949年1月，蒋介石辞总统之职，李宗仁代理总统，何应钦任行政院长，黄少谷任行政院秘书长。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和谈失败，中国共产党开始对南京发

动全面进攻。4月22日，黄少谷陪同李宗仁、何应钦去杭州与蒋介石会商。他们从杭州回南京是国民党决定放弃南京的一种信号。4月23日晨，李、何和黄少谷飞往国民政府的新址广州。5月30日，何应钦辞去行政院长，由阎锡山接任，黄少谷任政务委员。

1949年蒋介石在台北成立国民党总裁办公室，以黄少谷为秘书主任。在此之前，他曾于1949年7月随从蒋介石去菲律宾碧瑶会见菲总统奎利诺，又于8月去南朝鲜镇海会见总统李承晚。1950年3月，蒋介石在台湾再任总统，任陈诚为行政院长，黄少谷为行政院政务委员兼秘书长。1954年俞鸿钧任行政院长，黄少谷任副院长。1958年7月，俞鸿钧辞职，陈诚再任行政院长，黄少谷任外交部长，他以国民政府特使参加阿根廷总统弗伦迪兹，教皇若望二十三世加冕和墨西哥总统马特俄罗斯就职典礼。

黄少谷在台湾国民党中极为活跃。1952年1957年，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并任中央党部宣传工作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

黄少谷任外交部长之职到1960年，以后任驻西班牙大使。1962年6月由周书楷继任。

黄炎培

字：任之

黄炎培（1878.9.6—1965.12.21），以早期的职业教育提倡者而闻名，创办中华职业教育社及工业职业学校。四十年代他在鼓吹中国成立立宪政府的反对国民党政党中很活跃。1945年他帮助创建民主建国会，并任主席。1949年后，在中央人民政府任轻工业部长到1954年。

黄炎培出生于上海附近的川沙，幼年父母双亡，由亲属抚养成长。他受的传统教育，1902年应科举试，荣获举人。以后去上海进南洋公学，并在浦东中学教书维持生活。在浦东中学时，有一名学生范文澜，后来成为共产党的名史学家。

1903年，黄炎培回川沙，创办小学，并帮助成立学会提倡群众教育。这个

学会的活动使黄炎培受到极大的危险。由于一个亲戚的告发，他以违反禁令宣传革命思想而被清政府逮捕判处死刑。后来由传教士贝克的干预而未被处决。获释后，黄炎培即去日本，那里是当时不少与清政府作斗争的中国人的避难所。

黄炎培在日本专心研究教育，并对职业教育方面发生兴趣，他也参加当时活跃的中国留日学生的政治活动，成为立宪政府的拥护者。回国后，任江苏省督学，并在江苏省议会工作。他又是宪友会江苏分会会长。宪友会是为清政府允许的社团，主张采取君主立宪的温和改良方法，他与被禁止的同盟会的革命主张大有差别。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后，江苏省宣布独立。不久，黄炎培任江苏省教育司长达三年之久，他把江苏省的学校按现代教育加以改革，并亲自制订学校的新规章制度和各级学校的课程。他的一份1911年10月到1913年7月的教育行政报告，概述了他的改革措施，这可能是民国成立后中国第一份教育报告，发表于1914年。

1914年，黄炎培辞去江苏省的职务，任上海《申报》记者，专门报道国内教育界状况。1914—15年连续发表了《教育考察日记》，概述了他对苏，皖，赣，浙，鲁，冀六省学校管理的印象。这份报告对此后制定全国教育政策的影响很大，黄炎培因此以教育专家知名。1915年黄炎培任为实业访美考察团秘书，访问了日本和美国。

1916年袁世凯死后，黄炎培写了一篇斥袁世凯为卖国贼的文章而更为人所注意。1916年任江苏省议会议员，江苏教育会副会长。但他对省政的兴趣已消失，辞去各职到日本精心研究职业教育，开始认为职业教育是中国教育的迫切需要。他和东京高等工业学校校长，职业教育的开路人千岛精一会谈。他在日本研究考察此项设施数月后回国。1917年，他特别就海关现状和管理写出一篇中国对外贸易情况名为《中国商战失败史》的重要文章。1918年，他创办了“中华职业教育社”，自任临时干事，又创办了中华职业学校。

黄炎培由于希望专心致力于推进职业教育，因此拒绝江苏教育厅长之任命，江苏省长聘他为教育顾问也未应。1921年，1922年，黄请求梁士诒、顾惠庆内阁撤

消了要他担任教育总长之任命,1923年,他获得上海圣约翰大学名誉博士学位,担任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董事,又兼任《申报》设计部长,并合编《申报》五十周年纪念刊《最近之五十年》,当时有史量才,孙中山,梁启超,蔡元培,胡适和黄炎培等知名人士为该刊写了回忆录。

二十年代末和三十年代初,黄炎培继续发展中华职业教育社和中华职业学校。1930年他出版了《中华教育史要》。不久,他重又参加政治活动。先后任《中华职业教育社月刊》和《生活周刊》的编辑邹韬奋,对黄炎培很有影响,使他成为教育界中反国民党阵营中的一员。三十年代初,他在陶行知担任主任干事的中华教育改进社中很活跃。邹韬奋和陶行知在所谓的人民阵线中都很活跃。黄炎培由于和他们的交往,也由于他本人和共同的兴趣,使他也投身到这一个团体中。

1937年,黄炎培任国防议会成员,1938年7月,抗战一周年后,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1939年2月任两湖地区统一游击活动专员,又任国防最高委员会委员。

1940年,黄炎培被派去马尼拉主持推销战时公债。1941年他回重庆后,参予组织中国民主政团同盟,职业教育社为其成员,黄炎培任该盟副主席。1943年他任战时公债全国推销委员会主席。黄炎培在重庆的几年中,继续关心职业教育的各种具体问题,并在重庆,昆明,桂林创办学校,工商技术学校是其中之一。

1944年,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改组为中国民主同盟,接受个人委员。改组后,黄炎培任其中的工商业活动委员会主席,这一任命标志着黄成为代表工商业重大利益的领导人。他还担任国民参政会经济建设委员会委员。1944年,黄炎培在重庆创办《宪政月刊》,其目的—是在战后推进民主宪政,二是消除国共的内战。他发表了《中国复兴十讲》,展望在一个普选的立宪政府下中国可能出现的民主繁荣的前途。可能由于他的这些观点,使他成为1945年7月去延安劝请共产党参加政治协商会议的国民参政会一名代表。他的《延安归来》叙述了此行的经过。

战争结束后,国民政府和共产党之间的关系更为紧张。黄炎培积极奔走以

求国内政治困境的和平解决。1945年8月，他会合民主同盟的工商委员会中的同人和代表各个知识界的朋友及伙伴，组织了民主建国会，自任主席。民主建国会的政治纲领是保障人权，大企业国营，小企业合作化，改革税收制度，提高农业，实行福利措施。1946年，民主建国会总部迁到上海，出版《展望周刊》，有一些西方观察家认为它事实上是一份共产党的宣传刊物，民主建国会和中国共产党在不少问题上意见是一致的。《展望周刊》大声疾呼要求美军撤出中国。1946年1月，黄炎培以中华职业教育社代表出席政治协商会议。1947年民主同盟被禁止后，黄炎培消声匿迹的住在上海，一直到1949年2月去华北，3月到北平，当时北平已在共产党控制之中。三个月后，黄炎培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常委，全国教育工作者会议筹备委员会常委。

1949年9月，黄炎培以民主建国会代表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被选为全国委员。中央人民政府正式成立后，黄炎培在政府委员会，政务院，财经委员会任职。1949年至1954年任轻工业部部长。政务院改组为国务院后，贾拓夫代黄炎培为轻工业部部长。黄炎培又参予组成中苏友好协会，任副会长。

在新政府下，中华职业教育社继续发展。黄炎培进行全国职业训练的意见受到官方的鼓励。1951年，当中华职业教育社在成立三十四周年时，黄炎培号召其同人和校友在中等学校推广职业技术教育。1953年10月，黄炎培代表民主建国会，在全国工商业联合会会员代表大会上发表演说，他又以轻工业部长的地位就，发展轻工业的政府规划和为了圆满达到此目的对国家资本主义的需要作了发言。1954年，黄炎培任全国教育工作者会议副主席，文字改革委员会委员。他又以江苏代表出席了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任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1958年以江苏省代表参加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任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那时，年已八十的黄炎培已是老政治家了，但自1954年以来并无实权。1965年12月21日在北京去世。

黄炎培结婚两次。第一次结婚生有二男二女。两位女儿曾在清华大学就学，其中一人去美国留学。黄炎培的儿子黄方纲（译音）美国留学，后在武汉大学当教授，抗战期间死在四川。他的兄弟黄竞武，是上海的一位银行家，因与民主同盟有联系，在上海撤退时被国民政府的特务杀害。黄炎培与姚维钧于1942

年结婚，生有两个女儿。

洪 深

字：伯骏

号：浅哉

洪深（1894年—1955.8.29），剧作家，导演，剧译家。他在舞台上运用了西方技术，在中国的有声电影的发展中起重要作用。1949年后在北京文化部门任要职，任戏剧工作者协会副主席。

洪深原籍江苏武进，出生于一个士绅家庭。他父亲赞助袁世凯，1915年袁世凯称帝制活动的筹安会中充当一个小角色。洪深于1916年毕业于清华学堂后，1919年去美国俄亥俄大学研究陶瓷学，后又去哈佛大学，1922年毕业获硕士学位。

洪深回国后，在上海大夏大学、暨南大学、复旦大学教戏剧和西洋文学。1923年秋，由欧阳予倩推荐，被邀请加入了1922年冬在上海成立的戏剧协社，成为主要负责人。上海戏剧协社演出欧阳予倩的《泼妇》和胡适的《终身大事》，这次演出一反舞台传统惯例，男女演员同台演出。洪深又领导复旦剧社，在演出他1922年冬所写的《赵阎王》中自演赵阎王。该剧主角是一名士兵，在军阀混战中的牺牲品。接着1924年演出他的译作王尔德的《少奶奶的扇子》和巴里的《第二梦》也很成功。洪深不久对田汉及其“南国社”发生兴趣。1928年加入“南国社”，在田汉的“名优之死”一剧中扮演主角，受到的毁誉不一。

这一时期中，洪深在政治上逐渐倾向于同情左派。他于1933年写的《五奎桥》和《香稻米》，刻画了中国社会地主和农民的冲突而对农民表同情。1930年公共租界大光明戏院的事件中，洪深是主要人物。那时放映美国影片《不怕死》中把中国人描绘成为坏蛋，洪深站起来提出了强烈抗议，这一举动是需要有相当勇气的。

1930年，洪深进明星公司，摄制了中国第一部有声电影，这就是以胡蝶为

主角的《歌女红牡丹》，1931年在上海和北京放映。1932年，该公司派洪深去好莱坞学习电影技术和方法。当他回国时，抗日电影的禁令已取消，充满激情和民族意识的国产电影开始出现，洪深的一部抗日电影《劫后桃花》取得很大成功。

洪深是由左翼作家联盟所产生的左翼戏剧家联盟的领导人物。他在“国防戏剧”口号的号召下出版了名为《走私》的戏剧集，其中包括《咸鱼主义》，《多年的媳妇》，《走私》等剧本。

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后，洪深率领巡回戏剧团在内地演出爱国戏剧。1939年国民政府设立政治部第三厅，洪深负责该厅戏剧科。洪深曾在中山大学、江苏戏剧学院，璧山社会教育学院和迁到川北的复旦大学教书。战争结束后，他随复旦大学回上海，任上海戏剧实验学校电影系主任。后来离上海去厦门大学教书，1948年去香港。

洪深于1949年到北京。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后，他在文化部门中起重要作用，任文化部对外文化联络局局长、中国剧协副主席。他在全国戏剧运动中很活跃。1955年8月29日在北京去世。

洪深的作品构思周密，笔法严谨，他是条理清晰，不是凭一时的热情灵感而写作的作家。他在美国所受的训练对他后来的作品影响很深。他在他的作品中善于处理多种人物，他在舞台上善于使用方言的试验，特别是四川话，非常成功。他发表了不少有关电影和戏剧技巧的著作和剧评。他曾一度编辑过《大公报》的戏剧电影周刊。

洪深和前中国银行行长陶兰泉的女儿结婚，后来离婚了。

任 鸿 雋

字：叔永

任鸿雋（1886.12.20—1961.11.9），教育行政家，国内提倡现代科学知识的创始者，三次任社长（1914—1923年、1934—1936年、1947—1950年），两次任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董事（1929—1934年，1942—1948年），1935—

1937年，任四川大学校长；1939—1942年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1949年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后，任文教委员会委员。他的妻子是陈衡哲。

任鸿雋祖籍浙江吴兴，他本人出生于四川巴县的一个士绅家庭，他在巴县进了那里的第一所新式公立学校，他在那里除受旧学教育外，也受了一些初步的西方教育。1904年他进了重庆府立中学堂，开始学习世界历史和世界地理。他又读了一些严复的译书，获得了一些虽系片断的，但是生动的西方思想。他的英语老师杨沧白介绍他读了一些当代的革命宣传品。他和他那一代的学生一样，贪婪地阅读为当局所禁止的梁启超等人鼓吹君主立宪在东京出版的《新民丛报》。任鸿雋一面追求了解当时的各种思潮，一面准备巴县的县考，并于1904年考中秀才。

1906年任鸿雋中学毕业后在重庆教书，1908年他去日本东京高等工业学校深造，不久就加入了同盟会任四川分会会长。他在日本时，常在孙中山的朋友宫崎寅藏的家和其他同盟会会员聚会。

1911年革命爆发，任鸿雋回国在南京临时政府总统府任秘书。可能是在那时他见到了孙中山。他对孙很为钦佩。孙中山任总统后对全国发表的文稿即系任鸿雋起草。1912年临时政府解散，任鸿雋在唐绍仪内阁中任档案秘书直到1912年7月唐绍仪因与袁世凯意见不合而辞职。任在天津办了反对袁世凯的《民意报》，不久去美国留学。

1912—1916年，任鸿雋在美国康奈尔大学当学生，1917年在哥伦比亚大学当研究生，先后获得化学学士和硕士学位。他参加了学生的活动，在《中国学生季刊》上写文章，与胡适以白话为文学表达工具的主张热烈争辩。在此期间，他向陈衡哲求婚。他们于1920年在北京结婚。

1914年，任鸿雋和康奈尔大学的一些中国留学生组织了一个中国科学社。该社宣称以在中国传播科学知识，鼓励社员进行科学研究并推进全国的工业发展为目的。为达到这些目的，该社第一步在1915年创刊了《科学》杂志。该杂志多年来在上海印刷而先后在美国伊萨卡和坎布里奇编辑。这份杂志一直出版到1950年。该社主持人先后回国后，该社也迁到国内，总社设在南京，上海、北京、广州均有分社。

任鸿雋先后三次主持中国科学社社务（1914—1923年，1934—1936年，1947—1950年），自从中国科学社成立以来，他一直是该社理事。中国科学社出版了不少科学专著和译述，支持南京的生物研究所和上海的科学图书馆，还在各城市中举办讲演和展览。1927年中央研究院成立之前，中国科学社可能是中国科学界最有影响的科学团体。因此，任鸿雋和科学社的同仁如丁文江、竺可桢、杨铨、翁文灏可称为近代中国科学发展的创始人。任鸿雋是在美国成立的中国工程学会的最早的会员。

1919年，任鸿雋回国两年后，四川省当局请他去筹划建立钢铁厂，他为此于1919—1920年去美国购置机器。1920年他在北京大学讲授化学。1920年—1922年任教育部专门教育司司长，1922年任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辑，1923—1925年任南京国立东南大学副校长。科学社的不少创办人都在东南大学教书，任鸿雋任副校长，更加强了这两个学术机关的联系。

1925年7月16日，美国政府宣布交付退还庚子赔款，该款由美国总统决定用于中国的文化教育事业，由十名中国人和五名美国人组成理事会决定受款的单位。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负责领取管理该项基金，任鸿雋是该基金会的第一批人选之一。1924—1935年，任鸿雋在任理事期间，用极大精力来实现该基金用以发展中国的科学研究和教育的目的。有人指摘基金会基金由少数人掌握而不是由当局掌管，1932年任鸿雋对此的答复是，基金会的成立就是为了防止政府官吏挪用此款于内战。

任鸿雋还在国外宣传中国科学上的成就。他以中国代表身份出席1927年于东京召开的第三届泛太平洋科学大会，该会承认科学社为代表中国科学界的机构。1931年，他在陈衡哲主编的《中国文化论文集》中撰写了有关科学的一章。

任鸿雋虽是同盟会会员，但从未加入其后身的国民党。他和当时国内的进步人士一样，对北伐抱有热情，北伐使国民党取得了政权，也被认为是消灭军阀和促使全国现代化的第一步。但他也尖锐批评国民党政府的所作所为。他是三十年代中颇为流行的一份自由主义刊物《独立评论》的编者之一。他写了一篇文章反对一些人提倡政党严格控制和对学生灌输政治教育的“党化教育”。

他认为这种观念恰恰违反了教育要发展个人对知识的追求的目的，而且这对政党本身也是危险的，因为这样做就使政党失去在公开论坛上与其他思想体系竞争的机会。没有这种竞争，政党就会在思想上僵化。

1935年任在成都就任四川大学校长。多次内战和省内军阀暴政的结果，四川成为一个很落后的省分。任鸿雋以坦率而坚定的态度对待因这次任命而带来的挑战。当地报纸诽谤他的夫人，更增加了他对成都的不满。他愤怒的说，要想了解文化落后到何等程度，每人至少应来成都一次，并且至少住上一年。他认为四川学术研究发展的道路上至少有两大阻碍：大学只不过是另一个政府衙门，以及对任何的批评都抱有心理上的抗拒。任鸿雋不顾这些阻碍，还是聘请了不少很有资望的学者到四川大学来，并加强了理学院和农学院的研究设备。农学院教工对战时西南的粮食生产的大幅度提高作出了贡献。1937年，任鸿雋离开四川大学，任编辑委员会主任委员，这是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有一个旁枝机构。

抗战的爆发迫使国民党政府谋求扩大政治上的支持力量，1937年任鸿雋被蒋介石召往庐山开会。翌年，成立国民参政会，由各界人士和各小党派代表组成的咨询机构，任鸿雋以学术界代表参加。

1939年，任鸿雋任中央研究院秘书长、化学研究所所长。化学研究所在昆明，任鸿雋在科学家们为通货膨胀所苦，难以维持生活的时候，去昆明主持这一虽不显眼但保持了科学实验精神的生气勃勃的工作。1942年，任鸿雋辞去中央研究院职务，任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干事长。当时该会基金十分短缺，因为1939年庚款业已停付，基金会缺少经费，依靠银行贷款维持活动。1942年1月，重庆成立了一个紧急委员会，翁文灏为主席，周诒春为名誉秘书，杨约瑟和任鸿雋为助理司库。执行委员会由孙科、蒋梦麟、杨约瑟等人组成。经这些人的努力，基金会得以继续进行提供教授、研究员的研究费用，辅助科学、教育机构、并维持全国地理测量局土壤研究工作。1945年战争结束后，基金会迁到上海。

1946—1947年，任鸿雋在美国，回国后住在上海，一直到共产党军队攻克上海。1949年9月21日，他以特邀代表身份参加北京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

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致力于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的工作，任该会常委。科学社不再存在，为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所代替。1950—1954年，任鸿雋任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委员。1954年后，任鸿雋除了担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委员外，在政府机构中未任其他职务，而仍为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工作，一直到1961年11月9日去世。

任鸿雋和陈衡哲有子女三人，长女以都；子以安（译音），居住在美国；次女以苏（译音），郑书明（译音）夫人，留在国内。任鸿雋兄弟三人，姊妹三人。长兄任鸿熙（译音）曾在两个县任过知县；次兄任鸿泽（译音）是一名商人，幼弟任鸿年1912年曾在成都办过一份革命报纸，是任鸿雋所钟爱的，他于1913年因抗议宋教仁被刺而自杀。

任鸿雋是一名有天赋的书法家和诗人。他的诗大都是旧体诗，均未发表。他的嗜好是收集邮票，摄影。他是一个中国艺术品的鉴赏家，1932—1937年曾任北平故宫博物院顾问。

甘 乃 光

字：自明

甘乃光（1897—1956.9），廖仲恺的亲信，汪精卫的早期追随者。在国民政府中任国防最高委员会副秘书长（1942—1944年），外交部次长（1945—1947年），行政院秘书长（1947年），驻澳大利亚大使（1948—1949年）。

甘乃光的家世和幼年情况不详，只知道他原籍广西岑溪。他进广州岭南大学学政治学及经济学，热心学生的政治活动。毕业后留在岭南大学。

广州是当时国民党活动的主要基地，甘乃光在1924年国民党改组时加入国民党。他的精力和才能引起廖仲恺的重视，那时廖仲恺是国民党最高层的领导人物，他任甘乃光为秘书，并对甘大加提拔。1925年甘乃光在黄埔军官学校任英文秘书，并主办两份很有影响的报纸《国民新闻》和《民国日报》。1925年8月廖仲恺被刺后，甘乃光和汪精卫、陈公博在国民党内成为一伙。1926年1月，以汪精卫派居优势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中，甘乃光被选为中央执行委

员，国民党秘书处的三位秘书之一，又是国民党青年部部长。1926年5月，汪精卫离广州，甘乃光解除青年部长之职，继共产党人林伯渠任农民部长。

1927年宁汉分裂后，甘乃光在南京蒋介石这一派工作。8月，汪精卫在武汉清除共产党时，他又支持汪精卫了。他代表武汉出席于9月在上海召开的重新统一国民党的会议，该会未得结果。10月底，随同汪精卫到广州。10月，张发奎率部从武汉回广东驱逐李济深，不久，甘乃光任广州市长。他在市长任内，中国共产党于1927年12月发动了广州公社的起义。李济深在广州重行掌权后，南京国民党当局于1927年12月解除了甘乃光的职务。南京方面斥责他容许和保护“共产党广州的叛乱”，和挪用市政公款。1928—1929年，甘乃光成了一名政治流亡者去美国，在芝加哥大学研究政治科学。他回国时又到英国及西欧其他国家考察政府行政程序。

1929年3月，国民党召开第三届全国代表大会，再次对党内左派势力采取强烈行动。甘乃光、陈公博被“永远”开除出国民党，汪精卫以勾结桂系李宗仁、白崇禧进行“反南京”活动受到书面警告。此后，甘乃光虽与汪精卫、陈公博仍维持友好关系，但逐渐脱离了与他们的政治联系而致力于中国行政管理技术方面的工作。

1931年日本侵略东北，迫使国民党内的各派重新调整。甘乃光恢复国民党党籍，在国民党第四届全国代表大会中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从1932年开始在内政部任要职，1934—1935年，在黄绍竑之下任内政部次长，南京行政院行政技术委员会常务委员。

中日战争开始后，甘乃光随国民政府西迁重庆。1938—1942年先后在朱家骅、叶楚傖、吴铁城手下任国民党中央党部副秘书长。1942—1945年在玉宠惠手下任国防最高委员会副秘书长。这些职务都是行政性质的工作。他在重庆的重大政治性决定上并无什么发言权。

日本投降后，甘乃光任外交部政务次长，他于1945年秋到1947年中一直担任该职。1947年张群任行政院长，甘乃光任秘书长。翌年，出任驻澳大利亚大使，1950年辞职。留居澳大利亚，直至1956年9月短期患病后死在悉尼。

甘乃光写了一些有关行政管理和提高行政效率及人事政策问题的著作，最

重要的著作是1947年出版的《中国行政新论》。其早期著作有1926年发表的《孙文主义之理论与实际》和1930年发表的《先秦经济思想史》。

康 成

西名：艾达

康成（1873—1930年），西名爱达，将现代医术及设备传到南昌的卓越医师，她自1903年在南昌工作直到1930年去世。她是一名虔诚的卫理会教徒，坚定的宗教教育和社会福利事业倡导者。

康成出生在江西九江一个经济拮据的家庭，她是第六个女儿，出生时父母很失望，因为他们希望有一个儿子。九江卫理会教士格特鲁德豪为了减轻她家的负担，收养这名女孩，她家中同意了。

几年后，康成在豪女士创办的九江菲什学校读书，石美瑜也进了这个学校，成了她的知己。康成九岁时随豪女士去美国，进旧金山为中国儿童设立的国内布道学校。她们在日本居住了一些时候，又转了一个学校，1884年回中国，在重庆住了两年。豪女士在那里成立了一个卫理会传教的中心。1886年，她们回到九江，康成才恢复她的正规教育。

1892年，豪女士带康成和石美瑜到美国，两人都决定学医，进了密执安大学医学院。1896年春毕业后，她们在芝加哥实习医疗技术与医院管理，是年秋天回国，在卫理圣公会国外布道会主持下行医传教。

不久，她们又到了九江。康成和石美瑜这两名医生获得了当地居民的信任，并劝说居民接受西医治疗。开始十个月间，她们在一间房的诊室里给两千多名病人治过病。1898年，一名和石美瑜友好的芝加哥医生丹福思提供经费建造了一所医院。但是1900年义和团运动时，这两名医生不得不放弃这所新建的医院到日本避难。1901年重回九江，这所以丹福思为名的医院才于12月9日正式开放。

1903年康成离九江去南昌筹建现代化的医院。1905年底，新诊疗所的建筑已完成，医院的地址也以奠定。医疗设备和服服务逐渐增加。到1907年底，有八

千多名病人接受了治疗。尽管这些工作占去了康成的精力，但她仍兼顾传教和社会改良事业，呼吁提高中国的教育，1905年，她在三年召开一次的第五届中华教育会大会上作了有关医学教育的讲演。

1908年，康成休假去美国，进了西北大学研究文学，她在两年内完成了三年的课程。1910年春，去柏林出席女青年会世界大会。会后，她去伦敦学习热带疾病六个月。她在伦敦用函授法完成了她在西北大学的课程，1911年1月，取得文学士学位。2月，她回到九江。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时，南昌已经有了一所四十张病床的新医院。在革命期间，该院一直收治一切需要治疗的病人。因为不少病人免费治疗，所以这所医院常常负债。康成接受了一个天津收入甚高的职位，以此来偿付债务。她在三年内还清了债，又回到南昌。她重回南昌工作时，江西省当局给该医院两笔赠款，表示对她的尊敬和对她给江西省所作的贡献的感谢。以后又定期给以补助，维持了医院的工作。

1926年，南昌医院给北伐战争的伤员很大帮助，但收进的却是不值一文的纸币。康成健康情况很坏，她出卖财物补助医院的开支。后来，她去上海，不久死在上海。

在她的一生事业中，康成在中国大力提倡宗教教育，社会福利规划和现代医学训练。为此目的，她经常在《大西洋月刊》、《亚洲》、《大陆报》上写文章。所有这些活动，都说明她对中国群众的体质、社会和精神方面的幸福的关怀。

康 有 为

原名：康祖诒

字：广厦

号：长素

康有为（1858.3.19—1927.3.31）推动1898年不幸失败的百日维新运动的首领，今文学派的杰出学者。

康有为是一位候补知县的长子，生在广州东南南海县的一个乡村。他的家族兴旺，十九世纪中叶在太平天国运动中为清廷效力而成为当地望族。他的伯祖康国器在左宗棠手下立军功而为广西布政司署理巡抚。他祖父是1846年的举人，曾在广东任教谕，并编撰1872年的《南海县志》，康有为不满十周岁时，父亲死去。

康有为随祖父，伯父习旧学，1876年考举人未中，就学于康家有交谊的广州名学者朱次琦。最初，康有为极勤奋好学。朱次琦注重宋儒理学教义和汉儒治学方法。但康有为自祖父死后，情绪上受到一次严重打击，一变而厌弃读书。他隐居于西樵山，用数月的时间苦思冥想，并研究道藏和佛经。

这时，康有为怀有作一个解救世间苦难的圣贤的壮志。为此他开始攻读政治、历史、地理等书，同时也潜心佛学。他偶然见到一些使他对西欧发生兴趣的著作。1879年他到香港，1882年又到过上海外国租界，他在上海买到江南制造局和教会出版的译书，开始研究西方文化。1884年末康有为开始写下一些他对世界大同的理想。

1884—1885年的中法战争后，康有为日益为中国无力应付西方列强而感不安。1888年，他在北京，对朝廷的愚昧无知和腐化堕落很为震惊。当即向光绪上书，指出外国侵略的危险，重臣大吏的无能和失职，要求西太后和光绪实行变法。尽管他的上书光绪未能见到，但他坦率直言却引起重臣中的保守派如李文田、徐桐的敌视，但也得到了一些京官如盛昱（满族）和沈曾植对他维新主张的支持。

由于北京的情况不利于维新改革，康有为经友人之劝，停止了政治活动而转为钻研金石碑版，写成了《广艺舟双楫》，对书法的流变发展了包世臣的理论。1890年初，他离北京后，结识了四川名儒廖平。廖是一位公羊学家。认为前汉通行的古文本不如今文本可信，他与康有为会见的几年前，已确证古文本系汉代学者刘歆所作，而今文本却说明了孔子是一个主张应世而改革制度的人物。1891年，康有为与廖平会见后的两年，出版了《新学伪经考》把古文本全系刘歆伪造，对公认已久的古文经学加以抨击，引起了全国学者的反对巨潮，《新学经伪考》于1894年为上谕所禁。但康有为并未因此沮丧，他在1897

年作《孔子改制考》，发展了孔子主张改革制度的想法。

这两本著作是由万木草堂的学生协助写成的，万木学堂这个学校是康有为应其青年崇拜者梁启超等人之请而设立的。康有为在万木草堂制订的课业，大都是他受业于朱次琦时所学的，但又增加了一些新学，如数学、音乐、军操及西学。不用说，康有为对学生灌输以他对儒家经典的理论，和他对改制的想法。他的不少学生成了他后来维新运动中的积极支持者。

1893年，康有为在广州讲学时中举人，1895年在北京中进士，授工部主事。当时与日本作战失败，清廷被迫签订马关条约，割让台湾。康有为获知条约的屈辱内容，上书光绪请拒绝此条约，迁都陕西，继续作战，并实行大规模改革。但这一份由数百名在京应试举人签名的“公车上书”，并未能阻止清廷批准条约。几个月后，康有为又两次上书，要求实行在行政、教育、经济、军事各方面的改革方案。有一次上书被光绪看到了，极为赞赏，但所请各事均未采用。1895年夏，他和梁启超在北京创办了一份《中外纪闻》，又和其他好友组织《强学会》，不久得到一些重要官吏的支持。但是，康有为的这些活动也受到势力强大的保守分子的反，他慎重的听从友人的劝告离北京去广州。

在强学会和维新报刊1896年被封禁时，康有为的想法引起广泛响应。1896—1897年间，变法会在几个省内勃然兴起。1897年的胶州事件、俄佔旅大和列强租借领土的要求使国内人士都认为中国被瓜分在即。康有为利用这种危机四伏的气氛，又继续上书光绪请彻底改革朝政。1898年4月，他组织《保国会》，在成立大会上作演说，力陈国家之严重危机，呼吁改革使中国沦为列强宰割品的种种窳政陋规。

虽然保守势力对康有为的不断抨击吓跑了一些对变法的同情者，并失去了学者官吏对他的维新运动的广泛支持，但仍有少数大官，如光绪的老师翁同龢，向皇帝推荐康有为，光绪对变法极感兴趣。1898年6月16日，开始“百日维新”。的上谕颁发五天后，光绪召见康有为，这是仅有的一次见面，康却成为光绪的主要谋士。此后三个月中，康有为草拟了具体的变法方案。光绪受康有为这些意见和和著述的影响，下了废八股取士，京师设大学，各省设新式学堂，编国家预算，建海陆新军，彻底改革官制，裁汰冗官的诏书。

康有为依仗光绪的热情推行他的变法计划，但对许多官员的反对估计不足。各省的官吏不是对变法诏令不加理睬，就是推行不力；个人利益受新政不利影响的北京官吏则请求年老的慈禧太后为他们说情。慈禧虽已于1889年归政，但从未放弃她的野心。对变法的争执使她有机会重新掌政。当时，京师附近的军队都在慈禧亲信手中，康有为等人想争取袁世凯的军事支持，但袁既无意于此，也无能为力。9月21日，慈禧监禁光绪，尽废新政，并拘捕一些维新人物一周后，有六名维新人物处死，其中有谭嗣同和康有为的兄弟康广仁。康本人已于政变前一日离京。光绪已知慈禧的措施，先遣康有为去上海办维新运动的《时务报》。康有为逃到上海，由英国炮舰送往香港。

康有为自称在离京前奉有光绪密诏要他设法将皇帝从太后及其一党手中解救出来。他因此先到日本，后到英国争取援助光绪恢复自由并重掌政权而未能成功。以后他又去加拿大，组织华侨支持营救光绪的运动，1899年7月，他在英属哥伦比亚、维多利亚成立“保皇会”，一年之内，在美国、拉丁美洲、夏威夷、日本东南亚成立了一些分会。康有为1899年回香港，发动保皇会人士致电清廷反对慈禧废立光绪的计划。1900年义和团运动纷乱之际，康有为密谋和其他维新领袖起而推翻慈禧。密谋为总督张之洞所发觉，乃逮捕处决了准备武装起义的唐才常及其他一些在武汉的同党。

康有为退出政治活动，在槟榔屿过了几年半隐退的生活。后来他又到印度，在大吉岭住了一些时候。1900—1903年间，他写了《中庸注》、《春秋笔削大义微言考》、《大学注》、《孟子微》，完成了他十多年前开始对儒家经典的重新注释。这一时期他最重要的著作是《大同书》，此书体现了他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形成的马托邦理想。

1903年春，他由印度到香港。当时他认为光绪已无生命危险，国内气氛同情维新，他决定将“保皇会”改名“宪政会”，先后于1903年、1905年作《官制议》、《物质救国论》，主张中国实行像英国那样的君主立宪制。

康有为自1899年成立了保皇组织后，即与孙中山成为政治死敌。康有为推行君主立宪事业的努力不久即与在孙中山领导下1905年成立的革命团体同盟会发生冲突。起初，保皇派势力比较强大，但随着清政府威信的降低，双方在争

取华侨的竞争中，保皇派不断失势于革命派了。

康有为长期流亡生活的后期，大都来往于欧美之间，偶尔也到槟榔屿和香港。一方面出于他的保皇活动的需要，同时也给康有为了解西方文明的机会，1904年出版的《欧洲十一国游记》记述了他的印象，他由早先对西方文明的钦佩而觉察到它的缺点，改变为恢复对儒家传统的赞赏。

1911年革命爆发时，康有为在日本，他立即攻击共和制度，1911年底他写了《中华救国论》，《共和政体论》，认为只有君主立宪才能使中国免于长期混乱。民国成立后，康有为仍忠于已覆灭的王朝，提倡儒家学说为全国道德准则。他热烈支持1912年秋成立的“孔教会”，并于1912年秋为该会写了一篇成立宣言。但是他的主张非常不得人心。由于他的文章无处发表，于是与一些追随他的人创办了一个月刊《不忍杂志》，于1913年自春至秋出版了八期。这份杂志专门刊载康的作品，发表了许多康有为前未发表过的政论文章及《大同书》的连载部分，还有一些在1898年到1900年为慈禧太后禁毁的早期作品。

1913年底，康有为从日本到香港，12月，回广东原籍为父丧葬，这已是他离国十五年了。1914年夏，他安静的住在上海直到1915年底。这时，他和门生梁启超反对袁世凯称帝，这并不因为他反对帝制，而是认为袁世凯是清朝的逆臣，不配称九五之尊。1916年袁世凯死后，康有为对北京的民国政府愈来愈不满，又谋恢复清室。1917年春，他写信给安徽督军张勋，请他用兵力恢复宣统帝位。张勋是复辟的死硬派，盼望恢复清室。为此他欣然接受康有为及一些保皇派的支持。

张勋率前锋部队进北京几天后，康有为离上海于6月27日到北京。他被护送到张勋寓所秘密会商。三天后，1917年7月1日，宣布恢复宣统帝位。康有为起草一些复位及国事诏书，但新政权对之置于不顾。当他发现专横的张勋并不采用他君主立宪的主张，他对复辟的幻想完全破灭了。7月17日，短命的复辟告终后，民国政府下令逮捕保皇派首领。那时康有为已躲在北京美国大使馆中。五个月后，由使馆卫兵护送到上海。他在《不忍杂志》的最后一期上发表了他抨击民国政府的文章《共和议》那是他在美国使馆中所写的。1918年3月，北京政府对参予复辟活动的人物一律赦免。

尽管遭到1917年的失败，但他的政治信念迄未动摇。1923年春，他曾去见吴佩孚及其他军阀，希望争取他们支持恢复清朝均未得成功。同时，他谴责全盘西化，要求保存“国粹”，定孔教为国教，以卫护道德智力的免于堕落。但是，自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及随之而来的新文化革命，康有为的言论几乎已不为国内人士所闻了。

康有为晚年时又回头研究他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曾感兴趣的天命之学，1924年在上海办了一所“天游学院”，给少数学生讲学，讲稿在他死后出版，称为《诸天讲》，内容不过是一些科学知识和哲理深思和诗意幻想的大杂烩。1927年3月在上海过70岁生日，几个星期后死在青岛。他家族将他葬在附近山地，并有宣统颁赐荣典以表彰他对清室的忠诚。

康有为1898年的奏摺编为《戊戌奏稿》于1911年出版，他1899年以前的诗，由梁启超手书于1911年出版为《南海先生诗集》，以后又出版同一书名的诗集，包括1898年前后的诗，于1940年由长沙商务印书馆出版。

康有为的著作中，最重要的有三种。第一是《新学伪经考》，康有为宣称，古文儒家经籍可以确凿证明其为刘歆所精心伪造，为了使王莽那短命的新朝篡夺前汉合法化。康有为论述说：压制或篡改今文经籍，特别是春秋公羊传，刘歆欺蒙了约二千年来的学者，使之相信伪造的古文经籍就是孔子教导的宝库。

在《孔子改制考》一书中，他断定孔子不仅是传授古代圣王之说，且是今文经籍的作者，孔子之所以托言于先古圣贤，是为了使他的教导为人们普遍接受。康有为认为孔子之所以著经立说，是为了改制以适应社会需要。

康有为把孔子描绘为一个远见的改革家，他所根据的理论是今文经中的三世学说，由“乱世”，继“小康”而至“昇平”，政府亦是由专制到君主立宪而至“民治”。最后的“昇平”世，康有为比之为《礼记·礼运篇》中的“大同”，这就是他《大同书》的主要思想，是他早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就具有的思想，这著作一直到1902年才完成。十篇中的前二篇，在1913年的《不忍》杂志上刊载，全书在康有为死后八年于1935年才出版。康有为在《大同书》中，描绘了未来的大同世界。人类社会由成千上万的民主团体组成，各有同样数目的代表出席于世界议会。在一个团体中，财产公有，生活资料平均分配。而且

男女平等；婚姻自主、儿童的教育费用公共负担，因此家庭已无需要而消失。在这个乌托邦世界之中，不分种族、不分性别、不分职业，在政治、经济、社会方面完全平等。

康有为的理论性著作的主要目的，是在重树儒家的教理以迎击西方新思想的挑战。但是他对根深蒂固的传统所作的修改过于激进，以至动摇了他原来要保存的儒家准则。即使在康有为同时的更为进步的人们中间也引起了震惊和愤懑，最初的反应是可以想见的，梁启超把《新学伪经考》比之为飓风，《孔子改制考》比之为火山爆发，而《大同书》则比之为地震。不过，梁启超在1920年表示这些见解时，康有为在思想界已没有什么影响了，虽然钱玄同、顾颉刚等人，还是把康有为看作是重新评价中国传统和古代历史的前辈。康有为晚年时已被知识界领导人唾骂和嘲笑为一个不可救药的反动人物。但是颇为矛盾的是，随着共产党政权的建立，对康有为的思想又重加评价和赞扬。1915年前，毛泽东就钦佩康有为、梁启超的维新活动，后来又称他为向西方追求真理的早期进步人士之一，并且是一本论“世界大同”的作者。

高 峯

字：剑父

高峯，（1879.10.12—1951.6.22），画家。岭南画派的领导人。该画派综合了日本、西方和中国绘画技巧，并对现实主义的重视。

高剑父的出生地是广东番禺，兄弟六人，行四。父亲高保祥是一位医生而爱好绘画。高剑父的两个弟弟高奇峰、高振威（剑僧）高剑父五岁时以读中国典籍开始他的最初教育，几年后父母双亡，高剑父寄养在一位医生又是画家的叔叔家中。高剑父在他叔父的药店工作并开始学画。十二岁时，他从广东名画家居廉学习，高剑父住在居廉家中，但与居家有些人相处很不融洽。一年后，他去和在黄埔水师学堂当军医的叔父在一起，他也进了水师学堂，但因身体不好而退学。

1894年，高剑父回广州从居廉学习，结识了吴德义（译音），他也在居廉

那里学习，是一名富商又是书画收藏家。高剑父临摹吴德义收藏的宋元名画增加了绘画知识。1895年，高剑父由吴德义资助，从一所广州的教会学校——那是岭南大学的前身——里的法国画家学画。以后在一所小学当美术教师，同事中有日本画家山本信凯，他教高剑父学日文。

1898年，高剑父十九岁时去日本，学习日本画法，并参加了如“白马会”，“太平洋画会”、“水彩研究会”，他以卖画维持生活。1902年回国后在两广高等工业学堂教绘画。1904年，高剑父第二次去日本，进了东京美术学院，又加入了同盟会。1906年回国后，他在广州协助成立同盟会分会。他坚决支持反满革命，曾伪装出殡私运军火到广州。

1911年后，高剑父和高奇峰在上海办了一家美术出版社“审美书馆”，出版《真相画报》，这是国内首创的摄影杂志。在此期间，高剑父先后在东京、神户、汉城、上海、南京、香港、广州举办画展。1916年，在广州办了一所春睡画院。1921年在广州举办了第一次全省画展。八年后，又在南京主办了一次全国美术展览会。

1931年，高剑父到缅甸、印度、锡兰、波斯、埃及游历。他在喜马拉雅山遇到雪崩而一腿受伤并患雪盲。回国后，他写了几册有关这次国外游历的书：《佛国记》、《印度艺术》、《喜马拉雅山的研究》。三十年代中，他在国立中山大学教美术，并任广州市美术学院院长，同时仍负责春睡画院工作。1935年他请假去南京中央大学教书，并办了一个“亚风画会”。中日战争期间，他在华西游历，画了不少风景画和战时景象。

高剑父、高奇峰和他们的同伴及门人被称为岭南画派。在高剑父主持的春水绘画学校的学生有黎雄才（译音），方人定、关山月（1910—）、游云山等人。高剑父对贫苦学生免收学费，甚至可供应食宿另用。岭南画派将中国画的传统构图和画法与日本画和西方画的技巧结合起来。他于1935年在南京作的一次演讲《我的现代国画观》（1955年出版）中说国画已受到外国影响，现代的中国画家应把国画的技巧和气魄和明暗、透视、这些西方的概念结合起来。高剑父所说的新国画不仅对形式和技巧，而且对图画的主题和意图都要强调。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一些现代题材，如飞机、铁路、电线杆及时装人物也应该

可以入画。例如，他在1915年所画的一幅立轴，画上了飞机和坦克，画题上《天地两魔怪》，他认为这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评论体现了革命的精神。二十年代中，高剑父想提倡对宋元画和文人画的研究使中国美术重放光彩，创立新宋元派和新文人画派。中日战争期间，高剑父和他的学生，着重于现实主义，画出轰炸、逃难、城市废墟等战时景象。高剑父的作品，出版了的画集《蛙声集》和《剑父画集》。

在传统的中国画坛中，高剑父等岭南画派有三个显著特点：他们大都与广州的革命派有关系。他们几乎全部都曾在日本留学，他们几乎全部都是努力于综合中国的绘画传统和日本西方的绘画准则。岭南画派掌握了西方的透视、基调和对照等技巧。他们的画法是中国的，但其追求纯装饰效果和表面润泽光滑的特征看出是受了日本画的影响。岭南画家的最终目的是要在传统方法的范围内加入一些新的题材，他们的主要努力是要将中国传统和国际准则在智慧上精神上结合起来。他们的收获是下了很大功夫的。但是高剑父的方法还不能说已经解决了现代中国画家关于绘画的内容和形式问题。无论如何，高剑父作为一名画家和教师，在中国艺术上是起了相当作用的。1951年6月22日，高剑父死在澳门。遗有他的续配翁秀芝，儿子高励节，和女儿高立华。他的原配宋铭黄于1938年死在香港。

高 嶠

字：奇峰

高奇峰，（1889.7.3—1933.11.2），画家，岭南画派的一名主要画家，致力于融合中西绘画的优点。

高奇峰是一名医生又爱好绘画的高保祥的第五个儿子，生在广东番禺。他比高剑父年纪小十岁，他受了初步的旧式教育后去广州，在他哥哥的老师居廉门下学习。1906年十六岁时去日本学西洋美术，他在1911年回国前，加入了同盟会。

1911年后，高剑父、高奇峰创办了一所“审美画馆”，专门出版美术作

品。1918年，高奇峰到广州，在广东工业学校教绘画，并创办天风美术学院的前身美学馆。1925年初，他在岭南大学教中国美术。1926年奉命为广州孙中山纪念堂画了几幅大型绘画，其中有“孤鹰”、“白马”、“猛狮”，以象征新中国的革命精神。

1929年，高奇峰在珠江边成立了一个画室叫“天风楼”。他和他收养的女儿和一位得意学生张坤仪在那里过着宁静的教学生活。高奇峰患肺病后，就由这位学生照料。

高奇峰，高剑父都是岭南画派，另一名杰出代表人物是陈树人。岭南派的画家，综合了日本、西方和中国的绘画技巧，对现实主义有新的强调。高奇峰在岭南大学作的一次讲演中，叙述了他的经验和艺术信条。他叙述了他对中国画逐渐了解的过程。中国画诚然有不少优秀之处，但总是过于追求意境，不重形似。因此，他转而学习西洋画，特别着重肖像画，绘画比例、投影、透视等方面，他试图揉和西洋画的方法和中国的绘画、着墨和布局的技巧。他说：

“总之，我在力求保存中国画的优美之处的同时，也采用了世界画派所提供的最好的布局方法，这样，把中西画融合为一个和谐的整体当作我对美、自然，以及我的创作力和情趣的指导原则。我现在的绘画就是这样产生的。”高奇峰的学生的绘画也反映了他的这些信念。他的学生赵少昂（1904—）以绘昆虫花卉知名，张昆仪以画禽兽风景知名。

1933年，高奇峰到上海，准备启程去德国参加中德美术展览会。但是，他在11月2日病死在上海。由于他在绘画方面的成就及早期与革命运动的关系，为他进行了国葬。

高奇峰的著作出版的有《新画学美术史》、《奇峰画集》。1935年在南京出版的纪念集《高奇峰先生荣哀录》，编印了他的讲演、绘画和诗。高奇峰的绘画曾在日本，意大利、比利时，法国，美国举行过展览，在国内也举行过展览会。1944年，高奇峰和张昆仪的作品曾在纽约大都会美术馆举行联合展出。自1935年以来已出版了七册《奇峰画集》。

戈 公 振

原名：戈绍发

字：春霆

戈公振：（1890—1935.10.22），上海的《时报》和《申报》编辑，报学史专家。

戈公振的出生地是上海附近的一个小村庄东台，幼年时在他伯曾祖母办的家塾受学，十四岁时进了一所半新式的学校，1908年进东台高等学堂，1912年毕业后，在本地的《东台日报》馆当徒工。1913年考取南通师范学堂，因无力缴付费用而未入学，不久离家到上海。

1913年，戈公振进有正书局工作，该书局兼印古籍和新书，尤以印刷书画而知名。书局老闾狄楚青，又办了一份在上海颇有影响的报纸《时报》，戈公振博得狄楚青的信任，调到《时报》馆工作，他同时又进了神州法政学校，学习法律、历史、经济等课程。

戈公振在《时报》馆工作了十三年之久，由校对逐渐提升为主编，他对中国报界的近代化颇做出了一些贡献。他的主要革新是出版画刊（始于1920年）定期副刊，彩色印刷，又开创了专门性的广泛的体育报导。戈公振主编的《时报》是上海各报中最美国化的报纸，胡适称它是一份受到知识界学生界欢迎的报纸。

由于戈公振编辑《时报》的成就，他受到上海一些学校的聘请去讲授新闻学。因此，他写了一些有关实用新闻学报学史书籍。1920年在上海成立新闻记者联合会时，戈公振任第一届会长。1924年，戈公振节译了F.N.克拉克的《新闻手册》改名为《新闻学撮要》，于1925年出版，1929年再版。1925年，戈公振应聘在上海国民大学教新闻学。在这期间，他收集了有关中国报学史的材料，写成了《中国报学史》于1927年出版，该书虽有不确切的地方，却是在这一领域内的创举。1925年，戈公振帮助成立了“上海报学社”，推进对中国的新闻学的研究。

1927年，戈公振辞离《时报》馆，去国外作一次为期两年的游历并写报导。1月，他在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赞助下，自费去日本、欧、美作旅行报导并考察新闻业。他作为上海报业公会代表出席了1927年8月在日内瓦举行的国联新闻工作者会议。他以记者身份，又出席了国际劳工会议，海军裁军会议，国际交通运输会议，世界戏剧会议。他会见了如张伯伦、白里安、墨索里尼等重要政界人物。戈公振以一个出现在欧洲大城市的中国通讯记者而引人注目，他常常发回消息刊载在《时报》上，为国内读者对世界大事提供了新的见解。在此期间他继续收集有关中国报学史的材料，并在英、法等国的图书馆中搜集在中国出版的珍本外文报刊。

1929年冬，戈公振回国，应史量才之聘，与黄炎培同任《申报》馆设计部长。他就任后，又创办了一些新的业务，如《申报月刊》，一份画报，图书租借计划以及函授学校。像戈公振这样的新闻学教师各方很需要，1929—1932年间，他在南方大学，大夏大学，复旦大学教新闻学课程。他还写出一本《世界报业考察记》书稿。此稿不幸在1932年日军轰炸上海商务印书馆时被毁。1931年，他写成了《新闻学》，此书直到1940年才出版。

1931年9月18日日军进攻沈阳，戈公振积极参加抗日运动。1932年秋，他随同李顿调查团到满洲。在沈阳被日军当局短期扣留，获释后，随李顿调查团到日内瓦，出席并报道了讨论日本侵华的国联会议。他在报道中对国联的妥协方案表示失望，并告诫国人，倘不联合抗日，将有进一步被侵略蚕食的危险。会议后，戈公振去马德里，出席国际新闻专家会议。此后，又去意、德、法、奥、捷克、苏联访问，并发回他写的报道。

苏联，连同马克思及列宁的著作，成为戈公振研究1931—1932年期间重大事件的一件专心关注之事。1932年12月，中国与苏联恢复外交关系，戈公振于1933年到达苏联，一直到1935年秋才离开。这一期间内，戈公振各处游历，写了不少文章，满怀同情地详细报道了苏联在政治、文化、经济各方面的进展。这些文章后来由邹韬奋辑成《从东北到苏联》一书出版。1935年秋，他于10月12日回到上海后就生病了。10月22日因急性阑尾炎转为腹膜炎而死去。

戈公振的堂弟戈绍龙略有文名，是一位在上海开业的医生。他于1940年经

手出版了他哥哥的《新闻学》一书。

柯 劭 忞

字：凤孙

凤笙

号：蓼园

柯劭忞（1850—1933年），经史学家，以其《新元史》而闻名。

柯劭忞原籍山东胶县，他是历史学家柯衡的儿子，柯衡曾增补汉书七表而成《汉书七表校补》。柯劭忞的母亲是李长博的女儿李昌霞（译音），以诗闻名。柯劭忞幼年聪颖，为李慈铭所赏识，他在1872年10月5日的日记中曾记述了对柯劭忞早期作品的印象。据说柯劭忞除学习经史外还认真学过数学和中医。

柯劭忞的学术生活和仕途都很顺利，1870年中举人，1886年成进士，进翰林院。1901年至1906年任湖南、贵州学政，又在国子监及翰林院任职，以后又被派去日本考察教育，1909年回国在学部任职。他又授典礼院直学士，代理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学监。1911年12月，清室彻底覆灭之日，摄政王派柯劭忞及其他有声望地位的大吏十一人各去本省争取群众支持，作维持其摇摇欲坠的统治的最后努力。

作为忠于清廷的老臣，柯劭忞绝民国政府的一切任命，也不当国会议员，但同意参加编纂清史。1914年进了以赵尔巽为首的清史馆。他撰写了天文志，和历法志和灾异志及其他一些部分。1927年9月，赵尔巽死后，柯劭忞任馆长，《清史稿》于1928年出书，由柯主持其事。

由于日本学者对柯劭忞的评价很高，1925年5月，他以中国首席代表，参加中日东方文化事业总委员会。该会经费系日本退还的庚款。委员会开过多次会议，但未能取得一致意见，1929年12月，国民政府下令解散此委员会。

有清一代，不少著名学者从事元史的研究，但他们写出的是零星片段或资料不足的作品，又没有注意到汉文以外的材料。总之，他们的作品决不能代替

《元史》，尽管此书已列入正史的二十四史，但是明初草率修成的，错误百出，有些还是荒谬可笑的。柯劭忞用了约五十年的时间研究汉文、日文和欧洲方面的材料写了一部完全新的元朝历史，这就是1922年出版《新元史》，共二百五十七卷。这部著作在日本得到高度评价，由东京帝国大学的矢野渡推荐，授柯劭忞为名誉文学历史博士学位。在此以前不久，柯劭忞的同科进士、诗社诗友徐世昌于1919年12月由政府颁令将《新元史》定为正史，使二十四史增为二十五史，但当代国内学者对他的著作的评价并不那么好，例如陈垣曾表示过，认为柯劭忞与其写一部新历史，还不如对《元史》加以补注为妥。梁启超则认为柯劭忞对文件选用过于专断，取其观点相合者而拒用观点不合的材料又不加说明甚至根本不提其差异。对后一种批评，柯在1935年出版的《新元史考证》中作了部分答复。

柯劭忞对清代学者最少研究的《春秋穀梁传》也很注意，1917年出版了《春秋穀梁传注》1935年修订再版。

柯劭忞的诗于1924年出版《蓼园诗钞》，他的诗的风格，可以与吴伟业，王士珍媲美。

柯劭忞第一个妻子死后，又与吴汝纶的三女儿结婚，吴汝纶是一名有成就的学者，柯劭忞常和他诗词唱和。柯劭忞死于1933年，年八十三岁。

谷 正 伦

字：纪常

谷正伦（1890.9.23—1953.11.3），以“中国宪兵之父”而闻名。他在国民政府中曾任甘肃省主席（1941—1946），粮食部长（1947），贵州省主席（1948—1949）。

谷正伦原籍贵州安顺，是前清举人谷用迁的长子。谷正纲，谷正鼎是他的弟弟。1905年他在贵州陆军小学堂毕业后，进武昌陆军中学堂三年。1908年去日本，进振武学堂和士官学校炮兵科。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的消息传到日本，谷正伦即回国参加革命军。在黄兴

的汉阳指挥部任少校科员。1912年民国成立，在陆军部黄兴手下任职。临时政府迁往北京，黄兴任南京留守，谷正伦仍任科员，不久升为中校。1913二次革命失败，谷正伦随同黄兴到日本，回士官学校学习，1915年毕业于士官学校第十一期炮兵科，随后回国到贵州。1916年9月任黔军第一师炮兵团长，1920年8月升为第二混成旅旅长。

1920年广州和北京政府发生冲突，谷正伦投向广州，率黔军进入四川，不久撤回贵州。1921年5月，孙中山兴师讨伐广西陆荣廷，任谷正伦为黔军司令，在李烈钧和陈炯明所部的合作下，击败陆荣廷。孙中山在桂林设大本营亲自指挥北伐，谷任中央直辖黔军总司令。1922年春，谷军奉命进入湖南，但因陈炯明在广东叛变而受阻。谷军后方补给线切断，在湖南南部溃散。

1925年7月 谷正伦由士官学校同学贺耀祖的推荐，任湖军第一师顾问兼军官讲习所教育长。1926年7月，蒋介石从广州誓师北伐，那时，贺耀祖军被唐生智和李宗仁击败，决定投向国民革命军，任国民革命军独立第二师师长，谷正伦为副师长。1927年3月24日南京事件中，独立第二师扩建为第四十军，奉命维持南京的秩序。1928年2月17日谷任南京戒严司令，5月10日，他任首都卫戍副司令。当国民政府于1932年1月建立宪兵时，谷被任为宪兵司令及南京警备总司令。三十年代中，谷正伦将他的大部分精力用于组训宪兵，后来宪兵成为一个负责国内安全的主要力量。他建立了一个宪兵的训练中心，规划了宪兵的权限和职责的规章，在谷正伦的努力下，宪兵力量由1932年的两个团扩大到1935年的三十个团，因此，他得了“中国宪兵之父”的称号。

1935年11月，谷正伦、谷正纲，谷正鼎兄弟三人在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入选中央执行委员会。中日战争爆发后，1937年9月11日，谷正伦任军事委员会军法执行副监，11月，日军逼近南京，他和他的宪兵撤出南京。他在武昌、芷江执行任务，1939年2月28日任鄂湘川黔边区绥靖公署主任。剿平了这一地区作乱已久的土匪，因此于1940年12月授予他甘肃省主席的职务。

他在甘肃任职六年，竭力改进和提高县级以下行政机构的行政效率，特别是乡公所和镇公所，同时，他打击了腐败官吏，土匪和鸦片贩的勾结。谷正伦到甘肃任职时，正值湫惠渠竣工，该渠可灌溉土地三万亩。他为了使农民由此

项工程获益，以政府名义征收全部灌溉区土地，然后又以十五年为期由农民分付地价。这是国民党统治区内第一次实行了耕者有其田的计划。他又调整粮食运输系统减低运费充裕省库，并使甘肃成为战时中国粮价指数最平稳的地区。

谷正伦任内，甘肃的大学、中学生人数迅速增加，甘肃是中国最落后的省分之一，但据该省统计，1945年甘肃的大学生数目为1937年的三十倍，中学生为四倍，小学生则为一倍。

由于谷正伦的功绩，1947年5月任他为粮食部长、行政院政务委员，一年后，任他为贵州省主席。这时，他身体不好，国共内战加重了他的胃病。1949年11月共产党逼近贵阳时，他准备逃走飞往香港，但他不及把他的母亲和兄弟谷正楷一起带去。1953年11月3日，他死在台北。

谷 正 鼎

谷正鼎（1903.10.24—），汪精卫改组派成员，1937年起，任蒋介石西安行营政务厅长，管辖西北各省军政事务，负责与中国共产党的势力作斗争。1947年任国民党组织部副部长，1948年任部长，1947年任立法院委员，他在台湾将全部时间用于立法院的工作。

谷正鼎是谷用迁的第四个儿子，是谷正伦的弟弟。谷正鼎出生在贵州安顺，他与兄弟谷正纲一起在1927年以前进过各种学校。他们在村塾中受中国传统教育后，进了一所新式的高小，以后又进了贵阳市立初级师范学校。1919年五四运动时，谷正鼎参加了学生示威游行，以后成为贵州学生联合会会长。

1922年，兄弟两人离贵州去德国，在柏林大学学习政治经济，1924年加入国民党柏林支部，谷正鼎被选为执行委员。1925年五州事件的消息传到柏林，谷正鼎在德国不少城市作讲演，反对列强在中国盘踞。他们在柏林大学毕业后，去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经常与中国共产党学生争辩。1926年，谷正鼎与一名四川南川妇女皮以书（1908—）相遇后结婚，她也是国民党党员并且是北京学生联合会妇女部长。1927年8月，他们夫妇离苏联回到南京，谷正鼎在南京任第二十

六军政治部主任。

1928年2月,谷正鼎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秘书兼中央民众训练委员会委员。6月,北伐胜利结束,任北平市党务指导委员会常务委员。谷正鼎和谷正纲都是反对蒋介石的领导的,因此在1928年冬加入了汪精卫的改组派。在参加了1930年未能成功的扩大会议运动后,他们就隐匿起来,他们在1931年的活动不详。

1932年1月,汪精卫任行政院长,谷正鼎任行政院参事,后调铁道部,先任参事,后任总务司长,9月,被选为南京市党部执行委员。很显然,他以后改变了反对蒋介石领导的态度,因此于1935年11月被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他的兄弟谷正伦,谷正纲亦被选上了。

中日战争开始后,1937年冬被任命为主管陕西、甘肃、青海、宁夏军政事务的蒋介石西安行营政务厅长。由于中国共产党在陕西、甘肃的势力扩大,谷正鼎奉命在其管辖地区查禁共产党组织。1938年,他设立了中央军校分校,有个劳动营训练从日占区逃亡出来愿意充当军政干部的青年被国民党军队所俘虏的青年共产党人。该地区的学校加强了国民党党化教育,并命令住在共产党陕甘宁边区附近的老百姓要筑碉堡并组织民兵,用以防阻共产党军事力量的扩展,皮以书是陕西省党部妇女委员会主任委员,她为难童办收养所,为国民党军人家属开设工厂。1939年西安行营改为天水行营,管辖范围扩大到第一、第二、第五、第八战区,谷正鼎任行营政治部主任负责阻击河南、山西、皖北、鄂北新疆以及西北地区的共产党。

1939年,谷正鼎被授以特殊使命,要把汪精卫劝回到重庆来。汪精卫曾于1938年12月离重庆飞往河内汪精卫拒绝了谷正鼎的劝说,并为他自己及其随从人员要求去欧洲的护照。3月,谷正鼎带了护照和出国费用去河内。3月21日,谷正鼎离河内之次日,汪精卫的顾问曾仲鸣被刺杀,谷正鼎劝说汪精卫的努力全盘失败。因为汪精卫认为国民党这次阴谋的目标在他本人,他就决定与日本合作了。

1940年,天水行营改组为军事委员会西安办公厅,谷正鼎任副主任。四年后,任国民党陕西省党部主任委员。在中日战争期间,谷正鼎成为对日本和对中国共产党进行政治斗争中的重要人物。

1946年,谷正鼎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副部长,1947年,又以贵州代表被选

为立法委员，1948年秋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该部连同国民党的其他党政机关，为挺进的共产党军队所迫，于1949年由南京经广州及重庆迁往台湾。

1950年，谷正鼎辞去组织部长职务，专心从事立法院的工作，他的妻子是立法委员。他的兄弟谷正纲自1940—1949年任国民政府社会部部长，在台湾亦任重要职位。

顾 颉 刚

顾颉刚（1895—），教授，史学家，以对古史批判分析研究而闻名。他最著名的著作《古史辨》，从1926年到1941年出版了七卷。

顾颉刚出生在苏州的一个书香之家，他祖父是一名汉学学者，用清代训诂学严谨方法治学，顾颉刚随同他祖父习读经史基本课程。他的祖母给他讲述苏州的生动民间故事，这使他以后对中国旧剧发生了兴趣，并对口头传说的发展和传播有宝贵的见解，这些见解他后来运用到对经史典籍的文献研究上。顾颉刚自幼对历史感兴趣，爱读《左传》，他还开始对从经史典籍中发现的矛盾作笔记，并用他不成熟的努力来解决这些疑难。顾颉刚有一次曾为了他的钻研问题而付出很大代价，有一次他批判了汉儒郑玄而失去了中学助学金。这次经历却加深了他专门研究的热情和对虚伪及无知的鄙视。

1906年，顾颉刚进了苏州新创办的小学，后来又进中学读书到1913年。教师大多数是无足称道的，课程也是一般的。但顾颉刚仍在他祖父的教导下习读经史典籍。在校时，他与叶圣陶成为知交，叶圣陶后来成为开明书店编辑时，出版了顾颉刚的一些著作。顾颉刚不是把全部时间都用于学习，他曾一度介入政治参加了社会党。但是由于对经史研究的兴趣和天生的史家怀疑精神，又加上他口才上的缺点造成的胆怯，使他很快就放弃了政治活动。

1913年，顾颉刚进了北京大学预科，但是他在戏院花费的时间比读书为多，戏院的确使他恢复了对民间故事的兴趣。他不久又开始收集中国戏曲剧种、不同剧团演出的不同脚本的历史资料。通过此项研究，又加上他早年对民间故事的知识，顾颉刚发展了他对口头传说传播过程的认识。他后来将辉煌灿

烂的中国传统戏剧中围绕一个主题的材料积累扩大的想法，应用于古代历史记载，尤其是对尧、舜、禹及其先代的历史。

顾颉刚在北京大学时，受到章炳麟的影响。章炳麟是当时在世的古文学派主要代表人物，他的讲课使顾颉刚了解到今文派古文派争辩的复杂性。他对章炳麟则颇为失望。他更为今文派首领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考》所动，因为康有为敢于推测这些古代典籍是汉代的伪作。但他并不信服今文学派，认为今文学派也是“为现代的变革而曲解古代”。

1917年，胡适从美国回国，成立了顾颉刚的良师益友。一些学者围绕着这两个人的研究展开了对历史和古代典籍的生动热烈讨论和通信。从1926年到1941年连续出版了《古史辨》。顾颉刚在校中还与一些后来成名的如毛准一、傅斯年成了朋友。

顾颉刚于1920年毕业后，一度被派在北大图书馆做编目工作，后由两位教师马裕藻和沈兼士推荐作中文讲师。1922年他因祖母病回苏州照料而离职，经胡适之力，就近在上海商务印书馆聘为中国史编辑。1924年春他回北京后，在北京大学研究所工作。这是顾颉刚最高兴的几年，他手边有了他工作所需要的珍籍可供查阅。他在1926年的“自传”中说，不少同事钦佩他能整夜留在阅览室，但他说，他这样做完全是为了他个人的兴趣。不幸由于政治局势混乱及个人的问题，他于1926年被放弃了这个理想的工作，经沈兼士和林语堂的推荐去厦门大学当研究教授，在那里与鲁迅发生冲突而不得不离开。鲁迅在他的小说《理水》中用漫画手法将顾写成一个口吃、红鼻头的迂夫子，在那篇小说中顾被指为“鸟头先生”（“颉”这个字有隐晦“鸟头”的双关意义），说他在争论大禹是否确有其人，其理由是“禹”这个字含有昆虫的义，而昆虫一般是不会治水的。这篇讽刺作品是有根据的，因为顾颉刚曾于1924年争论禹是神话的而非历史的人物。他的这个不走运的论点引起了对他讥嘲的批评，即使竭力支持他的胡适，钱玄同等人也只能作为调停者出来为他帮忙。

顾颉刚从厦门转到广州中山大学。1929年他到燕京大学任中国史教授，并主持北平研究院历史研究所和“禹贡学会”，这是以《尚书禹贡》篇而命名的专门从事研究中国历史地理的组织。顾颉刚编辑《禹贡》杂志并经常在该杂志发

表文章。他又编辑了一份富有强烈爱国主义和抗日思想的《大众知识》杂志，创办了“边疆研究会”。芦沟桥事变后，日军占领华北，顾颉刚逃出北平。顾颉刚应中英文化教育基金会之聘研究中国西北的教育问题，他在1937年7月离北平，以后远至甘肃、青海、1938年9月到重庆。

战争期间，顾颉刚主持内迁到成都的齐鲁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创办中国史学会，主编《文史杂志》。战后，他们曾在上海复旦大学任教过一个时期。1954年，他出席第二届中国政治协商会议，1956年，他参加过民盟的会议。

顾颉刚撰写编纂过不少文章和书籍，最重要的是经胡适鼓励而编写的《古史辨》，他亲自编辑前三卷和第五卷。《古史辨》是对传统的中国历史和传统的的历史研究及解释作了一次新评价。顾颉刚的贡献可能是，他认为随着时间的过程，古老的传说在戏剧中却出现得较晚，而内容又愈来愈多。这一情况的分析。顾颉刚的一篇《古史辨》的自传性的序言，由恒慕义译出作为他在莱顿大学博士论文题《一位中国史学家的自传》，于1931年出版。顾颉刚的《汉代学术史略》1944年在成都出版，1955年再版改名为《秦汉的方士与儒生》，对“五行”学说的发生与发展作了详细研究而闻名，还出版了《秦始皇帝》。他于1936年编集了清代疑古派史学家崔述的未刊稿《崔东壁遗书》。他又与其他学者合写了一些著作，例如：《中国疆域沿革史》，系与谭其骧，史念海合写。他与王仲启（译音）合写《本国史》。1955年，他与一些历史家写了一本《国上古史演义》。顾颉刚的讲话、论文，报告于1963年编印为《史林杂志》。他在他的学生侯仁之主编的《中国古代地理学名著选读》中作标点，诠释《尚书》中的《禹贡》篇，做一些默默不为人知的工作。

顾 祝 同

字：墨三

顾祝同（1893.1.9—），国民党军事要员，他曾任的重要职务有：1937—45年任第三战区司令长官，1946—47年，1949年任国民党陆军总司令，1948—49年，任国防部参谋总长。1959年他在台湾时任国防会议秘书长，1967年任国

家安全委员会副秘书长。

顾祝同江苏涟水人，出身于士绅家庭，六岁时，跟随其伯父习读经史，1908年进涟水高小，两年后，派选去南京进陆军小学堂第五期，该校于1911年武昌起义时一时停办，顾祝同投入民军第九师三十四团任排长，驻防徐州。1912年又回原校学习，当年后期，他加入国民党。

1913年毕业后，顾祝同参加二次革命，在南京讨袁军司令部任参谋，9月1日，北洋军张勋攻占南京，二次革命失败，顾祝同逃往上海，仍从事倒袁活动。1914年去武昌，陆军小学堂的南方毕业生应召进湖北第二陆军预备学校。该校因1915年袁世凯帝制活动而管制甚严，顾祝同离武昌，直到1916年6月袁世凯死后才回武昌。1916年12月毕业后，又进保定军校第六期步兵科。1916年春受完军事教育后，在华中任连长。

1921年，顾祝同到桂林，投入粤军第二军在许崇智的司令部中当副官。他被派往军士教导队任区队长，不久认识了蒋介石成为朋友，那时蒋介石正为孙中山拟订北伐计划。1922年，顾祝同参加了征讨广西战役和征讨福建战役，该战役以10月12日攻占福州而告终。10月20日，蒋介石被任为许崇智的参谋长，蒋推荐顾祝同为副官长。

1924年6月，顾祝同任黄埔军校战术教官，蒋介石提升他为管理部主任，统率教导第二团第一营。1925年3月，顾祝同率领他的学生军参加第一次对陈炯明的征讨。

1925年8月，国民革命军成立，顾祝同任何应钦的第一军第一师第二团参谋主任，10月，第二次东征后，升任第一军第三师副师长，1926年末攻克福州后升任第三师师长。1927年10月，升任第九军军长，辖有第三，第四，第二十一师。1927年底任军事委员会。

1928年北伐完成后，军队整编，第九军编为第二师，顾祝同任师长驻防蚌埠。1929年在湖北与桂军作战，10月，顾祝同任第一军军长，1930年，率军与阎冯北方联军作战，他在5月底到9月在河南前线苦战。1930年秋北方联军溃败，顾祝同攻占洛阳，任洛阳行营主任，年底，任潼关行营主任，收编冯玉祥在西北的残部。

1931年7月，顾祝同在南京任国民政府警卫军军长。这支精锐部队开始受德国驻华军事顾问团训练，顾祝同热情地接受新职。但不久他又被派往战场，这次是去河北讨伐石友三，他率领包括警卫军及其他部队的第二集团年轻而易举地平定了石友三的叛乱。

1931年12月，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中，顾祝同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一直保持到1950年，1931年12月他还被任为江苏省主席，1933年10月3日，因他处决了几名新闻记者而被撤职。三个星期后，任对江西的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围剿的北路军总司令。1934年10月，共产党军突围向陕西长征，顾祝同任江西绥靖公署主任，12月任军政部政务次长。

1935及1936年，顾祝同竭力加强国民政府对贵州、四川、西康的控制。1935年4月，任贵州绥靖主任，在他掌权时期，他把黔军调往他省，并改组贵州省政府，后来，又对四川采取同样措施，11月，任军事委员会重庆行营主任。1936年8月2日，兼贵州省主席。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期间，顾祝同去南京和何应钦商量进攻西安的计划，并在何应钦手下任讨逆军副司令。这次危机以12月25日蒋介石获释而终止。但是在西北的东北军和杨虎城所率领的军队，拒不接受国民政府的方针。1937年1月，派顾祝同去西北任西安行营主任及五个集团军的指挥者。顾祝同在洛阳和持异议者举行谈判没有成功，乃调部队到潼关准备作战，1月29日，杨虎城及东北军将领表示愿意让步。他们同意军队改编，杨虎城出国。1937年2月8日，顾祝同率部进入西安，着手改编西北军。

1937年7月中日战争爆发，顾祝同任第九集团军总司令，8月，他在蒋介石手下任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司令部设在苏州指挥淞沪战线，在11月5日日军在杭州湾登陆迂回包围以前，中国军队曾阻击了日方多次进攻。三周后，任顾祝同为江苏省主席，他任此职到1939年。1937年12月12日南京失守，战区体制改组，顾祝同任第三战区司令长官，所辖地区包括苏南，皖南，江西东北部及浙江，福建等地区。中日战争期间，顾祝同一直担任这个职务。他所统辖的战区因有共产党叶挺，项英的新四军情况复杂。国民党军队和在第三战区的共产党军队的冲突造成了新四军事件。1941年1月，新四军和国民党军在皖南茂林冲突，

月6日至14日连续战斗以共方重创而结束，项英阵亡，叶挺被俘囚禁，长江以南共产党的军事力量被消灭。

1945年秋，顾祝同接受第三战区的日军投降。1946年1月，撤消战区建置，顾祝同任徐州绥靖主任，掌管山东，江苏、河南、安徽等地区。5月18日，又任国防部陆军总司令的新职。9月14日，兼任郑州绥靖公署主任，加强国民党军队对共军刘伯诚部的防御。1947年，顾祝同在山东与共军作战，收复了该省的大片地区。1948年5月，何应钦为同防部长，顾任参谋总长。尽管顾祝同努力想扭转内战局势，共军仍不断推进而国民党军则不断崩溃。

1949年4月22日，南京为共产党攻占，顾祝同飞往上海，任陆军总司令。他又去广州筹划军事。10月14日飞往台北与蒋介石商谈。10月15日，国民党放弃广州，国民政府的残存机构迁往重庆，顾祝同和蒋介石会商后飞往重庆，负责指挥西南的军事行动。

1949年12月7日，国民政府行政院确认顾祝同为西南军政长官，并以胡宗南为副。约在同时，张群到昆明去劝说统治云南的卢汉不要投向共产党。顾祝同则对成都附近一带的刘文辉的部队采取措施，并掩护那一批准备逃往台湾的国民政府官员。12月10日，蒋介石在顾祝同催促下去台湾。12月11日卢汉宣布投向共产党，顾祝同力图阻止而未成功。顾祝同面对共产党军队的迅速进军无法作有效的抵御，12月25日，从四川飞到海南岛，他在台湾短暂停留后，1950年1月13日又回云南，拼命想解救国民党第八、第二十六军残部，但未成功。

1950年3月1日，蒋介石在台湾复任总统，顾祝同任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副主任委员。1959年任国防会议秘书长，1967年1月，国防委员会改组为安全委员会后，顾祝同在黄少谷手下任副秘书长。

顾 孟 馥

原名：顾兆熊

顾孟馥（1889—），受德国教育的经济学家，北京大学教授，二十年代加入国民党，1933年前在政治上与汪精卫是同党。1949年在香港参加所谓第三势

力的活动，五十年代中期去美国，重新从事他的学术生涯。

顾孟馥是书画家顾稼祥（译音）的儿子，生在河北宛平。他受了传统的旧式教育后，于1903—1906年进北京京师大学堂，专修德语和德国文学。1906年由公费派往德国留学。1906—1908年在莱比锡大学，1908—1911在柏林大学学习。

顾孟馥于1911年回到北京，在北京大学当经济学副教授，1915年成为正教授，1918年任经济系主任。他是青年知识界中闻名的《新青年》撰稿人之一。

1924年，顾孟馥参加了与国民党有联系的北京实践社，1925年离开北京去广州。1926年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中，以222票对34票选入中央执行委员会。他属于国民党内汪精卫一派，这一派主张支持1924年开始实行的与共产党合作的政策。他回北京后，参加了3月18日的事件。3月19日，段祺瑞下令逮捕顾孟馥、徐谦、李石曾、易培基，认为他们煽动此事件并进行共产主义的宣传。顾孟馥等人由国民军北京卫戍司令鹿钟麟的保护才免于被逮捕。顾孟馥等一行，其中包括陈友仁，苏联顾问鲍罗庭离北京经海参威于4月3日到达库伦（乌兰巴托）。

1926年春，蒋介石未和汪精卫商量即在广州宣布戒严并逮捕一批共产党人，汪精卫在3月20日事变后辞职，国民党左派群龙无首。汪不久即去欧洲，蒋介石遂能控制党政大权。5月15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根据蒋介石的提议进行清除党内共产党势力。毛泽东，当时代理宣传部部长，为顾孟馥所代。

1926年7月，北伐军开始北进，10月10日攻克武汉，一个月后，国民政府由广州迁到武汉，顾孟馥在联合委员会工作，这个联合委员会在主要的党政领导人到达武汉前暂行政府职权。联合委员会的成员有徐谦、孙科、陈友仁、邓演达及共产党人吴玉章和林伯渠。但是蒋介石却主张先在南昌后在南京成立政府，国民党内部的分裂即在目前。1927年3月，武汉召开中央执行委员会，左派控制了会议的进程，成立了七人主席制的中央政治会议，并恢复军事委员会，蒋介石的权势因而被削减了。顾孟馥选入了上述两个委员会，任宣传部长。4月，汪精卫从欧洲回国，掌握了武汉政权，蒋介石则在南京成立一个对立的政府。顾孟馥留在武汉，支持汪精卫7月15日的决议，为国民党的统一而与共产党决裂。

1927年8月29日，蒋介石辞职后八天，汪精卫及其他武汉政府首脑与李宗仁在江西庐山会商。会商的一项结果是9月11日在上海召开大会，在会上国民党各派代表制定了全党统一的协议。四天后，成立了中央特别委员会作为过渡的政府。顾孟馥赞成汪精卫的主张，反对这个委员会的组成，回到武汉，与唐生智一起成立了政治会议分会，斥责特别委员会为非法。10月底，李宗仁率军征讨武汉反对派，逼使唐生智、顾孟馥放弃武汉。顾孟馥去广州，与陈公博、甘乃光为张发奎11月17日政变作战准备。张发奎占领广州后，宣布反对特别委员会。但此举终于失败，汪精卫未能动摇南京的权势，于12月17日去法国。汪的离去使顾孟馥的政治生涯受到了挫折。

1928年冬，顾孟馥，陈公博及其他国民党左翼人物在上海组织“国民党改组同志会”，有时称为改组派，1929年春创办《民心周刊》，呼吁国民党恢复1924年改组时的精神。对此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决定召开排斥左派人物在外的第三次代表大会。1929年3月12日，顾孟馥和已回国的汪精卫及其他十二名国民党重要成员发表声明宣布其为非法。三天后，第三次代表大会开会，投票撤销顾孟馥的中央执行委员。3月20日，开除陈公博出党。改组派对这一行动的反应是着手寻求愿合力推翻南京政府的军事同盟者。

1930年春，汪精卫与阎锡山，冯玉祥联合结成反蒋联盟，并准备召开包括改组派、阎冯、和西山会议派的代表组成的国民党扩大会议。会议于8月7日在北平召开，成立以阎锡山为首的国民政府，以汪精卫为首的国民党中央，顾孟馥负责这一新组成的国民党中央的宣传部。1930年9月，扩大会议的活动失败，此后一年多时间内，顾孟馥未在公众场合露面。

1932年1月，汪精卫任行政院长，顾孟馥为铁道部长。8月，汪精卫等人全体辞职，国民政府加以挽留，但准其请假而离职，大部份成员乃收回辞呈，唯顾孟馥仍坚辞。

顾孟馥在三十年代中期的活动不详。中日战争爆发后，顾孟馥随国民政府迁往重庆，1939年汪精卫在南京成立日伪政府，顾孟馥未去参加，仍留在重庆，1941—43年任国立中央大学校长，但与政治很少接触。

对日作战胜利后，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内战立即开始。1948年5月，行政院副

院长翁文灏请顾孟馀参加政府工作，他辞而未受，因为他认为政府的主要任务是与共产党进行和谈，并且认为共产党的强硬态度和国民党领导人之间的意见不一致，和谈必然失败。1949年，蒋介石等人迁往台湾，中国共产党控制了全部大陆，顾孟馀去香港。他过去的反蒋，和在战时及战后的不介入态度，因此被香港的一批反共反蒋的政客和知识界看作是一种政治资本，希望搞一种第三势力运动。据说顾孟馀和张发奎成为这一活动的领袖，他们希望中国人可以在蒋介石的民族主义和中国共产党的思想之外别有选择。这一活动在1950年颇引起了一些注意，但美国支持台湾的蒋介石政府，这一活动就消声匿迹了。

五十年代中，顾孟馀去美国，安居在加利福尼亚州伯克利城。从1959年始，他充当加利福尼亚大学中国研究中心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农业及语言文化研究计划的顾问。对经过多年的政治活动之后，他对政治已感厌恶，于是又回到了他所选择的学者生涯了。

顾 维 钧

字：少川

西名：V. K. 威灵顿·顾

顾维钧（1887—），杰出的外交家，他对国际联盟和联合国的成立及其早期工作有过重大贡献。历任驻法、驻英、驻美大使。1957—1967年在海牙国际法庭任职。

顾维钧生在江苏嘉定。他父亲是一个报关行职员，嘉定和苏州都有他的财产，并在上海公共租界内拥有一所大宅。他因为钦佩惠灵顿公爵，所以把儿子取名为威灵顿。顾维钧在上海英华书院（1899—1900），育才学校（1900—1901）上学，后来进了圣约翰书院，用三年时间修毕了四年课程，并担任了学生主办的《龙》报的文学编辑。1904年获得圣约翰大学学士，硕士学位后，与施肇基率领的一批湖北籍学生去美国。1905年他在纽约州伊萨卡市的柯克学院学习一年，于1905年为哥伦比亚学院录取。他是语言社和一些学生组织的成员，并担任《哥伦比亚每日旁观者》编辑和《哥伦比亚人》年鉴经办人。他获得语

言文学奖金和哥伦比亚、康奈尔辩论奖。他还担任东部各州中国学生联合会主席。1908年毕业后，在哥伦比亚大学当政治科学研究生。1909年获得硕士学位，1912年获得哲学博士学位。他的论文《外国对中国政府的权利要求》于1912年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在此期间，他还一度编辑过《中国学生月刊》，《中国学生年刊》。

1912年4月回国，顾维钧任国务院、总统府秘书，不久，与唐绍仪的长女结婚。4月，任外交部秘书，并仍保留总统府秘书的职位，又任国际革命损失索赔委员会副主任。1912年10月升任外交部参事。

1915年7月，顾维钧年二十七岁时任驻墨西哥公使，三个月后，调任驻美及驻古巴公使。他在美国时是一名很出色的外交官，因此1916年获得耶鲁大学名誉博士。1918年10月，因他妻子患流行性感胃去世请假回国。1919年1月，顾维钧代表中国出席巴黎和会。他在中国代表团的处理山东问题，及由于凡尔赛条约规定德国在山东权利转让给日本而拒绝在该初约上签字，顾维钧起了重要作用。9月，他代表中国政府和匈牙利，保加利亚签订了和约。

在此期间、顾维钧又作为中国代表出席国际劳工会议，该会议决定成立了国际劳工组织。此外，他在巴黎和会国联委员会中当选为“小国”五名代表之一，参予拟订国联公约。顾维钧为中国首席代表出席11月举行的国联第一次大会。那时，顾又出任驻英大使。

1920年11月14日，国联大会在日内瓦召开前一天，顾维钧和黄惠兰结婚。她的父亲黄仲涵是原籍厦门的华侨，爪哇的“糖业大王”。这一对新婚夫妇在日内瓦的生活，既有外交活动又有显赫的社会活动。顾维钧克服了很大困难，使中国选入了国联理事会非常任理事。他为此而发挥了按地区出代表的原则，此后就成为国际组织公认的原则，他当了国联理事会中的第一名中国代表，1921年9月，又代表中国出席国联大会和国联理事会，并在第十四届国联理事会中担任主席。

1921年10月，顾维钧以施肇基率领的中国代表团团员的身份出席华盛顿会议。在会议中，顾维钧作为施肇基的主要合作人提出了“十点”，例如关于中国的领土与主权的完整出席讨论有关本国利益的国际会议的权利等等问题，

1922年2月九国公约之签订和对山东问题的解决是中国代表团的重大外交成就。

华盛顿会议结束后，顾维钧回国，当时传说，他将代颜惠庆出任外交总长。顾维钧虽然生性节俭，他和他的夫人有一所明代著名将军吴三桂为他爱妾陈圆圆修建的宅邸。黄仲涵应女儿黄惠兰之请，替顾夫妇买下了这所宅邸。6月，顾维钧任全国财政委员会委员长，8月，王宠惠组阁，任命他为外交总长。

顾维钧任外交部长时的第一个任务是与苏联谈判建立全面的外交关系，解决中东路问题，和对外蒙的政治地位达成协议。9月2日，新任苏联代表越飞提出以1919年及1920年加拉罕的声明为基础进行谈判。顾维钧要求在谈判之前红军撤出外蒙。越飞反对当时对中东路的管理办法，认为无视苏联的条约权利，顾维钧签称“将铁路全部归还中国是解决问题最好办法”。这问题正在交换意见时，王宠惠内阁下台，顾维钧辞去外交总长。越飞去上海，会见了孙中山，顾维钧出任关税特别会议筹备处处长，这是由中国方面在巴黎和会和华盛顿会议中先后提出召开的会议。

1923年3月，北京政府令王正廷负责处理中苏关系问题。4月初，黄郛辞职，顾维钧在高凌霨内阁任代外交总长。6月，曹锟及其支持者逼黎元洪放弃总统之位，以便让曹锟就职。顾维钧留任原职，处理山东土匪临城劫车案，当时有几名西方人士被劫持。经数周的反复磋商，取得妥协解决，顾维钧又与苏联代表加拉罕进行谈判，不久，顾将此事交由王正廷直接负责处理。

1924年1月，顾维钧在孙宝琦内阁任外交总长。3月，王正廷与加拉罕签订一项协定，双方立即建立外交关系，但其中并无取消苏蒙条约和撤退外蒙红军的规定。内阁乃不予批准，顾维钧不承认王正廷的签字，并将他解职。但是，5月31日，顾维钧在苏维的强大压力下签订了同样的协定。7月，孙宝琦辞职，顾维钧代内阁总理，10月，因冯玉祥在北京发动兵变而辞职。顾维钧协助曹锟及其一家逃到天津租界，又将自己的公章交给王正廷，以后避往威海卫。他的妻子留在外商经营的北京饭店，经张作霖、张学良之劝告，她去天津租界，顾维钧和她在天津相会。在他们离开家的时候，孙中山于1925年3月在北京寓邸中逝世。

顾维钧有一年的时间没有什么政治活动，只担任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

的董事。1926年5月，他回北京在颜惠庆内阁任财政总长，但驱逐冯玉祥出北京的张作霖反对颜惠庆组阁，逼使其阁员逃出北京，6月底，杜锡珪组阁。顾维钧任财政总长到10月，10月后任代理内阁总理及外交总长。此后二个月中，他三次辞职，张作霖未予允准。张作霖就任安国军大元帅后，1926年12月率部进入北京，1927年1月批准了顾维钧及其阁员的任命。4月，张作霖搜查苏联使馆，给顾维钧制造了新的问题，他在6月辞职退隐于西山别墅。

1928年6月，北伐军逼近北京，张作霖等一行离开北京，顾维钧由西山回到北京随送他们到天津。专列向东北行驶，到沈阳附近被日军炸毁，张作霖身死。不久以后，国民革命军因顾维钧支持张作霖政府下令通缉。他先逃往威海卫，又去法国，以后又去加拿大做一次访问旅行。

1929年顾维钧回国后去沈阳与张学良共事。张学良于1930瓦解了威协蒋介石国民政府的阎冯联盟，劝请蒋介石取消对顾维钧的通缉并发还他的财产。顾维钧留在沈阳，经常提醒张学良，说他的对外政策对日本有利，劝他加以改变。但张学良没有重视他的意见。1931年，顾维钧任东北改革委员会主任，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外事委员会委员。

1931年9月18日沈阳事变日军占领东北后，顾维钧又回到在内政与外交方面的活动。王正廷辞去外交总长，施肇基不愿继任，12月由顾维钧任职。同年年底，蒋介石辞职，陈友仁继顾维钧为外交部长。顾维钧任东北收复失地委员会委员长，代表中国一方参加国联因中日争端而派到东北调查的李顿调查团。他从1932年2月到8月，不顾个人安危，给调查团提出了有关日本侵略的长篇备忘录。同年夏出任驻法公使，10月，任国联的中国代表。他和李顿调查团的一些成员，从上海趁船去日内瓦，他在国联大会上对中国的立场做了有力的辩论。中国与日本都对李顿调查团的建议拒绝接受。

1933年3月日本退出国联。

1933年3月，顾维钧代表中国，出席在日内瓦召开的裁军及限制武器会议，5月，出席在伦敦召开的货币经济会议，7月，他协助财政部长宋子文从国联取得中国公共卫生方面的技术合作。1934年中，任国联理事会的中国代表及国联大会代表。1934年1月，任海牙常设仲裁法庭的仲裁员，1935—36任国联大会

中国首席代表。这样许多职务，使他很少有时间来兼顾法国大使的职务了。

他回国度假数月后，1936年4月，回到巴黎，升格为驻法大使。中日战争爆发后，他再次去国联任中国首席代表，担任第九十六届国联理事会主席。1937年11月，他任首席代表，出席在布鲁塞尔召开的华盛顿条约国讨论中日冲突问题会议的中国首席代表。他又在1938年1939年两届的国联大会继续为中国活动，但并无多少成就。他在法国大使任内，遇到不少问题，当时法国当局受日本的压力，拒绝利用滇越路运输军火。1937年12月，他与利比里亚签订友好条约。1938年中，法国当局占领西沙群岛，他确申中国对该地区的主权。第二年，他一度离开在法国的职务，以中国特使身份参加教皇庇亚第十二世的加冕礼。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顾维钧一家在巴黎，他于是迁往波尔多，后又迁往圣让德吕兹。1940年，他代表中国，参加葡萄牙建国八百周年。当他回到圣让德吕兹时，该地已为纳粹德国占领，他曾在维希政府统治下呆了一个短时期，不久接任郭泰祺而为驻英大使，那时郭泰祺调任外交部长。他为了定全起见，将他的妻子送到美国。1942年，他签订了中英关于中国海员的协定，他在1942年末及1943年后期的国会代表团互访。1943年，废除英国在华治外法权，和1944年5月，签订中美租借协定的谈判中均起重要作用。他又以首席代表身份出席1944年9月29日到10月7日召开的顿巴登橡树园会议第二阶段的会议。

1945年3月，任命顾维钧为中国代表，出席在旧金山召开的联合国国际组织会议。他代表中国，于1945年6月26日，在旧金山退伍军人纪念堂举行的签字仪式，中国得到第一个签字的光荣。以后他任联合国筹备委员会的中国首席代表。

1946年5月，顾维钧调任驻美大使，他竭力为国民党对共产党进行内战争取美援。除大使职务之外，他还兼任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团长（1946）及代理团长（1947）。1948年，他在国民政府向美国提出三年内提供三十亿美援的要求中起了重要作用。1949年1月他为国民党争取通过美国调处与中国共产党和平解决的努力，但毫无成就。当共产党赢得了对大陆的控制，国民政府迁到台湾后，他仍为国民党争取美国的经济及军事援助。1954年，他到台湾与国民党官

员商谈后，又与外交部长叶公超同赴华盛顿，帮助中美防御条约的谈判，该条约于12月2日签定。1956年3月，他又一次去台湾，国民政府宣布顾维钧辞离大使之职。两个月后，任命他为蒋介石的最高谏议，驻在美国。

1956年6月28日徐谟去世，1957年1月，国际法庭选顾维钧继徐谟的任期。他于5月中旬在海牙就职，10月，再次选举他连任十年。1964—1967年，任国际法庭副庭长，1967年2月5日，任满后，他回到美国，在纽约定居。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顾维钧和黄惠兰离婚，不久和杨广森（译音）的遗孀结婚。顾维钧有四个孩子，两个是唐绍仪的女儿所生，另二个孩子，惠灵顿、费利曼，系黄惠兰所生。

顾维钧在他一生的外交经历中，除写了《外人在华之地位》及李顿调查团备忘录之外，还写了不少文章。1931年在上海出版金问泗在《顾维钧的外交方针》一书中分析了顾维钧在1931年以前的事业于1931年在上海出版。1963年10月，他把他收集的外交文件送给哥伦比亚大学。其中包括信函，电报，演讲，以及与世界政界领袖谈话记录，还有三十五册用两种文字写下的日记。他约定这些文件在他去世前不要引用，还将其中一部份文件副本存放于台湾中央研究院。哥伦比亚大学校长格雷森·柯克在接受这些文件时说，这些文件“详尽确切记录了一个人的经历充满了重大使命，并以有效而杰出的方法完成”。

顾维钧在国际外交上的成就，使他获得了不少荣誉，其中有哥伦比亚大学，圣约翰大学、阿伯丁大学，伯明翰大学，曼彻斯特大学的名誉学位。他对国联和联合国的成立和早期工作作出过重大贡献，并增强了中国的国际地位，特别是国民政府成立之前的可贵成就，那时的北京政府的权力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他是一名很出色的演说家。他的方法和行动虽然常常受到抨击，但是，即使他的敌人，也不能不承认顾维钧首先是一位对中国的忠诚的毫不动摇的爱国者。

古 应 芬

字：湘芹

古应芬（1873—1931，10，28），广东的主要同盟会会员。曾任南方军政

府财政部长,广东省财政所长,广州军需总监。国民政府成立后,未任重要职务,1931年协助成立广州反对派政府。

古应芬的父亲古介南是一个既办学又善于经商的人,他鼓励古应芬习读古籍,1902年中秀才。两年后,古应芬获得官费去日本留学。1904年,他去日本进东京法政大学速成科。1905年7月,他参加同盟会的成立会议。1907年底,日本当局逼令同盟会停止活动,古应芬和朱执信回到华南从事反满活动,他又在广东法政学堂教书,他的学生中有陈炯明和邹鲁,这两个人不久也参加了同盟会。当时广东政府当局未发觉他从事革命活动,任他为省谘议局秘书。

1911年初,古应芬去香港,协助黄兴,胡汉民筹划广州起义。4月举行起义,但未成功。1911年11月9日,广州的清统治者被推翻后,革命党人推举胡汉民为广东都督,古应芬为都督府秘书长,1912年任琼崖督办。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古逃往香港。第二年,他和朱执信,邓铿劝说,当时被称为匪帮的民军,起来反对广东督军龙济光。古应芬三次去东南亚地区向华侨为倒袁运动募款。倒袁运动因1916年6月袁世凯死去而结束。

1918年11月起,古应芬在福建漳州陈炯明手下任职,参加了陈炯明1920年驱逐桂军夺回广东的战役。1921年11月陈炯明任广东省长,古应芬任广东省政务厅长。1921年中,陈炯明的个人野心开始与孙中山统一中国的计划发生矛盾,古应芬试图抑制陈炯明阻挠孙中山北伐的活动,但未获成功。1922年3月,邓铿在广州被刺,古应芬辞去陈炯明僚属之职去上海。6月,陈炯明部占广州。古应芬受孙中山之命,与邓泽如等联合反陈,滇军、桂军与一部份忠于孙中山的粤军把陈炯明逐出广州。1923年2月,孙中山回广州重组政府。

1923年2月24日,桂军沈鸿英准备在广州谋害一批国民党领导人。古应芬立即去江门设指挥部,动员效忠的粤军。因古应芬的措置果断使桂军不能再行控制广州,并统一了粤军。8月,孙中山任命古应芬为征讨陈炯明的大本营秘书长,那时陈炯明又在粤东结集部队,11月,陈炯明进袭广州,但被击退,回到他的东江据点。

1924年9月23日,孙中山任古应芬为大本营财政部长兼广东省财政厅长,广州军需总监。古应芬担任财政工作既困难又复杂,因为当时广东大部份地区

为滇、湘、桂各系军队所占，把地方税收据为已有。

1925年7月，广州成立国民政府，古应芬选入以汪精卫为首的政府委员会兼任省政府民政厅长。古应芬对国民党内中俄两国共产党人势力的日益增长感到不安，1926年10月，他去江西鼓舞北伐军士气时，与蒋介石会商如何结束国民党和共产党的联盟。1927年3月，他到上海，参加4月2日召开的中央监察委员会，导致国民党保守派势力发动的一次反共行动。蒋介石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与国民党左翼的武汉政府对峙，古应芬任财政部长，又以任胡汉民为首的国民政府常务委员。他为北伐进军筹措经费，发行了票面值为二千万元的政府公债。他还制定了地方及国家税收的标准。1927年8月，蒋介石下野，古应芬亦辞职与邓泽如一起去日本。他回国时，留居在香港。12月16日，国民党当局要古应芬和邓泽如调查汪精卫与广州公社的关系。尽管他们之间有悠久友情，但在报告中仍对汪精卫作了严厉的谴责。

1928年10月10日，南京成立了新的国民政府，古应芬任文官长，其主要任务是调解国民党内部派系的不和。他在这项工作中遇到许多挫折，一直坚持到1930年12月，声称因背部需要进行手术治疗而离南京去广州。

1931年2月28日，古应芬的朋友，多年的共事者胡汉民被蒋介石软禁，他与中央监察委员林森、萧佛成、邓泽如等三人于4日发表声明要求弹劾蒋介石，5月，他又与政界首脑人物孙科、陈友仁、唐绍仪、汪精卫等人在广州成立反对派政府。他在广州政府会议和常务委员会任职。9月，日本侵占东北，全国局势紧张，广州政府解散。10月14日，胡汉民获释，同月，南京、广州双方在上海和平谈判。古应芬为广州方面代表，但因病未去上海，他于1931年10月28日死在广州。

邝 富 灼

字：耀西

邝富灼（1869—1938.10），1908—1929年任商务印书馆英语部主编，以编辑英语教科书知名。他领导上海基督教公益及公益事业等方面的活动也同样

负有盛名。

邝富灼生在广东台山的一个农民家庭。八岁开始在村塾读书。四年后，他决定去找他的去美国修建铁路的叔父。邝富灼第一次到上海时，未能取得护照，第二年才得到。1882年，他十三岁时成为一个无依无靠旧金山移民，那时美国西海岸一带排华情绪高涨。1881年已通过排华法令，但尚未实施。

经他叔父的努力，邝富灼等住在加利福尼亚的萨克拉门托市一个人家里，他自谋生活，还在一个华人夜校里学英语。后来，他和当地华人教会的一名牧师金泰（译音）友好，他劝说邝富灼入了基督教，鼓励他学习并自求上进。

1889年，邝富灼二十岁时参加了救世军，此后七年中，他沿着西海岸一带为救世军工作，他以“能说英语的中国教徒”而为人所注意。在此阶段的后期，他在夜校里学会了速记，成为救世军西海岸负责人的秘书，这一工作使他有广泛的社会联系，迅速提高了他的英语，加强了自信心，并且激励了他对继续求学的愿望。

1897年，他结识了波莫那学院的一名青年学生汉埃德温·哈恩，向他谈起想受正规教育的愿望。埃德温的父亲是帕萨迪纳的一个有名的商人。爱德温把邝富灼介绍给波莫那大学的校长赛勒斯·G·鲍尔温，鲍尔温让邝富灼先入预科以半工半读求学，邝富灼因此把自己的长子取名为“鲍尔温”以志纪念。邝富灼在被莫那学院学习了五年，完成了中学及大学一年级的课程，然后转到加利福尼亚大学读了三年书，1905年获得学士学位，又去纽约进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学习一年，1906年获得硕士学位。

邝富灼回国时，驻华盛顿的中国公使梁诚介绍他回国后去广州广东省学堂教英语，他教了一年书，到北京交通部任职一年，1908年辞职去上海，在商务印书馆任英文部主编历时二十一年。

商务印书馆创办于1897年，以应当时全国对新式教科书的迫切需要。当时中国的旧传统教育制度迅速改变，需要各种西方的新知识，各级学校需要多种科目的教科书。这些教科书大部分是用中文写的。但是过了一段时期后，因为新式学校的高年级以英语为必修外国语，于是也出版了数量可观的英语教科书。

商务印书馆与上海一些大企业的不同之处在于其创办人是基督教徒。不少职员在上海圣公会，卫理公会的印刷厂中受过出版业务的训练。而且他们掌握了有效率的经营管理要点。邝富灼在商务印书馆任职的很长期间，正值民国成立后教科书发行迅速，在许多城市设立分馆。邝富灼除撰写有关教育问题的文章外，还亲自编写了许多英语教科书，同时又负责其它教科书的出版。邝富灼和中华书局的周越然，该局是商务印书馆的主要竞争者，是当时最知名的英语教科书的编撰者。

邝富灼在上海商业界，社交界也很受推崇，他在不少基督教公益及慈善事业机构很活跃，他在中国的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委员会服务三十年，1919—1925年任执行委员，后任主席。在此期间，青年会会员迅速增加，活动范围扩大，他在上海任青年会会长十余年之久。

他是一个热心的扶轮社社员，曾任国际扶轮社理事，又继王正廷而任中国及香港地区扶轮社社长。1922年他出席洛杉矶的国际扶轮社大会，那时，接受了波莫那大学名誉哲学博士学位，在邝富灼之前，只有波莫那大学的创办人及加利福尼亚大学校长接受过这个荣誉学位。同年夏天，他去纽约在教育学院听课，以了解近代教育的动向。

邝富灼起积极作用并居领导地位的一些公益事业和教育机构有基督教教育协会，太平洋学会、红十字会，全国儿童福利会，全国盲人协会，中华麻疯协会。他又是山东齐鲁大学和上海南洋商学院的董事。他是全国基督教理事会的成员，上海的粤籍协和教会的长老。他领导这些私人机构花费不少时间和精力。1929他从商务印书馆辞职后，专心致力于上述活动。1938年10月，死在上海大华医院。

孔 祥 熙

字：庸之

号：子渊

孔祥熙（1881—1967.8.15），银行家，实业家。其妻为宋霭龄。1928

年他在新成立的国民政府任工商部长。1933—1944年他在财政部长任内，进行了1935年11月的币制改革，并在中日战争期间为国民政府主持重要的财政计划。他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铭贤学校的创办人。

孔家原籍山东曲阜，是孔子的后裔。明代万历年间，这一支迁居山西。清末孔训昌（译音）以担任官职而承袭封号。他的儿子孔庆麟靠着以太谷为中心建立并经营得法的票号起家。他和北京、广州、日本等地都有业务联系。孔庆霖的第三子孔繁慈在北京当主管汇款的掌柜，不久又回到太谷经营家业。清末，国内汇款业务逐渐改由半新式的银行机构经营。孔家于是在山西代办经销英国亚细亚火油公司的火油，设立祥记公司，运销石油产品以及洋烛，染料和其他洋货。

孔祥熙是孔繁慈的儿子，出生在太谷。三年后，他的妹妹祥贞（译音）出生。母亲贾氏，出身山西的一门富家，孔祥熙八岁时，他母亲死去。孔祥熙进太谷的丁嘉立创办的小学读书，丁嘉立是1883年由美国对外差会委员会派到山西传教的教士。丁嘉立除劝孔祥熙入教外，还教他英语和其他一些西方教育的基本知识。

1896—1900年，孔祥熙在北京附近的通州潞河学院读书。当时对清政府变法的的要求日益增长，孔祥熙和他的同班同学李进方（译音）组织了一个秘密团体文友会（译音），赞助孙中山共和革命的活动。

1900年夏，义和团起义爆发，当时孔祥熙假期回家。山西巡抚毓贤，处决了159名洋人，其中137人是基督教传教士及其子女。孔祥熙以其个人及家族的势力护庇了太谷地区的西方传教士。孔祥熙在危难之中的此种行动，一个美国传教士麦美德在《中国的两名英雄》一书中作了叙述。不久，孔祥熙去北京，那时李鸿章正与占据北京的联军谈判。孔祥熙因与英国教士H·E·爱德华慈友好，通过他削减了联军对山西的赔偿要求。李鸿章对此很赏识，给孔祥熙护照和头衔，使他能在1901出国去美国留学。李鸿章还给孔祥熙写信介绍给驻美公使伍廷芳。

孔祥熙在美国补习英语后进俄亥俄州的欧柏林大学，他在克利夫兰遇见正在美国游历的孙中山。1906年，孔祥熙毕业于欧柏林大学后，又进了耶鲁大学，

1907年获得经济学硕士学位。

山西缺少新式学校，孔祥熙是一个热心的基督教徒，1908年他以山西欧伯林大学纪念会代表的名义，回到太谷并创办了铭贤学校，为华北学生提供初等及中等教育。此后，他一方面经营家业，一方面又致力于办理几处铭贤学校。

孔祥熙在1911年前赞助过孙中山，但他到底参加革命活动到何等程度，未能确知。1911年，他的兄弟孔炳之（译音）在山西作战而死，他本人一度在率领反清起义的阎锡山手下任职。1913年，民国成立后，他在东京当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干事，他在日本时，正是孙中山等人二次革命失败流亡在日本的时候，这时，他与随孙中山去日本的英文秘书宋霭龄相识，她是宋耀如之长女。那时孔祥熙的妻子，潞河女校的学生韩玉梅死于肺病，1914年，孔祥熙就与宋霭龄结婚。

1916年袁世凯死去。国民党人在外流亡的生活结束。孔祥熙和他的妻子回到山西老家，1918年，他们又去英国，法国，美国。1919年初，他到俄亥俄，正式商定了欧伯林大学和铭贤学校的合作计划；美国毕业生到铭贤学校教书，选送铭贤学校成绩优良的毕业生到美国留学。

1919年，孔祥熙回山西。1922年以前，他一直把时间用在积聚家财和办理铭贤中学上面。在1921—1922年的华盛顿会议中涉及中日谈判，日本同意把山东的权利交还给中国。北京政府派王正廷为督办负责接交，孔祥熙为会办。1923—1924年，1914年和宋庆龄结婚的孙中山请孔祥熙协助他进行国民党改组以利全国统一事业，孔祥熙成了与北方首领张作霖、冯玉祥、阎锡山等人的联系渠道，他把孙中山的《建国大纲》手抄本送给冯玉祥，冯曾在日记中表示对此书的赞赏。1924年孔祥熙到广州，加入了新改组的国民党。1925年他陪同孙中山到北京，成了孙中山政治遗嘱的见证人，孙中山去世后，他留在北京料理丧事。以后又去山西，他主持几处铭贤学校的成立式后来去美国，接受欧伯林大学授予的名誉博士学位。

北伐期间，他与蒋介石共事，在政治上很快升到显要地位，任广东省财政厅厅长，代理广州及武汉国民政府的财政部长，1927年春他参加了蒋介石在南京

成立的反武汉的政府。6月间他在罗致冯玉祥对蒋介石的支持中，12月间和为促成蒋介石与宋美龄的婚事均起重要作用。这件婚事，宋霭龄是同意的，而宋庆龄反对，最后她们的母亲以蒋介石入基督教为条件而同意了。

1928年新的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孔祥熙任工商部长，他按照孙中山民生主义的原则，建立了劳工仲裁、劳保制度，成立了贸易司，并向驻外使馆派出商务参赞。1929年，选入中央执行委员会。1931年，工商部与农矿部合并而为实业部，孔仍任部长。1931年冬，蒋介石为了安抚反对派而短期下野，作为蒋介石的心腹和姻亲的孔祥熙也辞职了。

1932年4月，派孔祥熙为特使去欧洲考察实业。他的最主要任务之一是为发展国防体系争取外援。孔祥熙在意大利时，墨索里尼答应他出售飞机和派遣技术人员加强中国空军。抚州创办中央航空学校，南昌创办飞机厂都是这次谈判的结果。他又去德国和捷克购买军火并聘用顾问，他又去英国，与财政家商谈中国的财经改革。

1933年4月，孔祥熙回国，任中央银行总裁，10月，任财政部长并一度在汪精卫任内任行政院副院长，他就此担任了他的姻亲宋子文从1926年以来所担任的最高财政职务，立即开始为国民政府对现代经济部门加强财政控制并制订全面计划。

1934年，他在南京召开全国财政会议，处理当时全国存在七千多种地方税所引起的问题。此次会议及此后三年所采取行动的结果，在1937年中日战争开始时已有二十五个省份取消了地方税。他还在主要的半官方的银行中增加官股比重。增资的各银行为：中央银行（由二千万增为一亿元），中国银行（由二千万增为四千万），交通银行（由一千二百万元增为二千万）。增加官股的目的是支持国库发行公债及放款和增加政府控制信贷的能力。孔祥熙的这一措施受到与中国银行、交通银行有联系的私家银行的批评，它们是早在国民政府成立前就已存在，并以它们的财政可靠性和判断独立性而自豪。

以上措施为1935年11月的币制改革准备了条件，国民政府放弃银本位而改用管理纸币。这一改革首先须实行白银国有并废止银圆流通和设立外汇储备。美国收购白银的计划，国民政府的国防要求和对中国合法标准货币的需要促进

了这一改革。美国收购白银的计划加剧了中国的萧条，并造成大量白银向国外私运。国民政府颁布白银出口税和平衡税，但未能生效。此外，中国仍然没有一个标准合法的货币。虽然在这一方面有了一些进展，但不少省份和地区仍通行本地货币，尤以西南、西北地区为甚。称为法币的新币制自1935年11月3日实行。银元持有人需兑换新币，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农民银行等四行的纸币为交纳赋税的法定货币。中央银行成为一家储备银行，负责维持本国币制和外汇的稳定。中国货币与外汇的兑换率规定为法币一百元对美元三十三元。币制改革就其长远的效果来说虽然是一个议论纷纭的题目，但它加强了国民政府的经济地位，中日战争初期未曾出现严重的通货膨胀，建立了不依赖列强的本国银行体系。1936年，陈光甫率领白银代表团议定了由美国收购七千五百万英两白银。孔祥熙本人还把祥记公司及经销的亚细亚火油公司的资财共计二万五千磅按法定价格兑换成法币以增加新币的信用。

1935年12月，汪精卫被刺受伤，蒋介石继任行政院长。孔祥熙在行政院内任职，并在西安事变期间由中央政治会议派他在南京主持政局。在此期间，何应钦主持军事，主张讨伐西安，孔祥熙等人加以劝阻，认为此举会危及蒋介石的生命。经西安谈判，12月25日蒋介石获得释放，国共建立了抗日统一战线。

1937年4月，孔祥熙为国民政府特使率代表团参加英皇乔治六世加冕典礼，但此行的主要目的是从欧美获取作战物资和财政援助。孔祥熙率领的代表团的秘书长是国防顾问委员会秘书长翁文灏。孔祥熙到英国后与英国官员进行商谈，并参加了5月11日的加冕礼。他在法、比、德诸国作短暂逗留后去美国，和罗斯福总统及赫尔国务卿，讨论了中国的财政要求。他还接受了耶鲁大学为他在教育和财政工作上的成就而授予的名誉学位。

1937年7月中日战争爆发后，他去欧洲由兵工署长俞大维协助重新试图取得军火的供应。10月以前，他大部份时间都在德、意两国。德国曾在三十年代初派出若干人员为蒋介石训练军队，一直到1938年还有军事顾问团在中国，尽管德国已于1936年11月与日本签订了反共协定。

孔祥熙回国后，采取了一系列紧急财政管制，限制私人提取银行存款以防

止资本外逃。他在四行联合办事处下设立了特别贷款委员会和农产、工矿、外贸调整委员会以支持政府的经济发展。工矿委员会负责把沿海工厂迁入内地，外贸委员会管理桐油，猪鬃，茶叶、丝及其他土产等主要出口品。

1938年蒋介石辞去行政院长以便集中精力于军事。孔祥熙继任，以张嘉璈为交通部长，翁文灏为经济部长，陈立夫为教育部长。此外，中日战争促进了工合运动。这个主张，最先出现在1938年春英国大使卡尔在上海的一次谈话，他向宋美龄提出个人建议。由于英国大使的关心，孔祥熙为工合运动拨款五百万元。1938年8月5日，工合协会在汉口成立，孔祥熙任董事长。此后几年，工合运动在西北各省迅速发展。宋美龄和孔祥熙的影响和声望，对早期的工合运动特别起作用，这一运动在战争年代中一直不断扩展。

蒋介石于1939年12月11日名义上任行政院长，孔祥熙作为他的代理人任副院长直到1944年秋。在此期间他还任中美文化关系协会会长，陈立夫为副会长。作为财政部长，负责管制外汇及争取西方各国的贷款以支持抗战。其他财政专家如宋子文，陈光甫等人对中国的战时财政计划也起很大作用。1939年2月，美国同意以出口桐油为抵押给与贷款二千五百万美元，1940年4月，第二项协定以云南锡出口为抵押提供贷款二千万美元。第三项协定以出口钨换取贷款二千万百万美元。1940年4月，美英政府分别给中央银行以五千万美元，五百万英镑贷款。这些贷款和中国各银行认捐之款由中英美平准基金委员会经管，主席陈光甫。美国对日作战后，1942年2月，经孔祥熙之谈判，美国给与中国贷款五亿美元。7月，又取得英国五千万英镑贷款。美国的贷款一部份用来从美国购进金条以维持法币。

1943年11月1日，在重庆举行孔祥熙任财政部长十周年纪念会。这件事引起国际的注意，因为在国民政府中任部长一级的职务至十年之久，除孔祥熙之外，别无他人。五百多名政府官员和孔祥熙的朋友参加了庆祝会，现任国民政府主席的蒋介石，西方知名人士有美国陆军部长史汀生发来贺电，重要的报纸如大公报虽经常批评孔祥熙的政策和行为，也对他的成就加以赞扬。

1944年6月，孔祥熙作为中国代表团团长去美国参加在新罕布什尔州的布雷顿森林举行的联合国货币与金融会议。冀朝鼎随行担任孔祥熙的个人助理和参

加该会议的中国代表团秘书长。孔祥熙代表蒋介石与罗斯福在华盛顿会晤三次。

1945年5月，行政院改组，1944年11月后任代院长的宋子文改任行政院长，财政部长。7月，孔祥熙退出政界，战争结束后，住在上海。1947年春一度去华北，视察铭贤学校，该校曾迁于四川金堂数年，此时全部教职员工迁回太谷。1948年初，当国共内战达到紧急的时刻之前，孔祥熙因他的妻子生病一起去美国。以后，他在台湾短暂逗留，1966年12月又去美国，定居在纽约州长岛的新洛喀斯特，1967年8月15日死去。孔祥熙和宋霭龄有子女四人：洛沙曼（令仪）生在太谷，大卫（令侃）珍妮特（令俊）、路易斯（令杰）生在上海。孔令侃后来成了战时的采购机构中央信托局局长，1948年，他的表兄蒋经国任上海经济督察专员，下令逮捕孔令侃，宋美龄出来干预，把孔令侃送到香港。孔令杰曾在宋美龄于1943年到美国去时任她的秘书长。

从孔祥熙的全部经历来看，他是一个毁誉交加的人物。单就他的个人财富而论，就已足以使他处于被国内外议论的地位。例如共产党发言人陈伯达公开谴责他和宋家及蒋介石的关系，他之所以能取得显赫地位是由他的姻亲关系，这是公认的看法。经济学家则对他的币制改革是挽救了中国经济还是造成战后的通货膨胀而使中国经济崩溃还有争论。不管孔祥熙的财政和政治方面的活动是多么众说纷纭，但对他在较少为人注意的教育方面的活动，则认为他是把教育看作为社会进步工具的一个反映。孔祥熙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曾一度担任过基督教青年会干事，他是许多基督教会的朋友和支持者。他多年来对他在太谷创办的学校与以经济上的支持保持密切关系。他对协和大学的身燕京大学的事务也很关心，多年任该校董事长，1937年6月18日任该校校长。中日战争使孔祥熙的责任加重，校务长司徒雷登担任了校长职务。该大学被迫关闭后，1942年2月，孔祥熙主持燕京前任及现任董事开会商议决定迁往四川成都开学，梅贻宝在成都任代校务长兼代校长之职。1946年，燕京在北平复校，孔祥熙继续任董事长到1949年。

瑜亮写的《孔祥熙》一书是推崇他的一本传记，1955年于香港出版，其英文译本由欧柏林山西分校（即铭贤学校）校友会于1957年在美国出版，杨约瑟

的《1937—1945年中国援及其手》一书于1963年出版，偏重孔祥熙任战时财政部长的业务上的资料。

孔 德 成

字：达生

孔德成（1920，2.22—），孔子第七十七代后裔。学者，在国民政府中任奉祀官。1950—1963年在台湾任故宫博物院、中央博物院联合管理处主任。

孔子第七十七代后裔孔德成，出生在山东曲阜，他出生前三个月，父亲孔令贻死去，孔令贻只有二个女儿，而没有继承衍圣公封号的儿子，当时，他妻子王氏怀孕在身，是否能继承九百年来的衍圣公之位，要看遗腹子是否男姓。北京政府总统徐世昌特派山东省长屈映光前去察视。孔德成的出生乃成了全城庆贺的大事。他出生后十七日，他母亲死去，由孔令贻的妻妾陶氏抚养。按照旧例，这个年幼的衍圣公在私塾受业。1929年，抚养他的继母死后，由他最好的老师王子英负教养之责。后来，又从吕今山受业。他的教育，只是习读经书典籍，因此，当孔德成童年时在中国出现的文学、文化和政治上的大变动，对他毫无影响。

1934年3月，蒋介石提倡新生活运动恢复中国传统道德以加强道德上的改革。5月31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定9月28日为孔子诞辰，在全国举行纪念仪式时，国民政府派叶楚傖去曲阜致祭。9月，又以《礼记》《礼运》篇的《大同》一节谱成纪念孔子的正式歌曲。1935年春的复孔活动，直接影响到孔德成的经历。当国民政府废除了孔德成的世袭封号而另授以主持祭祀至圣先师孔子的新官职时，他的生活直接受到1935年春恢复尊孔的影响。7月8日，孔德成年仅十五岁，在南京就任奉祀官新职。

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后，孔德成随同国民政府迁往战时首都重庆，在国民参政会任职。他在重庆接触现代教育，专心学习并和学者们讨论。他废信佛

教，反对以儒家思想当作一种宗教。战争结束后，1946年5月，他随国民政府迁回南京，又回到曲阜。1948年，政府特以公费送他去美国游学，在纽黑文担任耶鲁大学荣誉研究员。1949年3月回国，在广州、香港、澳门奉教育部长杭立武之命发表反共演说，呼吁国民恢复儒家的传统道德精神。

1950年，孔德成去台湾，在国立台湾大学，省立台湾师范大学，省立台湾中兴大学教书，并任故宫博物院，中央博物馆联合办事处主任委员，还写了一本《礼记释义》，又研究殷周铜器的铭文，继续作为奉记官主持祭孔大典。1957年，他应日本道德科学研究所之请作了一系列讲演，受到日本人的极大尊重而授他以东京都荣誉市民称号。翌年，他应南越孔学会之请去南越在西贡等处讲演。他与南越总统吴廷艳讨论恢复儒家道德和加强反共精神。1959年，他接受南朝鲜汉城成均馆大学名誉学位，并会见了南朝鲜总统李承晚。1961—1962，由孔德成保管的中国古代文物在华盛顿，纽约，芝加哥、旧金山展出。1963年，他曾请辞故宫博物院中央博物馆联合办事处主任委员之职而教育部未予同意。

孔德成和清代学者官吏孙家鼐的曾孙女结婚，生有二个女儿维鄂、维睐，及二个儿子，维益、维宁。

郭沫若

原名：郭开贞

笔名：鼎堂

石沱

杜衍

麦克昂

易坎人

郭沫若(1892.11.16)，诗人，剧作家，小说家，散文家，翻译家，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创造社领导人，共产主义宣传家。1949年后，这位多才多艺的知识分子任全国作家艺术家协会主席，中国科学院院长。

郭沫若四川乐山人，出生在一个商人地主家庭，1897—1905年受中国古

籍的传统教育准备应科举考试。1905年科举取消，嘉定创办了新式学校，1906—1909年郭沫若在那里上学。他后来在成都受完了中等教育。1914年，郭沫若二十二岁时到日本进了东京第一高等学校预备班，不久结识了张资平、郁达夫，后来与他们共同成立创造社。

1915年，郭沫若进冈山第六高等学校医预科。1916年夏，他到东京一所美国教会医院探望生病的朋友，在医院里遇见了一名仙台的日本基督教传教士的女儿佐藤富子。郭沫若回冈山后，经常热情通信，12月，佐藤到冈山去找郭沫若。由于郭沫若于1912年春已由家庭包办成婚，他怕触怒父母不敢提出与国内妻子离婚，因此他与佐藤未举行结婚仪式而同居，生了五个孩子。

郭沫若除学医外，又研究十六世纪理学家王阳明和孟加拉诗人泰戈尔的作品。1917—1918年，他对歌德、斯宾诺莎的著作很感兴趣，自称是一个泛神论者，并认为这是王阳明、泰戈尔、歌德、斯宾诺莎所共有的哲理。1918年，他在第六高等学校毕业后，进了福冈九州帝大医学院。

1919年初秋，郭沫若的诗在上海《时事新报》文学副刊上发表。他得意地第一次见到自己的诗印出发表激发了他对诗的创作热情。这时，他读了惠特曼的诗而倾心，他的最有名诗篇是在1920年这个狂热写诗活动时期写出的。

1921年4月，他突然离校和他的同学成仿吾到上海。经成仿吾介绍，在大东书局编辑部工作。此后三个月中，他出了诗集《女神》，使他获得了盛名，他劝说大东书局的经理赵南公出版一个由郭沫若等人主编的文学刊物。7月，他回日本，与朋友张资平，郁达夫，田汉等人成立了“创造社”。

1922—1924年之间，郭沫若等人创办并编辑《创造季刊》、《创造周报》《创造日报》。通过这些刊物在中国宣传浪漫主义和“为艺术而艺术”的观点。1923年秋间，社内个人摩擦动摇了创造社的基础。1924年4月出版的最后一期《创造周刊》标志了“创造社”的结束。在这期间，郭沫若除编辑工作和个人创作外，还翻译了歌德的《少年维特的烦恼》，《浮士德》的部份，《鲁拜集》，尼采的《查拉图斯屈拉如是说》以及一些美国、德国浪漫派诗人的作品。他还把一些中国古诗译成白话。

1921—1924年间，郭沫若多次来往于福冈与上海之间。他在九州帝国大学

继续学医的学年中也为“创造社”写出了许多作品。他在暑假期间去上海为大东书局工作。1923年4月，他从医学院毕业后，全家来到上海。他的妻子和孩子们很不愿意住在中国，尤其因为郭沫若不肯开业行医，他的妻子更为不满。1924年2月，他妻子不管郭沫若是否同行，坚持要带孩子回日本。郭沫若将他们送走，答应他们把“创造社”的事务料理结束后再去日本找他们。

1924年4月，郭沫若回到日本，翻译日本的马克思主义者河上肇的《社会组织和社会革命》。到5月底，他宣布了对马列主义的信仰。他并不排斥浪漫主义，而把它说成具有共产主义的未来理想境界的特点。7、8月间，他翻译了屠格涅夫的《处女地》。他后来声称这两本书使他下决心回国推动社会革命事业。这时武昌师范学院聘他任文科教职，更增强了他这一决心。8月底因江浙战争发生，待战争结束，他才回国。以后，他写了一本很有名的书信体的小说《落叶》，追忆他和佐藤富子最初几个月的恋爱。

1924年11月中，郭沫若一家到上海，住在公共租界。1921年起，他和“中华学艺社”建立了关系，1923年后，他是该社杂志《学艺》的两个主编之一。他又和“中华学艺社”在商务印书馆编辑部工作的一些人组成了一个小小团体“孤军社”有联系，伍光建是该社社长，他把河上肇的书介绍给郭沫若使他信仰了马克思主义。《孤军》主张温和的改良并主张恢复宪法。由于郭沫若在该社中有许多朋友，并且又劝说了大东出版公司发行该社的刊物《孤军》，因此也被接纳为社员。他力劝《孤军》杂志的同人，主张在中国实行国家资本主义的政策，他认为这也就是苏联新经济政策的方向。“中华学艺社”委派郭沫若成立筹备委员会以创立学艺大学。学艺大学于1925年秋开学，郭沫若任文学系主任。

1925年春，郭沫若翻译了高斯华绥的剧本《奋斗》及辛格的一些剧本，4月初，他在大夏大学每周授两次文学概论的课，这一讲座因五卅事件而终止。这一年的夏季，他用了很多时间，投身于因五卅事变而展开的全国抗议活动。他对马列主义，特别是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论的研究，以及以文学为政治的武器的活动与日俱增。

1925年9月《洪水》半月刊的发行标志着创造社的复活，这份杂志以及1926

6年3月出版的《创造月刊》的编辑大都由所谓少壮创造派如周全平，倪貽德等人所主编，他们仍得到郭沫若，成仿吾的指导和协助。

1925年的秋季学期，郭沫若在新成立的学艺大学任教。但这个大学办得并不成功，郭沫若在与董事会的一些主要负责人发生激烈争吵后辞职。是年冬，他被介绍与瞿秋白认识，瞿在和郭会面后不久去广州。1926年2月，郭沫若被聘去广州中山大学任文学系主任。后来他得悉系瞿秋白推荐，他以同时聘请郁达夫，王独清为条件而接受这一聘请，3月18日，他们三人一起去广州，3月23日到达。

1926年7月，北伐誓师前，郭沫若由邓演达的秘书孙炳文介绍在邓演达手下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宣传科长，7月底他离开广州，9月1日到达武昌。八天之后，邓演达派他到汉口设立总政治部指挥部。从9月9日起到10月10日攻克武昌这一期间，郭沫若实际上负责政治部工作。10月10日，指挥部迁往武昌。翌月，郭沫若升为政治部副主任，被委派去蒋介石的司令部所在地南昌筹设总政驻赣办事处。这一委派使郭沫若处于很微妙的地位：他支持武汉领导人的政策却又去南昌为蒋介石工作，当时武汉和南昌领导人的分裂即在眼前。1927年3月1日，蒋介石委任郭沫若为总司令行营政治部主任，但约定此一任命需待攻克南京、上海后发表。郭沫若在接受此一任命前曾密电武汉，并获准接受此一任命。3月6日，他随同政治部出发去前线，一直到了安庆，待蒋介石离安庆时，他把政治部的工作人员派往武汉，他自于3月30日回到南昌，住在朱德家中，用整天的时间写了一篇严厉斥责蒋介石的文章《请看今日之蒋介石》，称蒋介石为反革命分子，要求将他处死。这篇文章的发表很可能是蒋介石4月12日决定清除共产党的原因。

4月中旬，郭沫若回到武汉。6月10日到13日，他曾参加武汉领导人和冯玉祥在郑州举行的会议，但这次会议未能取得成果。不久，郭沫若任张发奎第二方面军政治部主任。8月1日，南昌起义，这一日期后来定为中国共产党的建军纪念日。起义部队把郭沫若和张发奎列入革命委员会名单中，那时，他们都在九江。8月3日，张发奎要郭沫若解散政治部，而去担任他的私人秘书。郭沫若允诺解散政治部并要求去南昌。张发奎同意其离去，但要求他将张发奎的名字

从革命委员会的名单中取消。郭沫若于8月4日到南昌，任革命委员会总政治部主任。此时，张发奎集结军队对起义军进行镇压。8月5日，共党军队撤离南昌向南方进军。9月，郭参加在汕头的战斗未获成功，10月的前三个星期躲藏在山中。回到上海后，全家匿居在公共租界里。

1927年11月，郭沫若筹划恢复创造社，争取鲁迅的合作复刊《创造周刊》，他请郑伯奇与蒋光慈前去与鲁迅商谈取得了暂时协议，但当时成仿吾随同一批青年激进分子由日本回国，反对与鲁迅合作，因此暂时协议又落空了。1928年1月，这一批青年人出版了几种新杂志，号召创立无产阶级文学，并评击鲁迅，认为他过于保守。

郭沫若因国民政府悬赏购其首级，不能再在上海逗留。1927年底，他曾准备去苏联，但因患伤寒住院治疗一个月。后来，他决定去日本，此项决定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批准。在他养病期间，周恩来曾到他家探视。1928年2月，郭沫若和他全家分乘两艘船去日本。

此后十年中，郭沫若一家住在东京东郊的市川，他用大部分时间研究中国古代历史和古文字学，1930年出版了引起争论的一本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写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第二年又出版了《甲骨文字研究》，他对青铜器铭文的研究也作出了重要贡献。他在日本的十年间，写了大约有十五种左右的学术著作，七本自传性著作，以及另一些学术论文、短篇小说和专题论文。他又翻译了三篇辛克莱的小说，一本《德国考古学史》，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德意志意识形态》，以及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的一部份。

1936年6月，郭沫若加入了作家协会。在此后几个月中，他在“国防文学”这一口号的争论中起重要作用。1936年10月，他列名于二十一人签名的团结宣言上结束了这次争论。

1936年11月，郁达夫到东京与郭沫若重叙友谊。郁达夫愿意为郭沫若回国创造条件。1937年春，郁达夫劝说张群、钱大钧、邵力子、何廉等重要人物向蒋介石为郭沫若说项。5月，郁达夫告知郭沫若可以回国，7月27日，郭沫若回到上海，他的妻儿仍留在日本。

1937年8月，郭沫若的名字从国民政府敌对分子的名单中取消，从事抗日

宣传工作，帮助出版一份颇有影响的左翼报纸《救亡日报》。9月底，他到南京，经蒋介石接见，蒋邀他留在南京并授以职位，郭拒而未受，但同意继续写文章作抗日宣传，然后回到上海。

1937年11月12日，上海被日军占领，郭沫若避住法租界，11月27日，他逃往一艘开往香港的法国轮船上，与他同行的有何香凝，邹韬奋。12月中旬，他从香港到广州，设法为《救亡日报》争取财政上的支援。广州市长曾养甫，广东省主席吴铁城均未应允，但余汉谋却给予了支援。1938年1月1日《救亡日报》复刊。

1938年1月，应陈诚电邀，郭沫若去汉口，陈诚筹建军事委员会政治部，自任主任，而以周恩来，黄琪翔为副主任，郭沫若为第三厅厅长。他在长沙考虑这一任命，2月28日到汉口就任，准备在4月1日开始该厅的工作。约在此时，他和于立群建立了家庭。于立群是他在东京认识的一位新闻记者的妹妹，1937年回上海后相识。

1938年10月，武汉沦入日军之手，政治部撤往长沙。11月13日，郭沫若目睹长沙为大火所毁，因忙于救灾工作，未能与政治部一起于12月3日去桂林。月底，他与于立群一起飞往重庆，他们在重庆一直住到1946年春。

早在1939年，郭沫若部下的工作人员受到裁减，1940年秋，国民政府决定把一些激进分子从重要工作岗位上撤掉，郭沫若的原职由黄少谷继任，仅仅担任了一个文化委员会主任的空衔。因此，他能在一个较舒适的环境中从事他兴趣所及的工作。1945年3月30日，文化委员会被解散。

1942年到1943年间，郭沫若写了五部历史剧本，其中最著名的是《屈原》，他对这一位闻名的古代诗人的生平作了想像丰富的重新创造和说明。郭沫若还在他的学术论文和屈原诗篇的白话译文中显示出他对屈原的景仰。1943年到1945年间，他对古代中国文化史又作了批判性的重新评价，1945年出版了《青铜时代》、《十批判书》，这是他最重要并有影响的著作。

1945年5月，郭沫若应邀参加于6月16日到28日在莫斯科，列宁格勒举行的俄国科学院庆祝会。他于6月9日离开重庆，6月26日到列宁格勒。他大部份时间留在莫斯科曾去斯大林格勒、塔什干和撒马尔罕等地访问。8月16日，他与

去苏联参加8月14日签订中苏友好条约的代表团一同回重庆。

1946年1月，郭沫若作为九名无党派代表之一参加了政协会议。2月10日，他和另两名讲话者在一次说明此次会议成就的群众集会中因骚乱而受伤。6月底，他参加在南京的第三势力以谋国共双方达成协议。7月，和谈破裂，他开始写反美的宣传文章。1947年，他又从事学术著述，并准备修订他早年著作。同年冬，他迁居香港，开始写一些自传性篇章。1948年11月24日，他离香港去石家庄投向中国共产党。

1949年3月22日，华北文艺工作委员会和华北文艺界协会在北京举行茶会，郭沫若出席并建议组织全国的文艺工作者组织。他的建议获得一致同意，并成立了以郭沫若为首的筹备委员会。7月，在北京召开全国文艺工作者大会成立了全国文艺工作者联合会，郭沫若任主席，9月，郭沫若选入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后，郭沫若任政务院副总理，文教委员会主任，科学院院长，这是他长期为共产党工作所得的荣誉。但据说郭沫若在1966年文化大革命期间被撤掉了职位，他宣称他因未能理解毛泽东思想，他的著作应加烧毁。

郭 秉 文

字，鸿声

郭秉文（1880—），教育家，曾担任东南大学校长，美国的中国研究所所长。1930年后，曾任国民政府贸易、财政各种职务。1944—1947年，任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副署长，主任秘书。

郭秉文原籍上海，1893—1896年在上海罗利学院读书，接受了西式教育，毕业后，在该校教书一年，此后在上海、嘉兴、杭州等地的海关，邮政局工作。

1906年，郭秉文离国去美国留学，在俄亥俄州伍斯特学院专修科学，1911年毕业，获得哲学学士学位，1912年获得哥伦比亚大学硕士，1914年获哲学博士学位，1915年，师范学院出版了他的学位论文《中国教育制度沿革史》。

郭秉文是一名活跃的学生领袖，1908—1909年任《中国学生月刊》编辑，

1909—1910年任《伍斯特之声》的编辑,1911—1912年任中国学生联合秘书长。他是一名出色的学者,当选获得美国优秀大学生的荣誉,并获得师范学院的利文斯通教育奖金。

1914年,他回国后,在商务印书馆任编辑,1915年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务主任,翌年,任罗利学院,浙江省立学院校长。1917年率领教育代表团去日本、菲律宾考察教育制度。以后,又任商务印书馆编辑及主任,编有二种英汉字典。

1918年,郭秉文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又率领代表团去欧美考察战后教育问题。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是国内知名的师范学校,其前身为1902年张之洞所创办的两江师范学堂,培养初级、中级师资,是国内首创的师范学校。1914年,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在原两江师范学堂旧址创办,郭秉文任校长期间,学生名额由最初的126人增加到416人。

1920年,在郭秉文领导下的学校当局建议成立一所国立大学,这一建议,获得蔡元培等教育界著名人物的支持,呈请北京教育部考虑。教育部长范源濂同意后又得内阁批准。1920年12月6日东南大学筹备处开始办公,次年7月,教育部批准了该大学的组织条例,上海商学院为该大学的一个组成部分,8月,举行招生考试,9月,任命郭秉文为东南大学,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两校同在一校址,后者于1923年并入大学。

1918年到1925年之间,公共教育及国立大学的经费经常拖欠,郭秉文幸有江苏督军齐燮元对本省教育事业的支持,因此,东南大学的经费比北京政府所辖的其它大学远为稳定。这种情况归功于郭秉文善于应付当时的政治局势,他与本省当局、北京政府及教育界重要人物建立了友好关系。但他在政治上的随和态度,却惹起了该校国民党人士、教授和杨铨的反对,掀起了驱逐校长郭秉文的运动。

1924年,郭秉文任中华教育文化基金第一届董事会董事,该基金系来自美国退回的庚子赔款,郭秉文任职到1927年,他又建议在美国设立中国研究所,以便资助在美国各大学的中国留学生,并藉以沟通中美的文化交流。1925年,研究所成立,郭秉文辞去东南大学校长,任该所主任到1930年。1928年到1930

年之间，国民政府派他为驻欧美特派员。

1931年郭秉文回国后，任上海信托公司经理，实业银行经理，中央信托局储蓄会监事等职一直到1937年。1931年、1936年任工商部国际贸易局局长，1932年任海关总署署长，又当选为泛太平洋学会主席，国际事务研究所所长。

1938—1944年，他在伦敦任中英贸易协会主任，驻英大使馆商务参赞，他当时为争取对华的经济援助起了重要作用，1944年，任命他为财政部次长(缺席)。

1943年，他率领代表团去美国弗吉尼亚州的霍特斯普林斯召开的联合国粮食与农业会议，及华盛顿召开的联合国币制预备会议。他是孔祥熙率领的中国代表团成员，于1944年出席在新罕布什尔的勃雷顿森林区召开的联合国货币财政会议。

1944—1947年，郭秉文任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副署长，主任秘书，驻留美国。1947年后，他以中国留学生顾问及中美文化交流赞助人而居留于华盛顿。1957年，任“在美教育文化事业顾问委员会”主任委员。

郭 泰 祺

字：复初

郭泰祺(1889—1952、2、29)，政府官员，以1931—41年出使英国而闻名的外交家。1932—1938年任国际联盟的代表，1941年到1946年间，在重庆负责制订对外政策。1946—1947年任联合国的代表，1947—1949年任驻巴西大使，以后退休居住在加利福尼亚。

郭泰祺出生在湖北武穴，是一名著名学者的儿子，他受了中国典籍的初步教育之后进了武昌的一家新式学校。1904年由政府遣派去美国留学。1904年秋到1907年夏，他进了马萨诸塞州汉普顿中学，1907—1908学年，进了该地威里斯顿学校。他读完高中后，进宾夕法尼亚大学，专修政治学。1911年3月当选获得美国优秀大学生的荣誉，同年6月，获得奖学金进研究生院学社会学。他在费城的社会生活极为活跃，参加了文艺爱好会和宇宙俱乐部等团体，1911年他曾担任《费城新闻》的记者数月，后又任学生报纸《宾夕法尼亚》的编辑。

当他获悉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的消息后，即于1912年3月离美回国，担任原湖北都督后被举为临时民国政府副总统黎元洪的秘书。黎元洪于1913年12月前一直在武昌，那时袁世凯的势力已超过了他，在北京行使政府职权，郭泰祺陪同黎元洪去北京仍在他手下任职。1916年6月7日，黎元洪任总统，郭泰祺充任总统府英文秘书、主任、外交部参事。1917年7月，黎元洪被迫退位，郭泰祺去广州任孙中山大元帅府参事。郭泰祺曾于1912年国民党成立时加入了国民党。

1918年夏，郭泰祺、陈友仁、王正廷被派去美国，争取美国对广州等政府的支持，但未成功。翌年，郭泰祺任南方政府代表团技术专员由伍朝枢率领出席巴黎和会，1920年初，他经美国回国。

1921年5月，孙中山由上海去广州任非常大总统，郭泰祺任总统府参事兼宣传局长。1922年4月，当伍廷芳继抗命的陈炯明为广东省长时，郭泰祺任政务厅长，6月16日，陈炯明发动政变，郭泰祺逃离广州，但于1923年初又返回，在伍朝枢手下任外交部次长。1925年7月广州成立国民政府，胡汉民任外交部长，郭泰祺辞职，去武汉任商科大学校长。

国民党分裂为两派，蒋介石在南京成立政府，与武汉的汪精卫政府对峙，郭泰祺去上海在蒋介石属下任江苏省交涉员，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上海分会委员，不久又在伍朝枢手下任外交部次长，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上海办事处国际组主任。他对一个外国大国的态度在1927年12月任中苏交涉委员会主席时表示得很明显：他立刻清理苏联在上海的商务财产，命令上海俄侨必须登记。伍朝枢于1927年底辞职，郭泰祺代部长。1928年2月，黄郛继任外交部长时，免去了郭泰祺的党政各职。

1928年秋，新的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郭泰祺在立法院任职。1929年任驻意大利公使，但未到任。1930年加入冯玉祥、阎锡山的所谓北方联盟，参加所谓扩大会议运动，扩大会议失败，他去南方。1931年，他加入了汪精卫、唐绍仪、陈济棠等人所组织的广州分裂政府。

1932年1月，汪精卫任行政院长，罗文干任外交部长，郭泰祺任外交部政务次长兼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委员。郭泰祺任外交部职务时，中日在上海发生冲突，3月，郭泰祺以国民政府首席代表身份谈判停战协定。郭泰祺因不赞同

罗文幹的对日方针，请辞外交部职务。

1932年4月，郭泰祺出任驻英公使，但应国民政府之请，在继任者未就职前仍留任外交部政务次长。5月3日，传说停战协定对日本有利，上海的一个“救亡”团体猛烈攻击郭泰祺并加以殴打，因此结束中日争端的停战协定是5月5日在医院中签订的。郭泰祺伤愈后于1932年夏去英国。他除任驻英公使外，兼任国联中国代表到1938年。他在1933年日本退出国联前后，经常提出日本侵略中国的问题，并奋力反对承认满洲国。他在1933年5月伦敦召开的世界经济货币会议中重申对日本的指控，呼吁英美联合行动支援中国，同月，伦敦公使馆升格为大使馆，5月22日郭泰祺成为第一任驻英大使，此后几个月中，他出席日内瓦裁军会议中国代表。1934年任国联大会中国代表，1936年任国联理事会首席中国代表。郭泰祺在1927年曾竭力反对中苏合作，但由于国际政治形势的改变，欢迎苏联于1934年加入国联，他说，中国是“亚洲的基石”，而苏联则是欧亚之间的桥梁。

1937年7月中日战争爆发后，郭泰祺和顾维钧努力争取国外的援助。他们呼吁国联的支持，并参加1937年华盛顿条约国的布鲁塞尔会议，要求对日本进行经济制裁但未有反应。英国对中日战争并不完全同情中国，1938年5月3日英日双方签订有关在日占区口岸海关税款交付的协定。5月6日，郭泰祺对此提出抗议，此协定从未能完全实施。1939年9月，英国发出一份较令人高兴的照会，宣称英国政府愿在和平到来时，与中国谈判取消治外法权并在平等的基础上修订条约。但在1939年8月，郭泰祺再次抗议天津英方当局允予将4月9日刺杀一名银行经理的四名嫌疑犯引渡给日本。郭泰祺对英国于1940年关闭滇缅路三个月一事也未能阻止，但在10月，该路重新开放后，他曾从英国取得几笔货款。

1941年4月，重庆国民政府任郭泰祺为外交部长而以顾维均为驻英大使。郭泰祺驻英九年成绩显著，牛津大学因此于1938年赠予名誉博士学位。郭泰祺经美国回国，曾在美国呼吁对华援助，1941年5月的一次换文中，国务卿赫尔拒绝郭泰祺的各项政策建议，但允诺在和平到来之时取消美国在华的治外法权。7月，郭泰祺在重庆就职后，又任国防最高委员会常务委员。郭泰祺竭力阻止外国对汪精卫伪政府的承认，与已承认该伪政府的国家断交，支持大西洋

公约，并与捷克流亡政府建交。1941年12月，日军袭击珍珠港，中国对日、德、意宣战，强调盟国的相互责任。12月底，宋子文任外交部长，郭泰祺任国防最高委员会外交委员会主任委员。由于宋子文大部分时间在美国，因此郭泰祺对外交政策的制订负很大责任。

1946年2月，郭泰祺任联合国安理会中国代表，3月中至4月中，任安理会主席，又任联合国原子能委员会委员，6月，宾夕法尼亚大学赠予法学博士。1947年3月，任联合国常规军备委员会委员。12月辞去该职，出任驻巴西大使。1949年中国共产党取得政权后，郭泰祺离开里约热内卢，退隐于圣巴巴拉，1952年2月29日在长期患病后死于该地。

劳 乃 宣

字：季瑄

号：玉初

劳乃宣（1843年—1921.7.21）政府官吏，理学家，史学家，以对义和团运动起源的学术论述而闻名。

劳乃宣的原籍，一般都称之为浙江桐乡，事实上，他祖父在世时，一家住在江苏苏州，而劳乃宣又是出生在他外祖父家里，那时他外祖父沈西雍是河北广平知府，他一出生就过继给他叔父劳功甫（译音），1846年前，他家住在广平，以后去南方依其舅父，那时他舅父是江苏吴江知县。1848—1850年，他随舅父去无锡。

1851年，劳乃宣的父亲劳勋成任江宁布政司仓大使，1853年太平天国时，他家逃往苏州，1856年他父亲在清军刘存厚处供职，被太平军击败，刘战死，他父亲投江自尽未果，被救后不久死去。因有功于清廷，其子荫封为监生，因长子应试中举，劳乃宣得以袭荫。

1860年，太平军攻克苏州，劳乃宣一家逃往泰州舅家。翌年，劳乃宣与曲阜孔子后代的孔家女子订婚，自此开始究心于宋儒理学。1863年，劳乃宣去曲阜一直住到1865年，是年去杭州应试，1868年中举人，1871年中进士。

1873年，直隶总督李鸿章主持编纂《畿辅通志》，劳乃宣应邀去保定参加

编修，他全家在保居住数年。

1887年，一个王府的家奴在北京附近强佔村民田地，宣称土地系王府产业。诉讼多年，村民多人被胆小怕事的地方官下入狱中。省藩司派劳乃宣前去会同地方官审理。他们将案情申请，惩办家奴，并禀报上司建议在省级衙门彻底审问。上司对此建议未予置理。此案按和解办法处理，减轻村民的佃租并豁免旧债。1879年，劳乃宣代理山海关附近的临榆县知县，他对教育事业的办法，精力和兴趣表现突出。1880年任期满后，当时曾国荃在中俄伊犁冲突期间率军至山海关增强边防，聘劳乃宣为幕僚。曾国荃于1881年春撤军后，劳乃宣于1882年初就任直隶南皮知县，剿平了多年为害的地方匪帮。

1882年，劳乃宣的母亲去世，劳乃宣离职守制。是年秋，天津海关道周馥聘劳乃宣入幕主持交涉事务，他去天津，1884年调任完县知县，1888年调蠡县，这一年他的妻子去世，后又调吴桥。1895年因病离职，一年之后，任清苑知县，兼理保定府同知。

1898年夏劳乃宣再任吴桥知县，他初次与义和团交手，经他研究，认为义和团源于嘉庆初年被血腥镇压的白莲教余部八卦教。1899年，劳乃宣以其研究所得写了一篇《义和拳教门源流考》，他把这本书分发给他治下的各地区并布告禁止义和团的活动。是年冬，山东德州义和团进入吴桥煽动暴民进行骚乱，教堂一座及教民的住屋六所遭毁，死亡一人。劳乃宣立即派兵镇压，俘获义和团二千余人。1900年1月5日，义和团数百人进袭吴桥，劳乃宣的军队轻而易举地打败了他们，杀死九名，俘获二十名，其中一名系义和团的二师兄，劳乃宣为揭破义和团刀枪不入的谎言当众鞭笞并将义和团处死。他又责令义和团家属赔偿教堂及教民损失。劳乃宣把他的著作呈送上级并提出根除这种狂热迷信的方法。但是不幸清廷当政者和他的看法不同，他们想利用义和团驱逐洋人。劳乃宣遂辞职。朝廷任他为吏部主事，但他请假未到差。经呈请允予暂为请假。

1900年秋，劳乃宣回到苏州，不久应浙江巡抚恽祖翼之聘为其幕僚，同时，两湖总督张之洞亦请他而未就，1901年，劳乃宣，应张之洞再次邀请。正当他去湖北时，他接到山西巡抚岑春煊请准朝廷任用他的电报。劳乃宣称病，两处均未就。他在盛宣怀力请之下，勉强主持南洋公学（总理）两个月，然后去杭

州。当时，浙江省当局计划把杭州的一所旧式的求是书院改为新式学校。劳乃宣经浙江巡抚任道镕之清经办此事。1903年，浙江大学堂有六名学生因犯校规开除而引起了学生的示威，劳乃宣坚决加以压制。不久，他因病辞职，平平静静地住在桐乡。1904年9月，应署理两江总督李兴锐之聘去南京，一个月后，李兴锐死，周馥、端方相继任两江总督仍聘劳乃宣担任幕僚。

1907年12月1日，清廷召见劳乃宣，因病，允准延迟数月，1908年5月，劳乃宣到北京，慈禧在颐和园召见，受命为宪政编查馆参议兼内阁会议政务处提调。

1910年，劳乃宣以学识卓异列名于资政院，兼理藩院谘议官。1910年10月至1911年1月，劳乃宣参加讨论刑法草案，他认为有些条例，不合中国传统道德。有关讨论的文件，劳乃宣收编在《新刑律修正案汇录》中。

1910年7月，任劳乃宣为江宁提学使，但因宪政编查处之请仍留在北京，到1911年春才离开北京。同年夏视察苏北学校，9月辞职以便出席准备在10月举行的资政院会议草拟各省改革规章。当他到达北京时，辛亥革命已爆发，南京为民军占领，11月被任命为京师大学堂总监督，12月任学部副大臣，他听说清廷决定退位，这是他竭力反对的，因此辞去所任各职。

1913年11月，他应德国汉学家尉礼贤之请主持尊孔文社。该会系尉礼贤及在青岛德国租界的一些清朝遗老创办组成，他们两人对易经都有兴趣成为至友，劳乃宣著有《周易遵程》，尉礼贤将它译成德文，1924年在耶拿出版。

1914年日军占领青岛，劳乃宣去济南，又到了曲阜，该年初，他曾拒绝袁世凯邀他出任政府之职。他却公开要求袁世凯复辟清室，1917年7月张勋复辟，任劳乃宣为法部尚书，他以年老为理由的辞呈到达北京之前，张勋的复辟已失败了。劳乃宣因曲阜知县之劝，迁家到青岛。他与尉礼贤继续共同研究易经，同时因刘澂如之请编《皇朝续文献通考》，其内容主要包括1877—1911年这一时期。1921年7月21日，劳乃宣死于青岛家中。

劳乃宣是虔诚的程朱学派的儒家，他对清朝的学者，特别崇仰顾炎武，王夫之。他心目中的英雄人物则是曾国藩。他是清王朝的支持者，清朝覆灭后，他写了一篇《共和正解》，认为从历史上来看，共和并无民国的意义，只不过

是君主政体中的一个摄理国政的局面而已,接着,他想把这种意见呈送袁世凯,建议他在溥仪成年之后交还政权。

劳乃宣的教育方针,主张将宋代理学和近世科学技术知识相结合。他坚信政府和私人提倡并支持普及教育乃是强国之道。为了普及教育,他致力于用注音字母代替方块字。他采用王照所创北方官话的注音符号又加上一些南方各省方言的符号。1904—1906年,他去南京开办学校加以训练以求普及注音字母,他为此多次向清廷奏请采纳。

劳乃宣在中年时最热心研求的是数学,从1883年起到1900年,他至少写有七篇有关数学的文章对古代算书加以注释。他的杂著,包括书信,诗词,公文,由他的学生陆学普(译音)编收于1927年出版《桐乡劳先生遗稿》,他于1915到1920年自编《初龠老人自订年谱》于1922年末经修订原样出版。

雷 海 宗

字:伯伦

雷海宗(1902—1962.12.25),历史学家,他以中国历史的分期理论和中国古代文化的研究闻名。他从1932年在清华大学任教,1952年中央人民政府把他调到南开大学,一直到死。1957年在百花齐放的运动中,由于他公然批评共产党,而不准他讲授中国历史。

雷海宗出生在河北永清一个基督教学者家庭中,他在兄弟五人中居长。他的先辈中颇有一些在通州有名的人物,他父亲雷明夏(译音)是英国圣公会的牧师,在雷海宗出生前,他父亲被派在永清城外大王村任神职。他父亲与本地学者藏书家朱九丹为至友同住一地,雷海宗就在朱九丹家中初步接受了中国古籍教育,后来在永清存实学堂及北京崇德中学受正式教育,这两个都是英国圣公会办的学校。1919年进入清华预备学堂,1922年毕业,以后去美国,1924年毕业于芝加哥大学,1927年以论文《杜尔哥的政治思想》获得该校博士学位,他在著名的中古史专家詹姆斯·韦 汤普森门下进行研究。

1927年雷海宗回国后,在南京国立中央大学当历史学教授。1931年进武汉

大学，研究周朝征服殷商的历史，并确定其年代当在公元前1027年。他的结论为燕京大学洪煊莲及瑞典学者高本汉所同意。1932年，蒋廷黻请他到清华大学历史系任教，此后，他从欧洲史转而研究中国历史理论和中国古代史。他因教学的需要，编了七卷《中国通史选读》，在清华内部印行。1932—1937年间，他在《清华学报》、《社会科学》杂志上发表了几篇有关中国史分期，中国各朝帝位继承的规律、古代到中世纪的中国家族和氏族的演变、又以社会结构及风尚中国历代解释兵制。这些研究于1940修订出版为《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

雷海宗研究中国历史方法的核心是他的关于中国史分期的理论，他以哲学思想与宗教信仰为主要标准，把中国史分为两大周期，每一周期有五个阶段：第一个周期（公元前1300—公元383）的阶级为：（一）以祖先崇拜为基础的中国宗教（约在公元前1300—771年）；（二）由初创哲学的兴起到儒家思想的兴盛（公元前770—473年），以周王室的衰落，诸侯称霸和他们之间的势力均衡和封建秩序的日渐崩坏为特征；（三）由初创哲学趋于衰落分而成为“百家并起”（公元前473—221），随之而来的是“统一”国家的嬗变，士的消失，农奴的解放，普遍征兵制和长期的交战；（四）思想的混合和停滞时期（公元前221—公元88年）；（五）文化衰落时期（89—383年），该时期同时发生政治衰败，异族征服北方，佛教传入。中国历史的第二个周期，包括如下五个阶段：（一）佛教在中国生活与思想占统治地位（383—960年）；（二）理学兴起（960—1279年），（三）理学衰落成为各派之争（1279—1518年）；（四）初创哲学的消灭；校勘与考据的兴起（1528—1839年）；（五）中国传统文化与制度的衰亡及西方文化思想的普遍传播（1839年—），其情况类似第一周期的最末阶段。

雷海宗对中国传统的军队制度及社会结构变化的研究也与他的历史周期论有关。他认为战国及早期各帝国的大部分动力是由于施行自由平民的普遍征兵制所造成的。这种制度在后汉时废除后，中国军队遂由社会最底层征募来的新兵所组成。当兵成了一种洗刷不掉的社会耻辱。因为在中国历史第二个周期里国家曾数次全部或部分被异族征服，那时中国属于一种雷海宗所称的“无兵的文化”。

三十年代后，中日战争发生后，雷海宗随清华大学迁往长沙，后又迁往昆明，在那里清华与北大、南开两大学合并成为西南联合大学，1940年夏到1946年夏，雷海宗任联合大学历史系主任，教欧洲中世纪史和中国史。1940年，他和一名社会科学家林同济创办了以战国时代的史书《战国策》为名的双周刊，1941年，《战国策》曾在上海以月刊形式出版了几个月。不久，该刊停止单独发行而成了《大公报》的《战国》副刊。雷海宗关于中国历史的周期理论及其对中国文化的研究，通过这份刊物广泛影响读者。1946年，他和林同济选编了其中的一些文章出版为《文化形态史观》一书。

1946年夏，清华迁回北平旧址，他仍任历史系主任，1946—1947学年中，曾代理文学院院长。雷海宗一贯反对马克思主义，始终拥护国民政府，认为它是统一的力量。因此获得了国民党高级官员如朱家骅的重视。1948年，朱家骅任教育部长，请雷海宗创办一份新杂志《周论》，这份杂志在这一年中出版了四十四期。

1949年中国共产党全部控制了大陆之后，雷海宗仍留在北京。1952年，中央人民政府把他调到天津南开大学。雷海宗对新政权的唯一评论出现在他的几次关于土改的发言，他也对自己的过去作了检查。他声称他很难抛弃共产党以前的中国文化传统和西方教育的影响。百花齐放时期，鼓励知识分子说心里话，1957年4月14日，在一次天津地区教授集会中他发言了。他声称真正的社会科学只能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昌盛，马恩列斯的“新社会科学”只不过是“资产阶级”社会科学对工人阶级具体问题的应用。他接着说，自马克思主义及其左派从1895年恩格斯逝世后即受到思想僵化的影响，因此“新社会科学”已成为一种教条。最后，他竟对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古代“奴隶社会”论点的历史正确性提出挑战。官方对雷海宗攻击共产主义思想的反应是立刻加以谴责。他受到各报纸、学术刊物和一般刊物的批判。他虽被允许留在南开大学，但他的教学活动只限于外国史学史这一课程。

1962年12月25日，雷海宗因肾炎死去。遗有妻张景蕻，女儿雷崇立，她是北京大学英国文学讲师。

雷 鸣 远

原名：腓特烈·雷博

教名：万桑

雷鸣远(1877.8.19—1940.6.24)，又名万桑·雷博神父是比利时的天主教传教士，1927年入中国籍。从1901年到他死去时，一直致力于使礼拜仪式和教士的等级制中国化，他的口号是“中国归中国人，中国人归天主”。

雷鸣远生在比利时的根特，是一名比利时律师六个儿女中的最长一人。他的外祖父母是英裔，他的母亲皈信天主教。他在青年时就对中国有了兴趣，他在中学毕业典礼时，曾写过一个关于1840年在中国死难的天主教徒，普博莱的事迹的剧本，并在该剧中演重要角色。1895年12月，皈信遣使会，取教名为万桑。

1773年教皇克雷门特十四世解散耶稣会后，把在北京的传教事务委之于遣使会。1901年2月10日，这个比利时青年传教士启程来中国，于3月16日到上海。到达不久他见到印度巡捕殴打中国苦力，这种暴虐行为激起他立志改善中国人的命运。不久，他由上海到北京，10月28日任神职。

1902年，雷神父在大口屯王后甸、涿州等处开始传教工作。1906年他成为天津本堂神父。他很快就对中国的生活方式发生了深厚感情，努力吸收中国文化，他身穿中国式服装，留发辫、吸水烟，读四书，写得一笔好字，讲一口流利的天津方言。他提出改革礼拜仪式和教士的等级制度使之中国化，主张进教堂时双膝下跪，甚至建设采用儒家的“三跪九叩”，他的口号是“中国归中国人，中国人归天主”。他的这些建议，特别是有关任命中国的主教被他的许多教会同事视为荒诞不经。

1909年，雷神父在天津盐山创办了“传道会”，次年，又加入红十字会，创办法政学会，讲授社会学，并写了社会学讲义。1911年，他在天津成立了九个天主教传教中心，他又协助王知原等神父在山西洪洞创办“中华公教进行会”。由于雷神父的热情努力，这个组织在天津成立了总会。不久，又任原由

盐山天主教徒王尧华创办的《公教报》主编，以便增进天主教徒与非天主教徒的彼此了解，并将此报改名为《广益录》，后又改名为《广益报》。

1913年6月，雷神父去欧洲筹款，准备在天津办一所师范学校。1914年春，他带来所需的基金着手开办学校。他后来使用该校的毕业生办了七十多所小学。他对中国人民显示的关切日益多样化。1915年5月，中国政府接受日本的屈辱条约二十一条，他就在天津召集开会募捐使中国不要屈从此项协定。他还认为中国需要有一个宣传机构，以发表群众舆论，发扬爱国精神，因此于1915年双十节出版了《益世报》，这份报纸后来成为最有影响的报纸之一。

1916年，雷神父的活动与法国在华当局发生了冲突。10月18日，法国公使提出要求以天津老西开划入法租界，两天后即佔据该地。雷神父向政府官员打电报反对此种要求，并在天津《益世报》（即以前的《广益报》）北京《社会福利报》上发表事实真相。法国当局将他驱逐出天津，他先在正定后在河间当副堂。1917年3月，遣使会领导人对此事进行调查。3月25日，命雷神父去浙江嘉善暂住，一个月后，宁波主教雷诺派他为绍兴本堂神父。

自从1914年以来，万桑和他的朋友及支持者科达神父，以一系列札和上书要求改革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教方式，他们的有些建议刊载于教皇本笃十五世1919年11月30日发表的教谕中。1920年初，基白理安大主教在上海召集会议，宣布派雷神父和他一起回欧洲视察在欧洲的中国学生。4月14日，他到巴黎，他的上司指示他不要再为《益世报》写文章，并且不要去罗马。7月，枢机主教米歇尔看到万桑的报告，要求与他会见。8月，他们会见，万桑要求罗马教廷应当尽快地任命中国教士为主教的高级职位。12月16日，罗松枢机主教召他去罗马，并请他提出合适的任命人选候选人。他还向加斯培里说明派一名长期教廷代表的必要性，加斯培里是教廷的国务大臣，同意他的意见并安排他与教皇本笃十五世会见。1920年7月28日，教皇接见了雷神父，对他熟悉在中国的传教问题印象极深，并同意在条件成熟时就按照他的建议进行任命。

1921年1月27日，教皇本笃十五世死后五天，雷离开罗马。8月12日教皇庇护十一世任命康斯坦丁尼为第一任驻华代表。程神父于1923年12月12日被任命为蒲圻主教，1924年，孙国桢神父被任命为安国主教。雷神父的努力再一次获得成

果。

1921年，勤工俭学停办，许多留法的中国学生去找雷神父。尽管勤工俭学计划对宗教抱有敌视态度，但此后五年间，雷神父还是帮助了不少学生学习法语、进学校、找工作，并为他们谋取奖学金，在天主教徒家中安排他们的住宿。大约有二百多名学生，经雷神父的努力得以进入欧洲各学院和大学，他还经常为他们奔走于法、比、德、英、荷各国。

中国仍然是雷神父首要关切之事，希望有朝一日回到中国。天津的天主教徒向罗马教廷上书请求他复返，但是天津的外国传教士和遣使会竭力反对。1926年4月，枢机主教罗松召雷神父去罗马，通知他教廷决定任命赵神父为宣化主教。据说万桑听到这一委命后，说道：“吾主！你忠诚的仆人可以瞑目了！”10月28日，六名中国籍主教祝圣礼上，雷神父欣喜流泪。最后，因孙国桢主导向遣使会上级申请，雷神父终于获准回到中国，但不是去天津。

1927年2月11日，雷神父由马赛启程，他到中国后，去高家庄。当时，国民党分裂为两个集团，在武汉，南京成立对峙的政府。8月1日，罗马教廷电令中国天主教徒要服从现存政府，其意实即承认南京的蒋介石政府。雷神父支援国民革命军，10月与赵主教在宣化成立一个医疗队和难民收容所。1927年雷神父加入中国籍，取华名雷鸣远。一年后又建立了约翰教堂。

1932年国联派李顿调查团到中国调查九一八事件及对日本侵略的指控，河北省主席委托雷神父接待此调查团，但他的教会上级不许他承担此任务，乃由六名中国籍主教接待。1933年8月，他退出了遣使会加入了三年前成立的约翰教堂。

此后，他的主要活动是从事医疗机构的组织与管理工。他的首次工作是为1933年宋哲元的二十九军在长城抗击日军，雷神父招募训练了二百六十名人员，参加中国红十字会到喜峰口，古北口、冷口一带服务。1936年12月，雷神父应傅作义之请主持绥远前线的医疗队。1937年夏中日战争爆发，他动员他的所属在易县组织担架队。他还担任第三军十二师的卫生连连长。十二师师长唐涯源后来说：“主要靠着雷鸣远神父和天主教士，我们的人民得以平安，我们的军队士气高昂”。1938年7月，国民政府授予他一枚奖章，9月4日，蒋介石在武

昌接见了，并授他以华北战区特别卫生教育服务处主任。虽然雷神父的身体不好，但仍竭力在他所辖地区执行教育规划并建立卫生设施。

1940年2月，雷神父因受共产党的军事威胁，从河北西南地区撤出。3月17日，雷神父和另二名约翰教堂的教士被中国共产党俘虏带到石家庄。他多次被审问后又带涉县，辽县，终于在4月14日被释放。5月8日，他在夜间步行经过日佔区到达洛阳，那时他已患重病，6月13日，由蒋介石派来专机把他接到重庆，1940年6月24日夜间死去，那正是圣者普博莱的逝世一百周年。7月18日，国民政府发布一篇悼词，并通令全国哀悼。

李 济

字：济之

李济（1896—1979），考古学家，1928年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主任，1955年在台湾任该所所长，他在安阳的发掘工作在西方人士中负有盛名。

李济，湖北钟祥人，出身于诗书之家，他父亲李巽甫在北京清政府供职，李济在北京上学。1911年美国退回庚子赔款创办清华学堂派学生去美国深造，李济考取该校，1918年毕业后去美国，在马萨诸塞州克拉克大学习心理学、社会学，1919年获学士学位，1920年获硕士学位。

1920年秋，李济进哈佛大学研究院研读人类学，考古学，1923年获得博士学位。他的博士论文《中国民族的形成：一项人类学调查》，此文由雷葆华节译在1925年的《科学》杂志上发表。李济将此文补充扩大后，又于1928年在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

李济于1923年秋回国后，在天津南开大学当讲师，他遇见北票煤矿公司经理丁文江。丁文江听说河南新郑发现大批古代青铜器，派李济和一名地质调查社的人员前去现场考查，但当地群众未能合作又谣传有匪患，因此未有成果。

1925年，清华学堂改为大学，并成立国学研究院，运用近代方法研究中国传统文化。李济和其他一些知名学者如梁启超，王国维、赵元任被聘参加。此

时，美国弗里尔艺术馆代表毕晓普邀请李济参加该馆的实地考古团，当时，他已应南开大学张伯苓之聘，未能决定去就。后经丁文江之劝，受清华之聘，同时又以如下两个先决条件而参加弗里尔艺术馆的工作：发掘工作必须与中国学术单位合作，发掘所获文物必须留归中国。两个月后，毕晓普复信说，弗里尔艺术馆从来不会让一个爱国者干他不愿干的事。李济对此答复表示满意，毕晓普就与清华研究院签订了一个合同，由弗里尔艺术馆出经费，进行一项由李济领导和清华主办的发掘工作。于是李济和地质学家袁复礼从事了山西夏县的考察，1926年春在西阴村开始发掘，发现了大量的史前彩色陶器碎片和一些蚕茧。这次发掘报告发表在1927年清华大学出版的《西阴村史前的遗存》。

1928年清华研究所停办。李济曾短期去美国与弗里尔艺术馆人员商谈继续发掘的工作。该馆同意由李济选择国内学术机构进行合作。1928年11月，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由傅斯年主持在广州正式成立，傅斯年电请李济担任考古主任，12月，傅、李在广州会面，双方就李济在中央研究院和在弗里尔艺术馆的地位达成协议。李济将为中央研究院，弗里尔艺术馆担任安阳殷墟的发掘工作，经费由后者提供。1929年春，历史语言研究所迁往北平，李济在北平一直住到1934年。

1928年10月，李济在任此新职之前，傅斯年曾派该所的董作宾对安阳殷墟作初步调查。在李济领导下进行了自1929年3月7日开始到5月10日的发掘工作。这是日本侵华前第二次在安阳进行的一批十五处挖掘。发掘了大批陶片，一些青铜器及684件刻有卜辞的甲骨。在冯玉祥蒋介石打仗时，发掘工作曾一度中断，秋季，又行恢复。从10月7日起到12月12日，出土了大量的甲骨片，陶器，青铜器和两具刻有卜辞的骨骼和头盖骨，并且还发现了罕见的彩陶。这个发现第一次确定了瑞典地质学家安德生发现的史前仰韶彩陶文化与殷商文化的年代关系。

安阳的发掘因与河南省尚局和他们纵容下的私自挖掘发生争执，发掘工作陷于停顿。1930年2月22日，李济向弗罗尔艺术馆辞职。这项工作的经费由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负担，该所给历史语言研究所从1931年开始提供一个年薪六千元为期五年的职位，和为期三年每年一万元的实地工作经费。

随着安阳发掘的停顿，经费问题尚待解决，李济致力于编写安阳的发掘报

告。5月，他去南京考查六朝墓葬，又去山东与该所一名助手吴金鼎在历城城子崖发现黑陶。了解到这一发现的重要性，李济决定于1930年11月7日开始发掘。经过三十日的挖掘，考古队证实了一种新的文化综合体的存在，李济将这种文化定名为龙山文化以纪念城子崖所在的地区。

1931年3月21日到5月11日安阳的发掘得到河南省当局的支持又恢复了，李济又得到两名有经验的考古学家梁思永、郭宝钧参加。11月7日到12月9日在后冈的第十五批发掘，发现了小屯、龙山、仰韶文化的分明层次。这是第一次三种文化的综合体发现于同一地点。

九一八事变，日军进犯东北，激起了李济的爱国情绪。一批学者如傅斯年，蒋廷黻等人编写了一本《东北史纲》，历史地论证了东北与本部的联系，驳斥日本认为满洲从来不是中国的一部分的宣传。李济将此书节要译成英文，1932年在北平出版，书名《从历史看满洲》。

民族危难的加深，完成安阳的发掘工作十分急迫。第六批发掘在1932年4月12日到5月31日进行，第七批于1932年10月19日到12月15日进行，第八批于1933年10月20日到12月25日进行。1934年，历史语言研究所由北平迁往南京。3月9日到5月31日进行的第九批发掘工作基地由洹水南岸的小屯迁到北岸的侯家庄第十批由10月3日到12月29日发掘出四个大墓葬，出土一千多件石器。李济同意现场负责人梁思永的意见，认为侯家庄无疑是掘出的殷代都城小屯的墓葬地。由于殷人以重视死后墓葬而闻名，故断定对新现场的发掘是正确的。

李济继傅斯年任国立中央博物馆筹备处主任，该馆系由英国退回的庚款于1933年4月成立的。中央研究院院长丁文江是该馆理事。侯家庄的发掘追加经费，李济建议由博物馆提供一部份，丁文江立即同意。1935年3月，发掘工作在墓葬地开始进行。在6月15日挖掘停止以前，出土了多种多样的青钢、玉、象牙和陶器遗物。暑期休整后，用了五百名工人进行复原工作。在9月5日到12月16日期间，发掘出大型墓葬八处，小型墓葬785处。1936年3月18日到6月24日第十三批发掘又转移回小屯，发现了大量带卜辞的甲骨。

通过研究所的发掘报告和著名学者伯希和、高本汉、颜惠的文章，安阳和龙山的发现获得世界的注意。1936年春，一些安阳青铜器在伦敦中国美术展览

会中展出。是年冬，李应英国大学联合会和瑞典王储（后来的古斯塔夫四世）之邀请，在伦敦和斯德哥尔摩讲学。

第十五批发掘进行于1937年3月16日到6月10日。数周后，中日战争爆发。李济方从欧洲回国，负责把安阳发掘的记录和文物由南京迁往长沙，该地为历史语言所临时所在地。日军入侵汉口，历史语言所迁往云南昆明。1938年，为了李济在考古学发展上的贡献，英国皇家考古学会选他为名誉会员。

李济重又开始发掘工作，派出考古队到陕西、云南大理。1939年，历史语言所迁往四川南溪李庄，在那里留到战争结束为止。1946年春，历史语言所迁回南京，不久，李济被任命为驻在日本的中国代表团成员。他的任务是清查并找回为日本军民在战时劫走的中国文物。1948年，李济是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的八十名科学家及学者之一。这些人负责筹划战后的科学研究工作。梁思永，董作宾、郭沫若被选为考古学方面的负责人。

1948年冬，内战发展不利于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迁往台湾。李济协助把历史语言所，中央博物馆，故宫博物院的艺术珍品和考古发掘文物从大陆迁到台湾。1949年2月任国立台湾大学历史系教授，8月任该校考古学及人类学系主任。

李济率代表团出席1953年在菲律宾召开的第八届太平洋科学会议和第四届远东史前史会议，1953年获得洛氏基金捐款去墨西哥国立人类学历史学大学讲学，1955年西雅图华盛顿大学请他去做古代中国文化的讲学，他在那里的三次讲演，于1957年以《中国文化始源》之名出版。

1955年夏，李济回台北后任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1959年10月20日离台湾去美国进行研究讲学。他在1960年6月去华盛顿市的自然史博物馆访问，后又去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博物馆请他去鉴定所收藏的有关中国古代文物及其陈列加以指点。7月，出席华盛顿州西雅图举行的中美学术合作会议，然后于9月3日回到台湾。

作为一个新方法的提倡者，李济通过他的著作和实地工作使系统的发掘、地型学和类型学对中国过去历史的研究有重要作用，获得成果。他阐明近代考古学和古代文物的传统研究是相辅相成的。在这一方面，他在1928年编写的《安

阳发掘报告》是划时代的。在李济的领导下，中国的考古学家，在经费短缺，时局不稳的情况下进行了有重大意义的发掘工作，在李济的实践训练培养下，出现了一批第一流的考古学家如尹达、夏鼎、尹焕璋、石璋如、高去寻等人。

作为一个中国古代史的学者，李济写出了对中华民族形成的首创研究，对殷代文物的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并对说明古代文物订出了确切适当的名称。由于他对史前及历史遗址和收藏品的深邃知识，以及对世界各地考古学发展的广泛了解，李济对华北古代文化的解释大大提高了人们对中国过去一段仍然模糊不清的历史的认识。这方面的重要著作，有他在1934年发表的《中华民族的形成：西阳村史前的遗存》、《城子崖》。在这些著作中，李济推定龙山文化综合体在新石器时代已扩展到华东，并说明其与殷代文化的关系。李济编写的1929—1933年《安阳发掘报告》；1933年发表的论文《殷墟铜器五种及其相关问题》；1948—1949年在《中国考古学报》上发表的《记小屯出土之青铜器》，在这篇文章中他给青铜器及其花纹作了确切恰当的订名。

李 济 深

字：任潮

李济深（1886—1959.10.9），1925—1926年任第四军军长，北伐时任广东省主席，军事委员会委员，黄埔陆军学校代理校长，他是广州军政界的最高级官员。他后来曾多次参加反蒋活动。1947年被国民党开除出党后，1948年任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并在中央人民政府任职。

李济深原籍江苏，出生在广西苍梧戎圩村的一家绅士之家，他四岁时母亲去世，他在受过初级旧式教育后，1903年入梧州中学，当时的老师中有胡汉民，1904年他转入广州两广将弁学堂，三年后，选派去北京入陆军部办的陆军军官学校。1911年10月武昌起义时他中断了学业去江苏民军第二十二师当参谋长。民国成立后，重入原校，当时改为陆军参谋学校，毕业后留校任教官，并兼任陆军部研究司编纂。

1921年，李济深应粤军参谋长第一师师长邓铿之请去广州任第一师参谋

长，1922年3月，邓铿被刺，6月16日陈炯明在广州发动兵变，1923年春，李济深参与了驱逐陈炯明出广州的战役，任第一师师长。

1924年，李济深暂任西江善后督办兼梧州警备司令，5月，黄埔军官学校成立，在蒋介石手下任教练部主任。1925年3月孙中山逝世后，广州政府改组为国民政府，粤军司令许崇智任陆军部长辞去司令之职，8月，国民革命军成立，李济深任第四军（即前粤军）军长，在他手下的，有张发奎，陈铭枢、蔡廷楷、陈济棠等人。

当时，陈炯明在东江一带仍拥有强大势力，所以又组织第二次东征。第四军编组为第二纵队。1925年10月、11月间击溃了陈炯明的残余势力。在战役最后阶段，李济深率军入粤南击败陈炯明的支持者邓本殷。

1926年7月北伐开始，四军张发奎、陈铭枢两师北上进军，李济深及陈济棠、徐景唐各师留守警卫广州地区，李济深任广东省主席，军事委员，黄埔军校代理校长，1927年选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

1927年，张发奎率领的一师扩充为第四军，李辞去第四军长职务。他部下贺龙、叶挺所率领的部队参加了8月1日共产党领导的南昌起义。黄绍竑应李济深之请，组成第十五军在汕头、潮州击败了中国共产党军队。与此同时，国民党内武汉、南京两派试图消灭分歧，武汉首领汪精卫、何香凝、陈公博去广州与李济深会商。11月初，李、汪离广州去上海出席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以图恢复国民党的统一。

1927年11月17日，张发奎趁李济深离广州之际发动政变，李济深立即以其部队回击张发奎，令当时驻在福建的陈铭枢回师广州。黄绍竑率领的桂军不久集结广州。张发奎沿东江西江布防固守阵地，但留守广州的少数军队，则在黄琪翔率领下参加了12月11日由共产党分子联合发动的广州公社起义。两天后张发奎的部队扑灭了起义。陈铭枢、黄绍竑两军由两路进攻张发奎，张发奎部伤亡极大。张发奎宣布辞职，并要求戴罪立功。1928年1月4日，李济深回到广州。

1928年2月7日，李济深任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又任由在广东各部队组成的第八路军总指挥。3月1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发布政治分会暂行条例。

李济深任广州政治分会主席要职。3月30日，李济深任北伐军总司令部总参谋长。7月，他去北京与其他国民党首领开会。蒋介石回南京后，李济深任国民革命军代总司令。但他不久即由北京回广州，10月8日任国府委员，辞去广东省主席之职，由陈铭枢继任。

1929年，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的所谓桂系与国民政府破裂。李济深在3月间去南京出席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调解蒋介石和桂系之间的争执。5月20日，蒋介石发表声明拒绝调停，第二天扣留了李济深。3月27日又将李宗仁、白崇禧、李济深开除出国民党。1931年九一八沈阳事变后，敌对各派重新联合，蒋介石被逼辞职。10月桂系首领恢复国民党党籍，李济深获释，12月任国民政府军事训练总监。

蒋介石重新掌政，李济深留在广州但并未辞职。他虽是西南政治会议委员和军事委员会的当然委员，但他在南京、广州都无实权。1933年离广州去香港。

1933年，陈铭枢受他的社会民主党的催促，决定积极反对南京政府。他与李济深等人商量后，举行福建起义。11月20日，陈铭枢等人宣布，在福州成立人民革命政府，李济深任主席21日就职，但重要决策出于陈铭枢之手，李济深不过是一个挂名首领而已。南京方面立刻加以镇压，福州政府于1934年1月瓦解，李济深逃往香港。国民政府下令通缉，开除其国民党籍，撤销其各项职务。

1935年，李济深和他的一些福建共事者及冯玉祥组成中华民族革命同盟，联合全国抗日，提出“打倒卖国政府，成立人民政权”的口号。该同盟设法争取其他组织的合作，但未成功。1936年，李济深去广西，筹划联合两广共同反对南京政府，6月起事，但因7月初广东空军投向国民政府而受到致命打击。7月30日，李宗仁、白崇禧组织广西军政府，李济深任主席。后经黄绍竑、程潜的调解，广西承认了国民政府的领导。李济深的通缉令虽已取消，但他仍流亡在香港。

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后，李济深认为动员全国抗日的目的已达到，解散了革命同盟。1938年他恢复了国民党籍，任军事委员会和国民政府会议委员。1941年，日军威胁广西，李济深任军事委员会桂林行营主任，军委战地党政委员

会副主任委员。1944年11月中旬,日军执行“一号行动计划”,占领桂林,国民政府任李济深为军事参议院院长,他拒不去重庆就职,而在广西南部组织民众动员委员会并从事加强抗日力量。国民政府不同意他那种自作主张的计划。但也未采取任何行动。1945年5月,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中,李济深被选入中央监察委员会,次年,作为国民党代表出席国民代表大会。

1947年初,他去香港,于3月8日发表声明,要求国共双方解决分歧,停止内战。国民党以李济深擅自发表声明并煽动暴乱为理由,将他开除出国民党。李济深即参加了民主促进会及国际人权促进同盟,又进一步联合国民党人士及反对国民政府政策的老党员于11月12日开会,组成国民党革命委员会。该团体于1948年1月正式成立,创始人有冯玉祥、何香凝、柳亚子、谭平山等人,以宋庆龄为名誉主席,李济深为主席。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成立宣言中的两项基本任务是,实行孙中山的政策,完成“中国革命”的反封建,反帝国主义的任

务。

1949年初,李济深离香港去华北,2月间到了中国共产党进驻不久的北平,他作为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要代表,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委员会。1949年9月,该会开会,李济深被选为常务委员会副主席。政治协商会议为中国的新政府奠定基础,10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李济深是六位副主席之一,兼任中苏友好协会副会长。

1953年1月,李济深任宪法起草委员会委员,1954年7月作为广西代表出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1954年的宪法,副主席由六名减为两名,李济深辞去副主席之职,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1956年11月到1957年1月,以全国人大代表团身份访问苏联及东欧各国。1958年,又以广西代表出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1959年4月重新当选为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4月,任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和中苏友好协会理事会副会长。在此期间,他继续主持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委员会。1959年10月9日,因胃癌及脑血栓在北京逝世。

李济深曾结婚多次,子女很多,他有一个儿子是四十年代初岭南大学农学院院长。他的长子李浩宣因剥削农民于1952年判处徒刑十二年,他的三个女儿李小珠、李小萼、李小道(译音)据说于1950年都在燕京大学念书。

李 方 桂

李方桂(1902.8.20—)，人类学家，语言学家，他的研究范围，自古汉语、古体汉文到美洲印第安族的语言与文化。

李方桂原籍山西昔阳，出生在广州。他是1880年进士侯补道李光裕的第五个儿子。他父亲于1910年退隐回山西，将妻子何照瑛(译音)留在北京照管子女上学。他上过几年小学并由家庭教师辅导后，于1915年进师大附中，在校时各科成绩都显出其才能。毕业后，他考入清华学堂医预科，因成绩优秀，派到美国留学。

1924年秋，进密执安大学，他在医预科对拉丁文和德文极感兴趣，乃转而研究语言学。他获得美国优秀大学生的荣誉，1926年以优异成绩毕业。同年秋天，他进了芝加哥大学，在著名语言学家沙比尔和布卢姆菲尔德指导下进行语言学研究工作。他运用语言学理论和现代方法对美洲印第安语言这一门几乎尚未为人所涉及的研究作出重要贡献，他先后于1927、1928年获得了硕士、博士学位。他的硕士论文《沙赛语动词词根研究》，在1930年《美国语言学国际杂志》上发表，他的博士论文《马杜尔，一种阿撒巴斯卡语》是一篇对阿撒巴斯卡语研究的不可缺少的参考材料。1928—29年，他作为哈佛燕京社研究员在哈佛大学度过一个学年，后回国以社会科学研究会的奖金研究中国方言。

1929年，李方桂进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该所拥有赵元任、傅斯年、李济、陈寅恪等人。李方桂在海南岛的研究工作促使他进而研究古代音韵。几年前，瑞典学者高本汉认为近代一部汉语方言都是由一个唐代语型演变而来的，高本汉称这种原型为古汉语。李方桂在他的方言研究中，却发现了与高本汉的这种原型在某些方面相反的例证。1932年，他以《古代汉语韵母“阿”研究》一文为开端，对历代汉语音韵进行了踏踏实实的工作，在中央研究院的《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上发表的一系列文章显示出他对中国历史上的音韵学有理有据的研究。他对高本汉理论的有些批评为高本汉本人所接受。1935年，李方桂和赵元任在广东、广西、湖南进行首创性的实地工作，记录和调查各种

方言。1940年又和赵元任、罗常培把高本汉的重要著作《中国音韵学研究》译成汉文。

李方桂由研究古代汉语转而研究古体汉文，即高本汉对《诗经》所用语言的专门术语。他于是开始对中藏语系非汉族语言进行调查，提供了更多的实现恢复古体汉文原状的旁证。早在1929年他就在海南研究过这些语言，又于1933年在泰国花了三个月时间研究泰语。他于1935年在广西的研究也包括了非汉族方言的研究，1936年对南越方言进行了研究。

1937年他去美国，在耶鲁大学当了两年客座教授，中断了他的实地调查工作。回国后，1940—45年他在云南、贵州、四川调查非汉族的民族语言，收集了大量资料，数量之多，非一时可能研究分析。1940年，1943年先后发表论文《龙州傣语》，《苗语摘记》，1944年，1946年他在燕京大学任客座教授，讲授中国语言学。

1946年秋，李方桂去美国，任哈佛大学客座讲师，讲授中国语言学。1948年，他离开哈佛大学去耶鲁大学担任同样职务，次年，他去西雅图华盛顿大学，1950年成为该校固定教师。他还担任美国语言学会副主席，《美国语言学国际杂志》联合编辑。

李方桂的离开中国，并未影响他对傣语、汉语、藏语、印第安语的比较研究。他进一步研究阿撒巴斯卡语，于1965年在《加拿大语言学杂志》发表《阿撒巴斯卡语比较研究的几个问题》一文，他对藏语的研究，写有《中藏语言研究》发表在1951年《科学季刊》上。又有关于藏语的研究论文，发表在1951年《纪念高本汉的论文集》。《敦煌发现的中藏语录》一文，发表在1963年的《通报》上。李方桂请了一些西藏的流亡人士参加华盛顿大学他所主持的藏语研究，因此在西雅图成立了一个西藏学研究中心。李方桂的大部份出版物是在傣语方面，他研究这些语言及相关的苗语，指出这些语言都是从泰语派生，他以这种相互关系为依据，重新构成了古代泰语的声调，并说明其与古代汉语极相似，而且可以确定这两种语言的关系。虽然李方桂在1946年以后很少发表有关中国语言的著作，但他的全部研究都是与他的恢复古体汉文工作有关的。例如《汉语语法的一些基本概念》一文，发表于《台湾大学成立十周年纪念刊》上（1956

年)，说明比较研究可以解决恢复工作的问题。

李方桂的妻子徐瑛（译音）是徐树铮的女儿，于1932年8月21日结婚，有子一人名彼得，女二人，林迪、安妮。

李 芾 甘

笔名：巴金

李芾甘（1904—），无政府主义作家，以巴金之名为人所知，他的小说风行于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

李芾甘出生于四川成都的一个富有并有学识的士绅家庭，他的幼年除三年在广元外，都在成都渡过，他父亲于1906—1911年任广元知县。他十岁时母亲去世，两年后，父亲也去世。他的长姊和儿时的伴侣一名丫环的死去，给他的生活涂上了阴影。他的青少年时代，生活在成都外祖家，他外祖家有一所大宅院，李芾甘后来把它描写成为一座“专制王国”。在这样一个家庭中所经历，使他终生对中国的旧家庭制度产生了憎恨。

他从塾师学了几年旧学之后，进了成都的一所新式学校，该校注重外国语学习，李芾甘在校三年，取得了英语和法语的知识，也开始对社会问题有所认识。他对外国文学及社会问题的兴趣，使他对当时流行在读者中的激进作品进行探索。克鲁泡特金、哥尔德曼的无政府主义思想的著作；康夫的剧本《前夜》（这是描写1905年俄国革命者的剧本，李芾甘与他的友伴曾上演过多次）；以及五四运动爱国者的杂志，给他的印象很深。他的社会主义信念这时候开始形成，同时也开始了写作。他加入了一个青年团体，反对地方军阀，在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出版物上写文章。李芾甘这一时期的生活是他的自传性的三部曲《激流》中的题材。那时，他用了巴金这个笔名，以纪念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巴枯宁和克鲁泡特金。

1923年，巴金和他长兄去上海后又去南京，进了东南大学附中，1925年毕业。1925年五卅运动及随之而来的政治发展，给他深刻的印象，都记录在他1930年出版的小说《死去的太阳》中。1925—1927年，巴金在上海当了一名以卖文

为生的具有政治性的作家。他参加无政府主义运动，撰写有关无政府主义的文章并与哥尔德曼通信。

1927年，巴金去法国，从广州经印度支那、锡兰、苏伊士运河到马赛，这一行程，记录在他于1932年出版的《海上杂记》中。他在巴黎及其附近地区度过了两年，偶尔去过伦敦。他学习法语（语言及文学），哲学，经济学、政治科学，俄国文学，法国革命史，无政府主义运动史，他又研究了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初俄国的“民粹派”运动。1927年9月23日，美国处死了沙珂和凡若第两人使巴金深为震惊。1929年收集在《断头台上》一书中的几篇文章，如几名俄国妇女革命家的传记，一些无政府主义思想的理论性文章和克鲁泡特金的《伦理学》的译文，都是在这个时期写出的。1929年他写成了《灭亡》在同年的《小说月报》上发表，这篇小说获得很大成功，当1929年巴金回国时，他已经很有名望了。

1929年到1934年，巴金在上海从事翻译和为一些无政府主义的刊物写有关社会问题的文章，但是他的主要工作是创作小说。1931年，他写的自传性三部曲《激流》的第一部《家》是很大的成功。1931年他又发表了《死去的太阳》、《新生》，1932年发表了《海底梦》、《春天里底秋天》、《爱底三部曲》。这些作品大都是描写中国知识分子的。他有一次去华北旅行，有机会看到中国矿工的生活，1933年他写了一部小说《电》，揭露了他们的苦难，这部小说明显地脱胎于左拉的《幼芽》，并且事实上最初的篇名也叫《萌芽》。他又写了《砂丁》，描写南方的铋矿工人。这一时期，他热情写作，认为文学创作是他的使命，他感觉到“内心迫切地要描写中国青年的生活，感情和理想，并以此而影响他们”，他献身于他的政治和社会理想，认为它“比美术有更为永恒的价值”，导致他避免追求他的同时人矛盾的那种优美特点，而寻求达到当前的宣传目的。巴金并不认为自己是一名艺术家，他说他的创作过程不过是把激情和挚诚塑造成形象，藉得以倾泄。他虽然有政治热情，但并不参加当时任何一个文学团体。他不像大多数左翼作家那样同情共产党，他仍是属于少数的中国无政府主义者。

1932年1月，在闸北的烧杀抢掠中，他看到他的家属和财物化成灰烬。日军占领东北，他深切感到日本侵略的危险，投身于抗日斗争。可能由于1933年后

国民党加紧对共产党和左翼人士的迫害，他觉得还是离开中国为妥。他虽然公开反对日本的对华政策，但仍在1934年10月到1935年7月住在日本。他在那里的印象反映在小说《神、鬼、人》和杂文集《点滴》中。

巴金于1935年回到上海，大部份时间用在编辑、撰写论文和书评，他主编《文化生活》丛书，编选出版国外作家作品的译文和中文原著，他和小说家章靳以创办《文学月刊》，但出版后七个星期就被政府下令停刊了。

巴金的写作和活动虽然倾向于左翼，但仍受到共产党人及其支持者的攻击，他的反对者称他“在政治上是错误的，在艺术上是不成熟的”由于他的“思想模糊的人道主义”、和他的坚持无政府主义活动而受到谴责。他为西班牙内战中的无政府主义者辩护也成了被攻击的对象。就此种种，巴金为自己的观点辩解，他反对历史唯物主义，保留他本人坚持意见的权利。1935年初，他毫不含糊地支持统一战线，1936年10月，他和鲁迅、茅盾、郭沫若共同在《文艺界同人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的宣言》上签了名。

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后，他不得不离开上海。此后八年中，他到过广州、昆明、桂林、重庆等地。1941年又到了阔别十八年的成都。1944年5月8日，他停止了漫游，与肖珊结婚。

战争期间，作为一个撰写辩论性文章和创作文艺作品的作家，巴金非常活跃。1937年10月19日，他给山川均的公开信，申言中国人民反对日本威胁的决心。他也是全国文艺界抗日联合会领导人之一，他有时担任过富于战斗性的抗日杂志《呐喊》，《烽火》、《文丛》的联合编辑。他仍继续编选《文化生活》丛书，1938年，1940年先后出版了《春》和《秋》，完成了《激流》三部曲。他写了三卷本的小说《火》，分别在1940、1942、1945年出版，1946年又出版了《憩园》、《第四病室》。此外，他又写了一些短篇小说，翻译了屠格涅夫的二篇小说和克鲁泡特金的一些文章。

战后，巴金回到上海，写完了《寒夜》。1947年，他写了《怀念》以纪念在抗日斗争中牺牲的伙伴，同时继续编选《文化生活》丛书。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巴金的作品重印出版，这说明他对共产党政权的良好关系。章靳以和他创办了《收获》杂志。巴金并未加入共产党，但他一再

表示对共产党事业的同情。甚至在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前，巴金已被选入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全国委员会。1949年10月，他任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委员，1953年选为作家协会副主席，全国文艺界联合会主席团成员。1952—53年他作为作家代表团成员访问朝鲜，在战地前线过了一些时间。1953年出版的《英雄的故事》小说集，即以他在朝鲜的经历为题材。1954年，1959年，他两次被选为四川代表出席第一、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1957年百花齐放期间，他的发言曾多次受到尖锐批判，但看来并未影响他和共产党当局的关系

巴金放弃了他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在五十年代重印他的作品时，他删去了这方面的内容。

巴金在三十年代，四十年代国内青年读者中获得广泛赞赏，他们把自己当作是巴金小说中的角色，在他的小说中反映了他们的生活、苦难和斗争。巴金作品中攻击最烈的是中国传统的家庭制度，它剥夺了青年们的行动自由，恋爱和婚姻自由。他小说中的角色使他们感到自己的社会责任，他们为自由、为人类美好的未来而斗争。他怀有和人民所共有的民族志气，反对外国人在中国的统制地位。但是，除了在民族危机深刻的时候外，巴金作品中追求政治自由、社会平等的内容远较以民族斗争为题材的更为显著。他朴素、热情而富于诗意的文笔是巴金取得成功的原因，并且使读者对他的小说结构很差这一点就不大理会了。一本研究巴金的重要著作：奥尔加·兰所著的《巴金与其作品》，出版于1967年。

李 璜

字：幼椿

号：学纯

李璜（1895.1.14—），学者。他和曾琦组织中国青年党，后来成为所谓的第三种势力运动的一个组织部份，力图避免国共内战。

李璜是四川一个富商的儿子，出生在成都。他受旧式教育后，于1908—1912年进了成都一所官办的洋文学堂。1913年，他在上海进法国耶稣会办的震旦大

学。在那里，他取得了法国的文化和语言的知识，但对教会学校感到憎厌。他在上海的朋友有曾琦、左舜生等人。

1918年6月，李璜参加了少年中国会的成立，12月去法国求学。他和留法勤工俭学的创办人李石曾同行。1919年2月，他负责率领进蒙塔尔吉学院的一批勤工俭学的学生。同年秋，李璜进入索邦大学，在此后五年中，他学了欧洲历史，社会学，比较宗教等课程。

李璜在学时，不必为谋生操心，所以有很多闲暇时间从事其他活动。他为勤工俭学学生办法语班，又与周太玄办了一个通讯社报道巴黎和会的消息。巴黎和会结束后，该通讯社继续向国内报刊提供欧洲的新闻。李璜为国内的教育刊物写了不少有关教育的文章，因此被认为是研究西方教育方法的权威人士。1922年12月到1923年6月，他和曾琦一起去德国游历。

李、曾回到法国时，在法国的国民党和共产党，与国内同一步骤实行合作。有一些反对这一联合的中国学生坚持国家主义反对国共集团的国际主义。1923年12月曾琦和李璜成为中国青年党的两名主要发起人，该党为国家主义的支持者所组成。

1924年，李璜完成索邦大学的学业后回国，1924—25年在武昌大学，1925—26年在北京大学，1926—27年在四川大学教欧洲史，法国文学，教育学等课。在此期间，他争取对青年党的支持，成效很少。他公开批评蒋介石及其统治，因而激怒了南京的一些政府首领。为了本人安全，1929年，他决定迁居上海法租界。他在租界内住了三年，在复旦大学、江南大学、和执信学院教书。

1932年，李璜到当时由张学良的军队所控制的北京。张学良允许青年党在东北活动，远较国民党地区为自由。他委任了一名青年党人翁照桓为师长驻守通往关内的大门山海关。李璜与翁照桓及其部属青年党人苗可新、邓铁梅在锦州与长城之间建立据点对日进行游击战争。1933年日军进攻该地区，李、翁逃往青岛。

李璜回到四川故乡。自从中国共产党军队向西北长征进入四川后，成都的一些头面人物，其中有些同情青年党的人士，组成绥靖委员会图谋消灭共产党军队。该委员会抱着劝说四川地方军奋勇作战，派李璜为驻刘湘川军司令部的

代表，他之所以能在司令部立足，是由于他与刘湘的参谋长张君瑜（译音）的悠久友谊。他在四川地方军中一直呆到1935年中，虽然川军并未能消灭共产党军队，但阻止了中共军队进入四川中部。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及1937年7月中日战争爆发后，青年党改变了它对中国共产党的政策而支持统一战线，由此而成为中国政治中第三种势力的一部份，力图防止国共发生内战。这种第三势力的政党在1941年组成了“中国民主政治团体同盟”（即民主同盟的前身），李璜任其中央委员会副主席，成都分会主席。1938—1945他又是重庆参议会的联合主席。

1945年，李璜以中国代表团成员身份参加在旧金山召开的联合国国际组织会议。回国后，他参加了马歇尔发起的国共和谈。第三势力防止或结束国共内战的努力未获成功，其中有些党派，包括青年党的一翼，与国民党达成交易支持国民政府。1947年，蒋介石邀李璜担任经济部长，为李所拒。同年，国民政府宣布民主同盟为非法。1948年，蒋介石请他当政治顾问也未接受。1949年共产党统治了大陆后，李璜寓居香港，他与左舜生仍代表中国青年党中对国共两党均不满的一派。李璜还在香港各中文院校教欧洲史，还为第三势力所办刊物写文章。

李璜的重要学术著作，有1920年出版的《法国文学史》，又与余家菊合写《国家主义的教育》于1923年出版，1932年又出版了《历史学与社会科学》。

李璜在1916年和王安华结婚，生子二人李印元、李印章，女两人：李印琏、李印棠（均译音）。

责任编辑 朱信泉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 译稿 民国名人传记辞典 (第六、七、八分册) (上)

作者=(美)包华德主编 沈自敏译

页数=161

SS号=11004761

DX号=

出版日期=1986年12月第1版

出版社=中华书局

封面
版权
前言

许地山
徐永昌
薛敏老
薛岳
胡汉民
胡霖
胡适
胡蝶
胡宗南
胡文虎
胡也频
胡元俊
胡筠
华罗庚
黄节
黄郭
黄兴
黄侃
黄光瑞
黄庐隐
黄慕松
黄绍竑
黄少谷
黄炎培
洪深
任鸿隽
甘乃光
康成
康有为
高崑
高？
戈公振
柯劭忞
谷正伦
谷正鼎
顾颉刚
顾祝同
顾孟余
顾维钧
古应芬

邝富灼
孔祥熙
孔德成
郭沫若
郭秉文
郭泰祺
劳乃宣
雷海宗
雷鸣远
李济
李济深
李方桂
李蒂甘
李璜

目录